

汪精衛全集

褚民誼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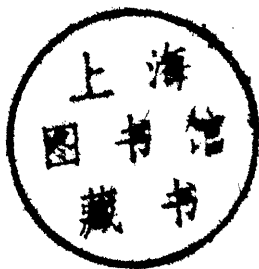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5780B

汪精衛全集

歷年演講集

三集



4376388

政治與羣衆

這幾日內，「南洋」同文「文治」幾個大學，邀我去演講。我的演題是「政治與羣衆」，內容分爲幾個問題：第一問，「今日羣衆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是什麼？」答的是「好政治」；第二問，「如何能得好政治？」答的是「祇有革命」；第三問，「革命如何能得成功？」答的是「祇有得羣衆的協力」；第四問，「如何能得羣衆的協力？」答的是「祇有結合一個以羣衆利益爲基礎而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這幾日，就這幾個問題，逐一討論，有各異的所在，因爲特別注意之點，有時不同；有相同的所在，因爲講者雖然重複，聽者却不是重複；如今將他湊合起來，做成這一篇演說辭。

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全國人民，對於國事，都抱着精神上的無窮痛苦。在全國人民裏頭，越是有思想有知的識人，那些痛苦越是加甚。難道那些痛苦，便永遠不能解除的麼？便永遠不想解除的麼？譬如父母有病，爲人子的，

越是憂心，越是着急的延醫診治；對於國事，也是如此。我們不但抱着苦痛，還有着急的想出能解除苦痛的方法。

一個人若沒有缺乏的時候，往往不知道需要，不知道需要的時候，往往不知道承受；如今既已感着苦痛了，便已是知道缺乏和需要了，便已是知道承受了。然而對於簡單的現象，或是如此，若是複雜些現象，他的知道，便不能如此貫徹。例如一個人，饑而思食，可以說是因缺乏而知道需要，及其得食，可以說是因需要而知道承受；然而那些食料裏頭，是否適宜於衛生，是否適宜於這個人的體質？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補益的質料，這裏頭剛剛沒有，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要忌的質料，這裏頭剛剛存在，如此則食了下去，往往非徒無益，而且生病。他所承受的，未必是他所需要，他所需要的，未必是他所缺乏；換一句話說，他所缺乏的，他不知道需要，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承受，吃飯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尙且不容易知道；蘇格拉底每舉一事問人『你知道了沒有，』那人答道『知道，』及至蘇格拉底逐一的問下去，那人畢竟是不知道。如今我舉吃飯這一件事來做個例，已是如此。國事

比較吃飯，複雜何止幾倍，所以我們對於國事，要想救治，不能不先問一句道：「他所缺乏的是什麼？他所需要的是什麼？」

好逸而惡勞，是人類的天性，好生而惡死，尤其是人類的天性，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是必須去做的，」他根據了好逸惡勞的天性，搖搖頭，不肯去做；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情，你如果懶着不去，你便要死在眼前了，」他根據了好生惡死的天性，沒了法，也只得搖搖頭，嘆口氣，終於去做了。從前進化學者說，「進化是人生幸福所必須的」，有許多人，搖搖頭，不答應；你說是，「有飛機，有汽車，有汽船，交通便利，是人生的幸福，」他卻說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纔是人生的幸福」；你拿他怎麼樣呢？如今進化學者却說，「進化是人生所必須的」，這句話，無異告訴他道，「人家已經用着飛機，用着汽車，用着汽船，一直闖進了你家裏來了；你若還是用獨木輪的手車，用大眼雞的帆船，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命過！人家已經用着機關砲，用着機關槍，來攻殺你了；你若還是用馬步弓箭，用大鳥槍，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命過！還怕你不隨着美

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的棕色人，一齊的等着滅種嗎？」這樣一說，進化雖然是極討厭的，極可惡的，使我們不能舒着懶筋，吃太平無事的飯，睡太平無事的覺，然而性命要緊，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着進化那條路走，口裏頭雖然喃喃的怨恨不絕，脚步却已是不能不挪動了。除非我們充什麼佛和菩薩，念念有詞的道「涅槃」，「滅度」，懶得極了，索性連生也不要；那麼，我們只好離了這有生物的活星球，搬到無生物的死星球裏去住。如其不然，那就不能偷懶，一定的要向着進化那條路走。物質方面是如此，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精神方面的進化，和物質方面的進化，原沒有兩樣的形式。人家已經解決了貴族和平民之爭，君主和人民之爭，如今要進而解決富人和貧民之爭了，我們如果還是在這里，做什麼帝制的夢，復辟的夢，以至於什麼托辣斯的夢：那麼，我們的前途，只有兩步。第一步是亡國，第二步是滅種；我們如果說不怕，那便沒奈何，我們如果還有三分的不忍人之心，我們惟有硬着頭皮，大踏步的向着國內和世界上那些對於貴族的平民，對於君主的人民，對於富人的貧民，大聲吶喊道：『我來參加戰線。』除了這樣，再也沒有第二

條生路可走。以上這兩樣；是明明白白的，無可疑的：我們今日，最缺乏的是什麼？和最需要的是什麼？似乎也可以知道了。

然而今日羣衆的情形，似乎還不大知道。辛亥革命的時候，有許多人歡歡喜喜的說道，『唉！如今好了，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似乎羣衆的缺乏和需要，是『食便宜的米，』這誠然是不錯的；可惜的是剛纔下種，便想吃飯，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全忘却了。不到一年，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有一位老先生，撇着鬚子的說道：『吾儕小民，有幾許的命，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這幾年來，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提起革命，說是『搗亂』，而且唉聲歎氣的說：『今日的人心，已經厭亂到極點了；』提起政治，說是『齷齪』，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詞，和一般人民沒有關係的；那麼，我要問問他，今日羣衆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教育麼？實業麼？這誠然是羣衆所缺乏和需要的，教育實業如果進步，國內物

質方面和精神方面，自然也便進步了。却不知道教育實業能有進步，正和方纔所說「食便宜的米」是一樣的話。因為這已是結果，不是原因啊！沒有政治進步而教育實業不進步的，也沒有政治不進步而教育實業進步的；自消極方面說，教育家實業家苦心孤詣日積月累得來的成績，壞政治一刻的工夫，可以將他掃蕩得乾乾淨淨；自積極方面說，壞政治如果存在，斷不容教育實業得有進步的機會。我說這句話，並不是灰教育家實業家的心，也並不是不將教育實業放在眼裏，我只要證明政治及於教育實業的影響，使一般從事教育實業者不要忘了政治。我們先最要明白的，政治是什麼東西？政治二字，經了學者不少的解釋，我以為最顯明最切要的只有一句；便是政治所以為人民生命自由等等之保障。在君主專制時代，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是自己不能保障，而靠君主為之保障的；所以君主賢明的時候，人民便靠泰山一般，安然無事；君主昏暴的時候，人民便受君主的蹂躪，叫苦連天，無所逃命了。人民上了這種老當，知道把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交給人去保障，是危險的，所以把保障之權收了回來，自己來做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的保障。這便是民主政治。若

是國體雖號爲民主，而實際上政治權力全操在腐敗的官僚和暴橫的軍閥手裏頭，那民主便空有其名了。實際上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已經不由自主，而操在那些官僚軍閥手裏頭了。不向他們手裏頭一把的奪了回來，生命自由等等尙且不由自主，還有什麼教育什麼實業可以講呢？不嫌瑣細的說，一國的收入，人民滴滴汗滴滴血所匯合而成的一國的收入，全放在官僚軍閥的荷包裏，試問教育家拿什麼做科學的設備呢？自然只好拿粉條黑版講科學了。物質進化的方面，還有指望麼？至於精神方面，只怕集會出版的自由，也不能得着，更不用說實行了，精神進化的方面，也只好和東晉人清談似的，過這一生一世了。教育如此，實業可知，算來算去，除了掛外國的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竟沒有第二個方法，這也不忍多說了。我們如果知道，教育和實業，是羣衆所缺乏的所需要的，便更要知道，教育和實業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所以凡是熱心於教育和實業的人，同時不可不熱心於政治，使眼前的壞政治，變成好政治；好政治的最少限度，是人民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到那時候，人民纔能將他的生命與自由等等，去發展教育和實業；故此教

育實業的發展，是在好政治實現以後的。

如今要問我們如何能得到好政治呢？在民國以前，國人對於這問題的解答，已不一致，有些主張用革命手段的，有些主張用非革命手段的，這非革命手段，便是所謂立憲派的口頭禪，我們問他道，「你的『憲』是要誰去『立』呢？自然是要人民去立的，那麼，人民在沒有解除壓迫以前如何能得到立的機會？所謂解除壓迫便是革命了。你一面要人民立憲，一面又要人民不革命，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他始終沒有解答，所以到底革一回命，纔得到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然而國人裏頭，用非革命手段可以得到好政治的夢想，始終沒有拋却。所以民國六年夏間督軍團造反，毀棄約法，西南起了護法軍的時候，北京有一部分政客，便憂聲的說道：「我們是立憲的國民黨，不是革命的國民黨。」他們說了這話，便躲開了護法軍的關係，安心樂意的在北京腐敗官僚裏頭，成功了蛆蟲化。他們的用心如何，此時不說他，只是他們看得憲法是一件事，革命又是一件事，絕對沒有因果連帶的關係，那真未免過於穩健了。對於國憲是如此，對於省憲也是如此；所以什麼國憲例，省憲例

，在人民看來，是一張絕無意義的具文，却是在人民之敵看來，却是有一種極有興味的裝飾品，可以隨時拿來遮掩他無量數的罪惡的，若要想憑藉這麼樣的立憲，來得到好政治，真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了。老實一句話，憲法是革命得來的結果，不是革命的替代品，以為立憲可以替代革命，是絕對的虛偽，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罪惡。

非革命的手段，除了立憲說而外，還有好人政府說。我在此表明一句：主張好人政府的，有些是我的朋友，我如今批評這一說，並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不過我不能不照我良心的判斷，直說出來。我以為這一說，比較立憲說，是進一步的，立憲說是祇要有「憲」不管什麼人去「立」，民不能立，那麼滿洲政府去立也好，把持中央的大軍閥去立也好，把持一省的小軍閥去立也好，所以他的結果是喚起假立憲的罪惡。好人政府，却得注意於在政府裏的是什麼人？能標明在政府裏的，必須是好人。這不是已進一步麼？只是他所短的，是沒有估量他所謂政府的價值；可憐得狠，他意中的政府，不是以人民為基礎的，却是以一種特殊勞力為靠山的。這一種

特殊勢力，混名是太上政府，他意中的政府，對於這太上政府，國務總理不過是一個紀綱之僕，國務總長，不過是一羣管賬的，或是跑腿的，只怕還跟不上呢。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價值，却要大把的將些好人塞在裏頭。可憐得狠，那些好人塞在裏頭之後，都變成壞人了，至少也變成無用之人了。好人政府的作用，在哪里呢？須知這太上政府，除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將他打破；生息於太上政府之下，以太上政府為靠山的，却想要矯正太上政府，真真是螳臂當車的故智了。而且這太上政府，還有個太上政府在他的上頭，太上政府對於他，已是一重奴隸，政府對於他，便是二重奴隸，不用說矯正，連趨奉還來不及呢。老實一句話，政府屈服於軍閥之下，軍閥屈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在這屈服復屈服的狀況中，要想發生好政治出來，比緣木求魚，豈不更難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終於是壞人政府或是無用人政府的命運了。

這樣說來，我們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經過兩番工作，一是打破軍閥的工作，一是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工作。這兩種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

是不會實現的。

如今要問革命如何能得到成功呢？上頭所述，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政治，欲得到好政治，惟有革命；然則革命兩個字，真是今日羣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全國人民，無論是教育界實業界以至等等界，都應該同心一德，向革命那條路，大踏步的走去。如果這樣，我敢信革命早已成功了。只是這不過是一個理想，自有人類以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沒有一次，是全國人民一齊奮起去做革命的。起頭的時候，總是止有少數的人，看準了羣衆的缺乏和需要，奮不顧身的，爲革命提倡者，其始不惟不能得羣衆的同情，而且反博得羣衆的怨恨和詛咒。爲什麼呢？就是剛纔所說，羣衆的缺乏和需要，羣衆自己還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同情何自而來呢？一直到羣衆漸漸的知道了。也就漸漸的有些同情於革命的了。只是在羣衆裏頭，還是極少數的，在那時候，如果革命的敵人，力量雄厚，立刻將他擊破，他於擊破之後。再團結起來，數量必然加增，這還不必耽心，倒是革命的敵人，力量如果脆弱，一時就被他推倒，他推倒敵人之後，反而自己有些站不住了。何以故呢

？那時候的羣衆，知道革命爲羣衆所缺乏所需要的，還是很少，同情於革命者，還是很少，爲羣衆而革命的人，得不到羣衆的同情，如何能得到羣衆的協力；於是反革命者乘間而起，羣衆對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及於羣衆之利害如何，還沒有弄得清楚，自然便等量而齊觀，再加以反革命者，對於羣衆用些迷惑的工夫，羣衆的同情，反而傾向於反革命者了。在那時候，革命者宛如孤軍突入重圍一樣，敵人的包圍，一步緊似一步，而自己的後繼，竟至於踪跡全無，於是灰心者便成了潰卒，變節者便成了降兵了。一場革命的失敗，也就於此結束了。所以革命的時候，所怕者不是敵人，却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革命的挫折和失敗，不是原因於敵人之打擊，却是原因於羣衆之不了解。我如今試將十三年中國革命之經過來，證明一下。中國的革命，倡始於孫中山先生，經二十餘年之奮鬥，方纔得到辛亥的結果，只是辛亥的結果是什麼呢？三民主義，在辛亥之役，成就了沒有呢？民族主義所要求的，一是國內諸民族之平等，二是對於世界中國民族之獨立，自從清帝退位五族共和的民族主義之第一目的，可以說是達到，第二目的，却還沒有開展呢。至於民權主義，

僅僅掛起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便連萌芽却還沒有，這樣的結果，總算是微乎其微了。然而這微乎其微的結果，已經是極不容易的，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流行一種標語，就是『不要為異族殺同胞』。這種標語，不但革命黨人極力宣傳，便是各種社會，也同聲肯定；在當時成爲一種不可抗的勢力，根據於這勢力，所以有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就。滿清末造，傾注全力於練新軍防家賊，然而他所練的新軍在南方的，都受了『不要為異族殺同胞』的感化，成爲反正的軍隊；便是在北方的，也不免多少受了這樣的暗示，以致搖動了軍心；於是練新軍防家賊的政策，結果是適得其反，簡直可以算是練新軍以自殺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可以得一證明。然而『不要為異族殺同胞』的標語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的，歷史的留遺，和環境的壓迫，使革命黨人的宣傳，能鑽入羣衆的耳裏，喚起了他的自覺，真不知經過了多少浸漬醞釀的工夫呢。其他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宣傳，在那時候，比較起來，是沒有同等的質量的，所以也不能有同等的效力了。試看元二年間，革命黨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其所動作，不但不能得羣衆的

協力，反而惹得羣衆的嗔厭；被袁世凱看出破綻，便利用羣衆的嗔厭，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辛亥之役，革命黨人，驅逐滿洲，非常之快；癸丑之役，袁世凱驅逐革命黨人，也是非常之快；可見得革命黨不是失敗與袁世凱，還是失敗於不了解的羣衆呢。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却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癸丑之役，革命黨人看出袁世凱是要背叛民國的，所以有討袁之舉；因為羣衆的不了解，以至於失敗。三四年間，繼續討袁，都是繼續失敗，直至四五年間，袁世凱顯然的背叛民國做皇帝了，於是羣衆裏頭，漸漸的知道革命黨人的標榜討袁，不但是一種先見，而且是一種萬不得已之所爲了。辛亥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丙辰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已經是民國了；如何又要做皇帝。』這兩種標語，有同等的效力；前一種標語，能使清帝退位；後一種標語，能使洪憲帝制取消，後一種標語，也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至少也可說是由二年至五年間，無數革命人的心血頸血，浸漬醞釀而成的。丙辰之役，袁世凱所有的兵力，較之癸丑之役，更爲雄厚；癸丑之役，他能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

，丙辰之役，革命黨人和向來非革命黨人，一齊的立於反對袁世凱的戰綫上，袁世凱不但不能打破他，反而自己衆畔親離，終於做了塚中枯骨，和他的祖宗袁術，地下相逢，做個愁人說與愁人聽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又可以得一證明。辛亥之役，社會上以爲清帝退位便完了事，丙辰之役，社會上以爲袁世凱取消帝制，便完了事，一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所必須的工作，都撇在腦後，有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羣衆對於他，表示冷淡和噴厭，和元二年間，竟差不多，因爲這樣，所以一個袁世凱死了，無數的小袁世凱，依然存在，宛如董卓死了，李催郭汜樊稠張濟一齊出來，他們的撒潑，比董卓還要兇些。他們以爲袁世凱的一生，都沒有錯，所錯的，只是做皇帝一樁事；他們祇要不犯此着，便做什麼都不要緊的，於是亂糟糟的，一直糟到今日，還沒有個收拾。我們試想，他們的力量，能比袁世凱大嗎？他們的手段，能比袁世凱高嗎？何以袁世凱不能生存於丙辰之役，他們卻居然能生存至於今日呢？若不是社會故意縱容他們，他們何至於此。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却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經過了元年

和五年的覆轍，國裏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都向革命黨人嚴重的責備，說元年之役，不應該與袁世凱調和妥協，五年之役，不應該與一班小袁世凱調和妥協，以致革命事業不能貫徹，而內亂反致延長；這些嚴重的責備，可以證明國人知識思想之進步，和證明國人對於革命關係之親密，革命黨人當然是甘心承認的，也當然是勉力改過的。只是六年以後，護法之役，其結果又何如呢？護法之役，起於六年夏間，迄於十一年夏間，時間的經過，比起辛亥之役，延長得多，用兵的區域，比起前兩役，也擴大得多，似乎那及於羣衆的影響，自然比較的更爲深切著明了，十一年六月之初，吳佩孚襲用袁世凱以來傳統的政策，贊成護法，黎元洪入京，取消六年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表面上似乎是全然服從革命黨的主張了，裏頭却是和袁世凱的贊成共和一樣用意。那時候，革命黨的態度，該怎麼樣呢？諸君總還記得：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有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先是對於直軍將士之贊成護法，表示欣慰，隨後便主張把現有兵士的一半，改爲工人，作爲停戰條件，把全數兵士，改爲工人，另編國防軍，作爲和平統一的條件。這宣言的意義，非常嚴重，可以算是民

國以來第一篇吃緊的文字，也可以算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安危治亂的關鍵。何以故呢？剛纔不是說過，國人歸咎元年五年兩役之調和妥協麼？元年的時候，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有對抗的兵力的講和之後，歸於統一，南京留守，將所轄的各軍，大裁特裁的，裁贖了第八師的一師，廣東都督，將十餘萬民軍裁贖了二師一旅；而袁世凱呢，却在北方，招兵不已，還恃着大借款來擴充軍實，所以未講和的時候，革命黨手裏拿着一把刀，袁世凱手裏也拿着一把刀。講和以後，革命黨將手裏的刀，交給袁世凱了，袁世凱却將兩把刀都拿起來，把革命黨殺了下去。五年的時候，也是如此，平和咧，統一咧，無非哄革命黨人將手裏拿着的刀，交給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就拿着這刀，來殺革命黨人；這樣的結果，不是革命黨的倒臺，却是國民的倒臺。因為第一次革命黨失敗之後，洪憲帝制便跟着出來；第二次革命黨失敗之後，督軍團造反便又跟着出來了。如今孫中山先生宣言的用意，便是對於前兩次的覆轍，謀一個矯正的方法，他注意於和吳佩孚商量，我的刀如何安放，你的刀如何安放，安放之後，彼此都不能隨意的便拿出來，這纔真真是和平，真真是統一，國人如果想起

了元年及五年的往事，念及六年以來的創鉅痛深，料得定是一致贊成這宣言的辦法，而且是一致督促其實行的。誰知不然，一萬個不然，那時候的輿論，對於這宣言，不是全不理會，便是冷嘲熱諷的說道，『你護法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鬧些什麼呢？是不是還戀着些什麼呀？』代表全國知識界的，是學界，代教全國學界的，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一班教授，便致電孫先生，說的是：『護法成功，應即下野；』全國最高的學府，還這麼說，其他可想，於是潛伏在北伐軍背後的一班驕兵悍將，平日還是有所憚而不敢發的，至此得了題目，便一哄而起的『請孫下野』了。六年以來，護法軍的根據地，便摧毀無餘了；曹錕的賄選運動，便從此開始了；一班自稱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便戢戢然的趕入豬圈子裏了。到底這一次革命黨的失敗，其原因在哪里呢？從前兩次，說是失敗於調和妥協，這一次，是不調和和妥協了，何以仍易失敗，而且失敗得比前兩次還迅速，還凶慘？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是失敗於吳佩孚麼？不是，那時候，北伐軍還沒有和吳佩孚接仗呢！是失敗於一班造反的驕兵悍將麼？也不是。那時候一班驕兵悍將，分明是還有所憚而不敢發呢？

算來算去，除了失敗於羣衆的不了解，沒有第二樣說法。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以上種種，都是十三年來中國革命經過的事實，革命和羣衆的關係，於此已可以完全顯出。待羣衆了解，然後革命，不過是一個理想；而羣衆不了解，革命不能成功，又有許多經過的事實來證明其不謬。然則革命黨，惟有一面自己努力於革命，一面努力于求羣衆的了解，革命運動不必待羣衆了解而後開始，卻不能不待羣衆了解而後成功。

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到羣衆呢？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如此勾結，如此壓迫，真真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然後革命成功，那真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們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縮短革命期間的方法。這方法第一要問的，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如果不是，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什麼也不用說了；如其是的，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於是第二要問的，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須知羣衆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這是進步遲慢的總因；我們如果要催

促他進步，須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顯著出來，我們能夠集中羣衆的意思，纔能夠集中羣衆的力量；於是第三要問的，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我們可以答道，除了結合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沒有第二個方法。關於這一層；一時也解釋不盡，中國國民黨已有了宣言和章程，民國日報因此發行了一種特刊，將宣言和章程，載在上面，還有幾篇論文，附在後頭，都是對於這一層，加以解釋的，我也不用復說了。

我所講的大意是如此；至于如何去解除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對於國事之痛苦呢？在於全國人民，尤其在於全國人民裏頭有思想有知識的人了！

在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演說辭

今日（十四年三月一日）是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這是國民會議前途可紀念的日子，也就是國民革命前途的日子。會員諸君，有些是在北京的，有些是從各省來的。諸君數月以來，苦心孤詣，不辭勞瘁。方纔得這些結果，兄弟對於諸君，實在抱著無限的敬意，無限的感念。

兄弟知道諸君此時一定不期然而然的同有一種感思。這感想是什麼呢？就是對於發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的感想。孫先生現在病得極重，不能起床，兄弟自一月廿六日以來，一切講演之約暨社會酬應，都已謝絕。今日離開孫先生病榻，來赴諸君之約，臨來的時候，孫先生在病榻上，以微弱的聲息問兄弟往那裏去。兄弟答以赴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開幕式。孫先生從痛苦的病狀中，微露笑容，點頭說道，『甚好。』諸君知道，諸君此時，感想著發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而先生此時，也正感想着為國民會議努力的諸君呵。孫先生此次北來，一心一意的，要和北方同

胞，說國民會議的必要，與其運用的方法。無奈孫先生如今病了，不能和諸君見面細談。孫先生的意思無人敢為代表，兄弟祇能以其所見揣測一下，為諸君告。為什麼要開國民會議呢？國民會議何以為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呢？這些問題，關係至為重要，不能不先為解答。中華民國，主權在民，載於約法，其實這不過一句空話罷了。十四年來，主權何嘗在民，只不過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裏，和國內軍閥手裏。因為這樣，中華民國十四年來，有名無實，人民痛苦不堪言狀。人民深知這些痛苦都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所賜，若不能驅除帝國主義和軍閥，必不能解除痛苦，所以一致的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之目的，簡單明瞭，便是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所以要開國民會議的緣故，是如此，國民會議所以為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也是如此。

國民會議之所以為國民會議，全靠他的構成分子，真真實實，都是國民。不然，國民會議必是冒充的，不是真實的了。孫先生的宣言，所列國民會議之構成分子，是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各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軍人

，政黨。以上種種，方纔可稱爲真真實實的國民。以這樣的構成分子，來構成國民會議，方纔可稱爲真真實實的國民會議。這樣的國民會議，方纔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何以故，因爲以上種種的國民，都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益相反的，不能兩立的。惟其這樣，所以能盡他應盡的責任，舉些例來說，現代實業團體中，如果想起中國實業何以不發達，何以不但不能和外國實業在世界上競爭，並且不能和他在中國競爭，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爲特權階級的緣故，這是關稅權在外國人手裏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便可明白了。如果再想起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何以不幫著人民，向帝國主義者抗爭呢？何以反幫著帝國主義者來壓服人民呢？這是軍閥竊據政府，託庇於帝國主義者以自存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明白了。現代實業團體如此，商業也是如此。

農民如果想起農地何以日即荒蕪，農村何日即破壞，農民資本何以日即拮据，農家生活何以日即憔悴，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工業政策來施行經濟侵略的

結果。工人如果想起手工業何以失敗，失業者何以如此之衆，何以將人類的身體來做機器的奴隸，大而外國資本家，小而中國資本家，何以能將工人出的血汗，等於鍋爐內燒著煤的熱力，將工人出了血汗的身體，和撥出鐵爐外的燒過的煤渣，一樣看待，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施行國際資本侵略的結果，如果再想起壓在我們頭上的政府，還正在依附著帝國主義的勢力，來束縛我們驅使我們魚肉我們，於是農民工人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可以明白，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以明白。

教育家和學生，如果想起教育權何以如此旁落，外國文化侵略政策，何以如此橫行無忌，教育經費何以如此缺乏，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之高壓政策和軍閥之攘奪政策愚民政策所做出來的結果。於是教育家和學生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就可以明白。

至於軍人呢，雖有時被看做軍閥之直接工具，帝國主義者之間接工具，然軍人不是從天上吊下來的，依然是從田間來，或是從失業工人中來，或是從教育界學界中來。以上種種人，所受的痛苦，便是他的痛苦，一旦明白過來，必然佔在以上種

種人的方面，替以上種種人出力，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作對。不見全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已明明白白的，標出他的旗幟來了麼？軍人如此，推之政黨，也是如此。

如此說來，用以上種種人，爲國民會議的構成分子，必然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換句話說，這是他們拿着他們自己的主權，替他們自己與利除害，是何等的親切，是何等的正當，所以他們自己要開國民會議，所以國民會議爲解決時局之惟一方法。

如今國民會議雖然還沒有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已是開幕了。還可說國民會議成立的先兆。兄弟想起建設中華民國的原因，和中華民國的大道理，將主權在民四字，爲諸君祝。

「平和」！「奮鬥」！！「救中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追悼孫總理大會演講——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涸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平和」「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

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却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和平」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却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和平」；孫先生的畢生「奮鬥」，爲什麼呢？是爲「和平」而「奮鬥」。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平和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平和，是如此的，祈求平和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鬥。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平和是仁者的心事，奮鬥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

，「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爲平和而奮鬥，以奮鬥求平和。平和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鬥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平和」「奮鬥」「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鬥」「救中國」做去！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汕頭建國粵軍總司令部行營舉行第三次孫大元

帥紀念週講演——

兄弟由北京來得參與這裏第三次的週祭，承總司令的囑咐，要兄弟向諸君說幾句話，兄弟謹把這一次到北京去的經過，簡單報告。

兄弟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隨大元帥自廣州出發，十七日到上海，大元帥決定自己率領幾位同志，繞道日本赴天津，命兄弟先行入京，並在津會面，及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兄弟接著，這時候大元帥已發病了。但是大元帥還不肯休息，雖然病臥在床，而裁答函電，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至三十一日入京以後，病勢日見沉重，便不能躬親庶務了。一月二十六日入協和醫院受手術後，以至於三月十二日易簧，心神雖然始終不亂，但病勢至此，不能再以別樣事情，擾其心曲。故此這幾個月內，實沒有什麼事可以報告，這是實可痛心的。

這一次大元帥北行之目的，曾經鄭重宣言，一是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君知道，開國民會議，是打倒軍閥的第一着手，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第一着手。開國民會議，國人是沒有疑問，廢除不平等條約，國人便有些疑問，似乎外交問題，總要在內政清明之後，方纔有解決的希望。如今內政還沒有些整理，便驟然說廢除不平等條約，似乎太早，殊不知內政所以不能清明，是因為軍閥把持，而軍閥所以能把持內政，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在後擁護。徵之往事，袁世凱所以能帝制自為，是因為癸丑之役，能打倒國民黨，而其所以能打倒國民黨，是因為得了五國銀行團二萬萬五千萬元的大借款。袁世凱得了這一批大借款，內用以充實自己的軍隊，外用以收買一般變節的國民黨員和懷貳心的國民黨軍隊，所以釀成癸丑之役，以為帝制自為的張本。以後如馮國璋徐世昌曹錕之流，每逢要做反革命的事業，和國民黨作戰，沒有一次不求助於帝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者沒有一次不助他。所以在反革命的方面，他恃着有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便全然不顧國民反對，將帝國主義者所借給的款項，擴充軍隊，把持政治，以與國民革命為敵。而在革

命的方面，同時向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已經吃力，再加以帝國主義者爲軍閥作揄揚，向國民黨作種種誣蔑，淆惑國民之視聽，以致國民革命之氣勢，爲之阻滯不少。十四年來，中華民國沒有建設得好，甚至十二三年間廣東處於四面受敵之地位，都是這一種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軍閥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國亡無日，還說什麼內政清明，豈不是夢想？所以打倒帝國主義，不但是中國對外自由獨立的必要工作，這些道理從前國內人士往往沒研究清楚，自從大元帥苦心提倡開導之後，方纔漸漸的明白。

開國民會議是奪取軍閥所把持着的政權，還之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毀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施行侵略的武器。故此大元帥的主張，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不願聞的。當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的時候，天津的法領事，竟不許中國各界人士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開會歡迎，還揚言不許大元帥通過法租界。這可說與大元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針鋒相對。而中國的官僚，反以爲這是大元帥不善外交所致，這是何等的夢囈？過了幾日之後，京津一帶，紛紛傳說駐在北京的外交團要以尊

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大元帥聽得，極爲注意。適值交通總長葉恭綽和善後會議籌備主任許世英來見，大元帥詢知實有其事，當時極爲震怒。諸君啊，大元帥所患的肝臟重病，據各國醫生所說，現時世界還沒有治這病的藥，我們不敢說這一番震怒，是大元帥致死的根由，然總是大元帥添病及促其生命的一個原因，這是我們所永永不會忘記的。當時兄弟因爲大元帥震怒，極力勸止，幷自任與葉許兩位切實商量，葉許兩位已經答應向臨時執政商量補救方法。一是在答覆照會裏頭，聲明政府同意於國民修正條約之要求。二是外交次長於答覆照會遞交時，口頭聲明政府對於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完全同意，然其結果，答覆照會裏頭，僅僅說了一句含糊的話。至於口頭聲明便至今也杳無聲息，尊重不平等條約，果然做了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了。須知道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一條鐵練，自滿洲政府套上了這條鐵練之後，至今總沒有掙斷；而且每逢北京政府首領登台的時候，各個帝國主義者，必然要使他認識不平等條約之天經地義。例如民國元年八月的時候，駐京英公使朱爾典向袁世凱提出西藏獨立的要求，並以之

爲承認民國的交換條件；我們想想申午的中日戰爭，便是因爲日本要求高麗獨立而起，那時候中國尚不恤出於一戰，而袁世凱竟以西藏獨立，爲取得英國承認他在民國的地位之交換條件。這是何等的勾當？又如民國十二年冬間，曹錕賄選總統的時候，駐京外交團，便以曹錕承認臨城案爲外交團承認賄選之交換條件，曹錕便也連忙答應。這又是何等勾當？帝國主義者於他們登台的時候，兜頭的給他們一條鐵線。他們爲怯著場台的緣故，便低頭受之不辭，早已成了北京政府的老例了。大元帥北行，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受了一大挫折了。至於開國民會議呢，我們看了一月十七日大元帥覆臨時執政的篠電便可明白，依大元帥在廣州臨行時的宣言，是以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如今篠電連預備會議的名稱也不爭執，只有臨時執政肯於善後會議之內容納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教育會，各大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等代表，使國內各種職業團體得在善後會議之內，主張意見，大元帥便不惜犧牲預備會議的名稱，以贊成善後會議。這樣的讓步，已可謂到極點了。然而臨時執政對於這樣的讓步還不能滿意，只羅致一些未完全的職業團體

代表來做什麼專門委員，且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和上海工部局的華人顧問一樣。主權在民的意味，消失無餘。大元帥北行，以開國民會議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

諸君啊！大元帥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是在大元帥的意中呀，還是在大元帥的意外呢？依兄弟愚見，這是在大元帥意中的。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佈北行目的，并且說道『我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恐國民明白，我便什麼都不管，我便什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之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在大元帥的意中。十二月三十日大元帥入京，市民歡迎以十萬計，三月二十日以後大元帥靈柩停放中央公園內，市民來祭者前後數十萬人。他們不是來看熱鬧，也不是無意識的崇拜。其中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都認識大元帥的主義，至少也欽敬大元帥主張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用心。他們的意思表示，都可以爲證，兄弟敢說中國國民革命的氣勢，已在北方開展了。

當北方革命氣勢開展的時候，正有賴於大元帥領導統率，而大元帥溘然逝去，這豈但是北方人民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也就是大元帥的遺憾。所以大元帥在遺囑上，將生平未了的事，付託於後死同志，除了遺囑所載之外，在三月十一日夜，一息奄奄的時候，反來覆去的，只念著「平和」「奮鬥」「救中國」三句話。真真是一息尚存，不肯少懈，令人悲傷感激，至於無極！「救中國」是大元帥一生的志願，「平和」是中國將來的光明，「奮鬥」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平和是奮鬥的目的，奮鬥是求平和的手段，因為平和兩個字，不是偷生苟活，也不是醉生夢死。人類互助不得謂之平和，不平等不得謂之平。互助平和兩個字，惟有互助平等方纔是眞解。在這樣的不平等社會裏頭，不用奮鬥的方法，不能使不平者歸於平，既不能平，和便無從說起。大元帥一生是一個極仁慈愷惻的人，同時是一個極勇敢強毅的人；惟其大仁是以大勇，故此平和奮鬥，是大元帥一生救中國的大本領。

兄弟常常聽得國裏頭的人，有些將大元帥比美國的華盛頓，有些將大元帥比俄國的列寧。以事功來論，中國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所以大元帥比之華盛頓

列甯爲有遺憾。就環境來論，大元帥所處的艱難困苦，尙非華整頓列甯可比。美國獨立戰爭是華盛頓爲統率，而美國人民的獨立思想運動，醞釀日久，非華盛頓所提倡的。俄國革命運動，將及百年，至列甯而集大成。就列甯的成功看來，實是空前的偉大。然而列甯有深長的俄國革命歷史來做根據，這是他成功偉大的一個原因。至於大元帥呢，四十年前提倡中國革命，由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葉，都是他一手造成。在他人當這環境，只能做一些革命思想運動，而他却已從事於革命實行。這已是在歷史上找不著前例的，揆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例，他當然只能做一辛勤種樹的人。中國國民革命將來定然是成功的，可惜大元帥不及見了。當大元帥病勢沉篤，自知不起的時候，對於革命前途，抱著無限掛念。對於同志之能否繼續奮鬥，抱著無限掛念。在這時候東江戰事接連不斷的捷報，實能使孫大元帥痛苦中得著些安慰。我們同志實在感激總司令，及各位將士的努力。我們同志更盼望總司令及各位將士，早日成功，俾大元帥遺囑上所屬望的一一實現。

國民革命之意義

——十四年九月六日在黃埔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學生會演辭——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派軍隊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以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

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如果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爲贈言，較爲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義。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略，以致留爲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

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無益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於今日時代之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的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之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之存在。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爲國民革命之最大勢力。因爲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爲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爲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於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爲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除

解，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爲深切。帝國主義資本之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之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皆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之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所受的經濟之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於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爲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甯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與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以爲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是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求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的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現在已能以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甯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為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為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

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慶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愷先生為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強幹，只做到帝制洪憲摧敗，便一瞑不視。以廖仲愷先生之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瞑不視。兩位先生之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

在世的時候，爲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麼，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爲人一世也。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爲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十四年八月卅一日在黃埔軍官學校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日為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開追悼會，校長囑咐兄弟說幾句話，兄弟原想將廖先生的歷史敘述一回，但為時間起見，祇將最重要的幾點，簡單的敘述一下。

廖先生一生為黨盡力，他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他所以能為一般同志的領導，由於平日人格的修養。我們要認識廖先生的人格，我們可以看見他最顯著的兩點。一是勤勞，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時，至多十六七小時，是人都知道的。他還有一樣，他無論如何忙法，到臨睡的時候，必要看書，這已成了他自然的習慣，所以他不但對於職務上精神緊張，便是他的學問智識，他能隨時代以增進；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略的。二是廉潔，民國以來，他屢次做財政當局，而他的操守廉潔，始終如一，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人人知道廖先生在東山百子路有

屋一間，但深知底細的人，便可說出這一間屋是他夫人由他母家所得私蓄積聚下來的。大約廖先生，前前後後，至多幫過幾百元或千餘元，他有這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歷久不拔，這一點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廖先生因為有勤勞和廉潔的兩種美德，所以能為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是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養，至於廖先生對於職務的美德，更有兩樣，使我們容易認識，並且永遠不會忘記。一樣是對於總理和黨的決議，忠實服從。廖先生為黨盡力，已有三十多年，他平日在總理左右時間最多，我們看見總理發一議定一策，廖先生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總理採用廖先生的意思，有時總理堅執自己的意思，或採用別人的意思，廖先生對於決議，是一樣忠實的服從，忠實奉行，絕沒有因自己的意思，不蒙採用，而生出隔閡。不但對於總理如此，對於黨的決議亦如此，這樣紀律的精神，真是團體行動的唯一軌範。一樣是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純然以公事為主眼，不參一毫私見。舉例來說，去年春間，廖先生任廣東省長，及中國國民黨改組，廖先生担負工作甚多，覺得不能兼顧，他便辭了廣東

省長，担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工人部長，及軍校黨代表等職。夏間總理因省長難得其人，命廖先生復任，廖先生覺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及至秋間，商團作難，廖先生覺得不能行其抱負，便又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軍校。最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要他担负財政當局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担负起來。由此可見他的出處進退，完全根據着總理和黨的決議，及自己一身如何纔有利於黨，便如何做去，他看得自己一身如黨內一副機器，他的出處進退，於他自己個人是沒有一毫成見的，這真是爲黨服務的模範。許多的人，對於自己的出處進退，縱然看破了權位勢利之爭，然而往往忘不了意氣之爭，這一點意氣之爭，往往誤了許多大事，對於廖先生這般態度，真當愧死。廖先生對於職務，因爲有這兩樣美德，所以能公爾忘私，不知有己，祇知有黨，所以能爲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雖然極其簡略，但是廖先生公正純潔的精神，已經可使我們認識。廖先生因爲有這樣公正純潔的精神，所以能有這樣勇往無前的氣魄，來担负這樣重

大艱苦的責任。他這回的死，完全是爲肯負責任與能負責任而死，死廖先生的，不是欲置廖先生的個人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盡力的黨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領導的一般同志於死，所以死廖先生的，不是廖先生個人的敵人，是黨的敵人，是一般同志的敵人。

敵人爲甚麼要置廖先生於死呢？總括說來，是要妨害中國國民黨的進行，切實說來，是要妨害改組以後中國國民黨的進行。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敵人所以要殺廖先生，是因爲廖先生在於中國國民黨改組期間，担負責任最多，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廖先生是爲改組中國國民黨而死，廖先生是將自己的生命，換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

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呢？兄弟在本校擔任講授黨史，兄弟所講授給諸君的一個最重要觀念，便是時代觀念，用種種理論與事實，證明革命與時代之關係，證明革命是因於時勢之需要而發生。如今要講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也要先將那時代的形勢敘述一回。

民國十二年間，中國的時勢。是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而自己來做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種傀儡的最大任務，是掃除國內一切革命派。所以他看得革命政府如同眼中釘，用大批借款，大批賣國得來的軍械，指使手下一般用慣的嘍囉，從北江方面，攻打廣東。同時指使手下一般新附的嘍囉，從東江，西江，南路，一齊攻打，要把革命政府，困在中心。外面的形勢，已是如此，革命政府的內部又怎樣呢？楊希閔和劉震寰口口聲聲說是追隨總理，實行革命，其實是借着這名義來做盜賊的勾當。水滸傳中的晁蓋說時遷借梁山泊的名目，去偷雞食，楊希閔劉震寰等，便是襲此故智。他們這種行為，比之陳炯明公然對於革命，實行叛逆者，還要可惡！因為公然的叛逆，是與革命分離，他的罪惡，與革命無涉。至於假借革命的名義來做盜賊，將革命掩護他的罪惡，幾乎使革命二字爲所污辱。他們擁戴着總理，而所作所爲，全然與總理相反。他們做種種殃民的事實，使人民受種種的痛苦，同時使總理受種種的痛苦，總理兩次三番，對諸君所說的話，諸君應該記得。總理的不治之症，是他們所激成，總理是

活活被他們氣死，如今想起，還要怒髮衝冠。諸君想想，在那時候一切的革命行動，都看不見了，除了總理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巍然存在，其他一切，都已黯然無色。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已到了存亡繼續的關頭。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起死回生的方法，只有兩樣：一是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二是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要實施這兩種方法。實非容易。第一要革命的意義。明顯指出。第二要將革命的敵人。明顯指出。因為這樣。誰是真正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假革命？方纔分別得清楚。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改組的真正意義。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總理在那時候，已有決心。在那時候，用十二分的努力，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即現時所謂黨軍。以爲總理的臂助的是蔣校長，用十二分的努力，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將改組全黨的計畫，完全達到，以爲總理的臂助，同時對於黨軍，爲蔣校長的臂助的是廖先生。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情形是怎樣呢？只看未改組以前，全黨奄奄不振，改組

以後，至於今日，不過年餘，革命的意義，在一般民衆中，已有普遍的宣傳，及明瞭的認識。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傀儡——大小軍閥——已成爲千夫所指，無所掩蔽，無所逃遁的了。一般民衆，尤其是農工民衆，都齊心一意的傾向本黨，加入國民革命的工作。本黨的進步，已爲世界所注目，不只在中國以內，無與抗衡，同時武裝的黨員，爲掃除國民革命的一切障礙，先將盤踞東江的餘孽，完全擊破，繼將負隅省城的強寇，完全撲滅。這些都是數年以來凶極惡莫敢誰何的，自改組以後，纔能將他肅清。如此說來，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的的確確是有進步，沒退步，無論何人，不能否認。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既然是有進步，那麼，在組織期間工作最多担負責任最重的廖先生，當然爲一般同志所推重，能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只是同志越發推重，則敵人越發仇視。上頭說過，改組的動機，是要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由此可知真正革命的黨員和軍隊，既愛廖先生如手足，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

和軍隊，必然恨廖先生如仇讎。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奔集於國民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之下，自獻其身，作爲傀儡，以與國民革命爲敵，以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廖先生爲敵。廖先生之死。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直接死於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

這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醜類，受了帝國主義的嗾使，謀死廖先生，他不說廖先生的存在，和他反革命假革命的生活，有所不利。他不說廖先生以嚴格訓練黨員和軍隊的結果，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窮蹙，一般假革命的，亦被揭去面具，現出原形，無處躲閃，因而恨廖先生入骨，他卻異想大開的，憑空做出反共產的口號。這口號，正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帶所極力宣傳的。他既然自獻其身，作爲帝國主義的傀儡，當然有做應聲蟲的義務了。這還不足爲意，最無聊的，是一般無所容心的社會，他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反共產，什麼是共產，也不知道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改組，更不知道改組以後真正革命的反革命的假革命的當然要化分起來。不以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要排擠真正革命的，以維持他們虱處禪中的地位。但是真

正革命的，也要清除反革命的假革命的，使此後的進行，能一致而活潑，這種分化，是改組以後必然的現象。他因為莫名其妙，所以看見改組以後的化分，認為一種不幸的分裂。聽見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便恍然的道，『哦，是因為共產反共產，鬧出來的。』這種聲浪，是助成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假革命的聲勢，中了他們的反間計，迷惑一般羣衆加入國民革命的趨向，遲緩了國民革命的進程。這還不甚緊要，最痛心的，是黨內一般青年，意向是純潔的，氣魄是勇敢的。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却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將國民革命一個意念，橫分爲二，這真叫做沒來由了。更可痛心的，是黨內辛苦培植的軍隊，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國民革命前途之一切障礙，正要他們去掃除，軍隊的意念是單純而堅摯的，國民革命是軍隊唯一的意念，真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却也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生生的要他分裂起來。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呢！黨外的人，中了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間計，還有可說，甚至黨內的純潔勇敢的同志也陷於反間計而不自知。所以廖先生在世之時兄弟等幾個人說起來，總是搖頭太息說，『腐敗的已腐敗了，幼稚的如此

幼稚，如何是好！」廖先生被刺之際，當場捉獲兇手陳順，問他的供詞，他說：「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又說：「打死廖先生之後，又可分得萬多銀子。」

哼！這個因為謀財而害命的兇手，他懂得什麼叫做共產？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寫法？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解釋？他公然說出「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的話，來掩飾他「打死廖先生之後可以分得萬多銀子」的罪惡。兄弟所以敢確實明白的對諸君說道：廖先生之死，是死於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他們是將反共產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無窮的罪惡，同時還誘致別人陷入於無窮的罪惡！

！當八月二十一日廖先生的遺體將入棺材裏的時候，他的夫人何香凝同志撫尸哭泣道：「我知道你沒有什麼掛心，最掛心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一句話，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一定在這裏含淚點頭。我們一班後死的人，眼看著廖先生慘死的遺骸，耳聽着廖夫人悲痛的絮語，分明看見廖先生生前辛苦工作之後，搖頭太息的神氣。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想想，你們有使廖先生掛心的沒有呢？

俄國同志，鮑羅庭先生，有一日有一篇極沉痛真摯的演說。他先說七八年間俄國同志，處於四面包圍，竭力奮鬥的時候，曾得過孫先生精神上道德上的援助，使俄國同志看得見東方的光明，引起了同志間互相援助的感情，所以纔有十一年間俄國代表越飛與孫先生在上海見的事，所以纔有十二年間他自己到廣東與孫先生會見的事。孫先生與俄國同志的結合，千言萬語，千條萬理，而簡括說來，不外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因為中國今日，除了這樣，沒有第二條生路。至於俄國同志，何以對於中國國民如此關切呢？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所對抗的是帝國主義，俄國革命所要撲滅的，也是帝國主義，目的相同，當然互相援助。我們同志，在今日裏，只要專心致志，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不必分心其他問題，因為我們同志，最多祇有數十年的命，任這幾十年裏，完成國民革命工作，推倒帝國主義，我們同志，早已安妥穩穩的，睡在地下了，甚麼共產呢，不共產呢，自有我們的子孫，去解決他，用不着我們此時為他操心，鮑先生這一篇演說，何等沉痛，何等真摯。這是明瞭革命的時代觀念，明瞭革命黨人在那時代應該做什麼工作，纔能如此明白坦率的為

我們指點出來。

我們想想，我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呢？如其是的，如其是要三民主義實現的，則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實爲目前唯一的工作。「國民革命」四個字，在孫先生的遺囑裏，劈頭第一句，便說出來，跟着解釋道，「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不止給我們以標語，并給我們以標語的定義了。就民族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民族，將不能自主，以漸歸於淘汰。就民權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還有什麼民權可言。就民生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皆受帝國主義之操縱，一切民生政策，從何說起？所以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必先要實行國民革命，推倒帝國主義，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尤其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意念。一個革命黨人，關於革命的理想，是無窮盡，無止境的，而關於理想之實現，則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落後固不可，躐等亦不可。所以我們今日，除了國民革命之外，不必有第二個意念，亦不容有第二個意念，那些利用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來紛擾我們的意念的，正是帝國主義及

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陰謀毒計。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如果想對於廖先生的掛心，與以安慰，在今日的追悼會裏，在廖先生遺像的面前，喝破了這些陰謀和毒計，我們祇有一個意念；只有一個國民革命的意念，向着國民革命的一條大路，猛力前進。

各位同志，一黨裏頭，領導的人物，是由歷史做成的。少一個是一個。民國五年，死了一個陳英士先生，九年死了一個朱執信先生，十一年死了一個鄧仲元先生，這些損失，在本黨裏，是無可補償的。在那時候，諸先生死，總理仍在，一般同志，仍不失中心的提挈。如今死了一個廖先生，却在總理逝世未久之後，此其關係，比較以上諸先生的死，尤爲重大。我們不幸，當着這個時候，我們不但有無窮的傷心，我們尤其要有無窮的勇氣！

國民革命，已經開始進行了，這進行是不會中輟的，無論有如何的障礙，如何的牽掣，祇能加以頓挫，決不能令其停止。帝國主義的末路，已在我們的眼前，一切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自從真正革命的團結起來以後，已經無復存在之餘地。我們

確信國民革命是必會成功的，至於我們個人能及身見其成功與否，簡直不成問題，我們只有堅固我們的信念，充實我們的勇氣猛向前進。

各位同志，今日在此追悼廖先生，各位同志，將對於國民革命的一個堅決的意念和勇猛實行的志氣，迸發出來，各位同志的精神，與廖先生的精神，融合爲一，廖先生肉體雖死，精神不死，兄弟敢大聲的道，『廖先生並沒有死！廖先生並沒有死！』

悼廖仲愷同志勸諸同志

——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演詞——

當國民革命積極進行的時候，三月十二日，喪失了唯一的領袖與導師孫先生！不及半年，八月二十日，又喪失了最奮鬥最努力的同志廖仲愷先生！我們一般同志恰如一家兄弟，當流離顛沛的時候，喪了慈父，又喪了最親切的兄長，這是何等的悲痛？

當這時候，我們還沒有敘述廖先生生平歷史的餘暇，我們最難過的是廖先生半途遺下的工作，交與何人承認？他艱難百折，成立了黨軍，成立了種種農工團體，最近掃除叛亂之後，他和幾個同志，共同努力於財政統一，他更單獨的努力於軍事統一，這些工作，都已半途放下；這已是他臨死的時候所不能放心，然而他最大的不能放心的，還是他夫人何香凝同志所說，中國國民黨的前途。

人人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所做成的，而

不避勞怨，用十二分的努力來實行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廖先生實是第一人。他不但因此廢寢忘餐，每日做十七八點鐘的工作，他更因此受一般人的怨恨與詛咒。這種怨恨與詛咒，不是他個人的生死關頭，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關頭，我於悼廖仲愷同志的時候，對於此點，不能不鄭重的說幾句話。

中國今日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故此我們同志現在決不會發生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祇有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就現象來說，中國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條生路。就孫先生的遺囑來說，既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項工作。我們既然要反帝國主義，則帝國主義定然以共產兩字相加，這是三兩年來公然的事實，無可疑的。帝國主義既如此，則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當然隨聲附和，因為反帝國主義是目前所必需的，是要合一般民衆共同努力的，沒有可以非難的餘地。所以只有將共產二字，恐嚇一般資產階級民衆，使之自相攜貳，同時和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在黨內挑撥離間，使之自相分裂；這真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最得意的陰謀毒計，這種陰謀毒計，影響於廖先生

個人的生死，更影響於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

我在今日，更無他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甚麼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因為，如果要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為護符，如果要反抗帝國主義，祇問他是否實行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更不必問他是否共產。最可笑的，有少數同志，一面勸人反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排斥左派分子，須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因為增加左派分子，所以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纔能活潑有力，這最顯著的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當商團作亂時代，當東江討伐時代，當廣州附近掃除叛亂時代，當沙基慘案發生時代，左派分子，如何努力，如何奮鬥，我們不應盲目，不應喪心，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左派分子？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廖先生，主張容納左派分子？如果說我們要造就一般三民主義的信徒來實行國民革命，這是應該的，但我們決不應該藉共產二字為口實，以排斥左派分子，這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生死關頭所在。

諸同志，中國國民黨繼續發達，以至今日，是孫先生心力所做成的，而廖先生實是孫先生最大的臂助，八月二十日廖先生橫尸於中央黨部門首，使一般同志，明明白白得了一個廖先生爲黨而死，爲主義而死的最明瞭的印象。廖先生畢命於一瞬息間，沒有半個字的遺言，但我們敢信孫先生的遺言即是廖先生的遺言，我們如果沒忘記中國今日尙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世界上尙有許多窮苦無告的民衆和壓迫的民族，我們祇有向國民革命做去！

革命的分子應有之決心

——十四年九月九日黨軍在北校場開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辭——

廖黨代表死！

廖黨代表爲什麼死的？誰置廖黨代表於死的？

這兩句話，中國人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更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黨軍的同志，尤其不能不問。

廖黨代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他這回的死，是爲國民革命而死，置他于死的，是他的敵人帝國主義。試看廖黨代表死後所有帝國主義報紙論調，及兇手的供詞，可以明白。

只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不是外國人，偏偏是中國人，我們拿着兇手陳順，他的供詞說，『廖仲愷是共產，所以打死他，』又說『某港叫我打死他，打死他之後，我可以分得萬多銀子。』哼，隨便製造一個口號，拿大把的金錢，便可以利用中

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好利害的帝國主義的手段！

各位同志，帝國主義不但是殺廖黨代表用這一種手段，便是殺盡中國人，殺盡中國，也是用這一種手段。民國二年間，五國銀行團借二萬萬五千萬給袁世凱，便將革命黨殺的殺，趕的趕，不能容留在中國以內；民國六年間日本的借三萬萬給段祺瑞，便將西南各處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民國九年以後，英美借幾萬萬給曹錕吳佩孚，便告奮勇，要殺盡中國革命派，川湘各處，次第受其荼毒，而廣東革命政府，更爲其唯一仇殺之目標，以上種種，都是十四年來的事實。各位同志，有從各省來的，有在廣東生長的，不只眼見，而且身受，不用多說。帝國主義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已成了習慣。從前的許多中國人，是這樣死法，許多救中國的中國人，是這樣死法，如今廖黨代表，便是這樣死法，將來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救中國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等到救中國的中國人殺盡了，中國也就殺盡了。

帝國主義不用說，他本是國民革命的敵人，最無聊的，是一般中國人，却甘心

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替國民革命的敵人，來出死力，陳順不過是走狗中之走狗，這一般走狗，中國隨處都有，我們如果要拿兇手，這一般走狗，沒有一個不是兇手。

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救中國人的中國人，已經是在情理之外了，然而這一回的案情，還不止此。是以中國國民黨人殺中國國民黨人。兇手是陳順，陳順是朱卓文所指使的，林樹巍胡毅生趙士觀等是與朱卓文同謀的，他們不都是中國國民黨人麼？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中國國民黨人的責任，而他們却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破壞國民革命，至於謀殺黨裏頭最重要的同志，豈不更是在情理之外？這種原因，無論黨內黨外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於咨嗟太息，以爲「同志間互相殘殺」我們對於此點，以爲有將原因解釋明白之必要。

凡是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其中必含着許多複雜不純的分子，這是自然的事。中國國民黨，在未改組以前，其中分子，可分爲各派，有革命派，有反革命派，有假革命派，有不革命派，改組以後，仍然如此。只是在未改組以前，因鬆弛散漫的

結果，各派繁然雜處，真所謂各不相謀，結合的力不大，排擠的力量也就不大。改組以後，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驟然緊張嚴整起來，團體既由散而整，在其中分子，自然有由雜而純的趨勢，於是革命的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也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不是革命的團結起來，肅清反革命假革命各派，便是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聯合起來，排斥革命派。這種分化，不但是改組以後所不能免的事，並且正是改組之本來目的。如果一個黨，讓種種分子，糅雜在內，那就只有分子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又何貴乎有黨。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正是就將革命的分，團結起來，將所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驅逐出去。那麼，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爲保持他作惡的勢力，自然與革命的分爲敵。我們無論是當局的或是旁觀的，對此現象，總應該分別個是非，不應該咨嗟太息，說一句『同志間互相殘殺』，便作爲了事。

以上所說，不只是黨裏如此，黨所屬的軍隊，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屬於黨的軍隊，也有種種派別：有公然背叛的，如陳炯明等是，這便是所謂反

革命，有假借黨的名義來做盜賊的，如楊希閔劉震寰等是，這便是所謂假革命，至於不革命的呢，一時也說不了許多，總之不肯犧牲個人私利的，皆屬於此派。在革命旗幟之下，有這種種派別的軍隊，於革命不但無利，而且有害。民國十二年間，廣東一切痛苦不堪的現狀，都原因於此，所以創立黨軍，與黨的改組，在那時候，同有一樣的必要。

黨的改組的結果，如馮自由等，便驅逐去了，創立黨軍的結果，陳炯明等，最先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跟着消滅，這便是革命的黨員革命的軍隊團結起來所發生的効力。在這時候，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勢不兩立，固不用說，而假革命的，恐怕揭去面具，現出原形，失了向來的憑藉，其敵視革命的，較反革命時爲尤甚。至於不革命的，因爲要保持他在黨中的安逸和利便，自然和反革命的做一處，以做他們排斥革命派的勾當。廖黨代表之死，便是死於這一般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黨員與軍隊之手。

各位同志，我們是不是革命的黨員？是不是革命的武裝的黨員？是不是和廖黨

代表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其是的，廖黨代表已經做了一個先登陷陣的犧牲者了，我們的戰線，已被敵人搖動了，我們如果不堅持著，拚力向前，我們的戰線，一定為敵人所沈沒，那麼，不但沒有了我們，而且沒有了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按住了傷心，提起了勇氣，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肅清了去。他們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是殺中國國民黨的兇手，是殺中國的兇手，我們要用嚴厲的手段，將他們掃蕩乾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我們對於敵人仁慈，便是對於同志殘忍。各位同志猛省！各位革命的同志猛省！

革命的份子，團結起來，不只要存在，而且要擴充，對於一切敵人，應該無容忍無姑息的，使之消滅，正如古人所謂君子道張，小人道消，欲救中國國民黨，只有此法，欲救中國，只有此法。

我們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外，還應該有一口號，肅清黨內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我們屢屢和國民說道，民國以來所有的變亂，沒有一次不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成。以往事來說，二三年間五國銀行團之於袁世凱，六七年間，日本之於段祺瑞，八九年以來，英美之於曹錕吳佩孚，都是極顯著的事實。以近事來說，在孫先生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國內外，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唆使陳炯明煽亂東江，繼而唆使楊希閔劉震寰跳梁省城；因國民政府對於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堅持反對，及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引誘廣州一般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做那狙擊政府重要人物及危害政府的舉動，繼而引誘東江一班殘餘敵人，做那賣國營私殃民自肥的復興運動。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真真是越做越露骨，越使國民看得清楚。

只是逃不了一個公例，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只有趁國民未覺悟的時候，可以為所欲為，一經國民覺悟之後，他那些勾當，便只有歸於失敗

了。試看看啊，今年二三月間，陳炯明等在東江的破敗，六月間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廣州的破敗，以及八九月間，廣州內外反革命派的次第破敗，香港帝國主義者眼巴巴望着他的內應，已被革命派摧陷廓清了，由此可見國民覺悟之後，決不容國民裏頭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存在。

香港帝國主義者，利用反革命派，危害廣州革命根據地的計畫，已經失敗，知到廣州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沒有入寇的餘地，於是變更計畫，對於東江一般殘餘敵人，將些金錢軍械，作為釣餌，使他擾亂東江，這一般殘餘敵人，不用說，自然便上釣了。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計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使一般殘餘敵人，能夠恢復勢力，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永永做他們的家狗，實行桀犬吠堯的勾當。第二個目的，是利用這般走狗的勢力，將汕頭的罷工團體，盡行解散，罷工勢力，盡行破壞，拔去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兩個目的，現在已經着着進行了。

有覺悟的國民，對於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的計畫，應該怎麼樣呢？

就第一來說，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已把東江餘孽掃平了。何以還要回師廣州？是因爲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的緣故。六月間我們已把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平了，何以七八九三個月，頓兵廣州，不能將東江餘孽，重新戡定？是因爲反革命派的勢力在廣州依然存在的緣故。自從八月二十日廖先生被刺以後，方纔用不妥協不姑息的手段，將廣州及西江五邑反革命派的勢力次第掃除，再將東莞增城寶安一帶，反革命派的勢力，也次第掃除，革命根據地，已經打掃乾淨，從此集合革命派的力，猛向前進，沒有後顧之憂了。將使東江一般殘餘敵人，不來惹我們，我們也要剿滅他，以爲人民除害，何況他自來送死。香港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金錢軍械，只算是給他那一般走狗送終便了。革命派的同志，集合起來，掃平東江餘孽在此一舉！

就第二來說，帝國主義者，利用走狗，欺壓人民是他得意的手段，只看他在天津上海，用這種手段，解散罷工團體，破壞罷工勢力，使一般人民，受更深的欺壓，便可見他手段的利害了。他自然的依樣葫蘆的，將這種手段，在汕頭施展，他不

知道革命政府和罷工團體一致的，革命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團體的勝利，罷工團體的勝利，也就是革命政府的勝利，革命政府既然不容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汕頭苟延殘喘，那麼帝國主義者又何所附適以爲惡呢。

總而言之，有覺悟的國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國民覺悟帝國主義之爲害於中國，同時也就覺悟國民革命之必要，所以日前政府黨部軍隊，省港罷工團體，以及士人農人工人商人，聯合起來，要求和平，要求廣東統一，這便是國民覺悟的一個絕大徵象。

到了今日有覺悟的國民，這種要求，快要實現了，國民爲實行這種要求所必要做的，是以下兩件事。

(一) 統一廣東，要分幾個步驟。第一步驟，是鞏固廣州，因爲廣州是廣東全省中心點，必須將廣州統一，纔能將革命派的勢力，集中在一處。第二步驟，是肅清東江南路，革命派的勢力，既然集中在一處，便自然能夠發展出來，在這時候，廣州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廣東全省人民了。別的不用說，只說軍事的負

担，有東江南路的人民共同負担，廣州人民，自然便減輕了許多；東江南路人民，平時本有對於反革命派的軍事負担，這些負担是無價值的犧牲，如今換了對於革命派的軍事負担，是有價值的，何況這種負担，是與廣州等處人民共同，比從前也就減輕了許多了。這還是就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廣東全省人民的幸福，也就於此得一基礎了。第三步驟，是出兵北伐。民國十三年五六月間我們曾一次出兵北伐，已經進了江西，節節勝利，却因為廣東的根據地，沒有鞏固，致發生變故，不得已的回了轉來。功敗垂成，所以出兵北伐，是以廣東鞏固為前提的。如果廣東統一，現在兵額，至小有五分之四，可以出去北伐，留五分之一，鎮守廣東，後方無憂，前進便可放心了，在這時候，廣東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担，便能均給於全國人民了。關於第二步驟的理論，於此也可完全適用了。總而言之，廣東在這時候，可以說破壞終結，建設開始。以上三個步驟，是要依着次序一一做去不可躐等，也不可半途而廢的。

(二) 援助香港罷工團體，也分幾個步驟，本來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是打倒帝國

主義各種的工作裏頭的一件工作，帝國主義，到了今日雖說末路，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要完全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持久，戰三四年也不定，五六年也不定，在這持久戰中，作戰計畫，爲出奇制勝起見，應當變化無窮。就六月底至九月底來說，因爲省港罷工的緣故，給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一大打擊，使他經濟侵略的進行，受一大頓挫，同時因爲切斷香港廣州間交通的緣故，使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失了奔走穿插的作用，使廣州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不受牽掣，這幾個月的作戰計畫，我們敢斷言已經得了勝利。從九月底起，我們便已變更了作戰計畫了，我們派外交代表團北上，使他們於經過上海九江漢口的時候，都發起外交代表團將五月三十日以來各處慘殺案發生地人民的要求，攏合在一起，更在北京發起各省外交代表團，將全國人民對於外交的主張，攏合在一起，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勢力範圍日趨擴大，同時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托是這一個外交代表團，做成一個統一的運動，打破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各個擊破的陰謀，這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既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

的賠償要求付託於外交代表團，同時由省港罷工團體，將復工條件，自動的提了出來，帝國主義者若是答應呢，省港工人團體，便得了確實的進步，若是不答應呢，帝國主義者之忍心害理，益發暴露無餘。在彼為情見勢絀，在我為進退裕如，這也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抱住了一定的目的，同時應用各種適宜的作戰計畫，那最後的勝利，便有把握了。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件事的步驟和方法，便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助革命軍掃平東江餘孽，因為這是統一廣東的關鍵，也是統一中國的初步。同時還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省港罷工團體務要完全達到所提出的復工條件，因為這不僅是省港罷工工人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是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廣東人民聽者，帝國主義的勢力多減一分，國民革命的勢力便多增進一分。有覺悟的國民一齊起來，鞏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擴大國民革命的運動！

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黨代表演說辭

校長，各位同志，兄弟今日就黨代表職，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託兄弟以黨代表的重責，兄弟初時本不敢擔任，因為本校是蔣校長廖黨代表秉承總理的訓令，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以有今日，如今廖黨代表中道死去，兄弟自顧才力遠不如廖黨代表，恐怕不能和廖黨代表一樣担负重責。而且自從七月以來，國民政府成立，兄弟以中央執行委員資格，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日夕無暇，實在不能專心致意，擔任黨代表的職務，從前廖黨代表已深以兼職為苦，何況兄弟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了。記得從前讀過了一首詩，題目是「哲學家的驢子」，敍說一頭驢子，馱着一輛車子，車子上滿載着什物，那驢子一步一步的，只顧前走，沿途給人在車子上增加什物，他也毫不顧慮，做出一種哲學家的態度，似乎無所不可的。及到後來，載也重了，力也竭了，驢子也倒了，車子也翻了，車子上的什物，都拋落在地上了。這一首詩，對於一般不度德不量力的人

，真是晨鐘暮鼓，兄弟所以不能不有所顧慮。

只是仔細一想，四萬萬人裏頭，纔有百餘萬的黨人，這百餘萬黨人，要替四萬萬人擔當責任，那一個不應該像驢子一樣，所以不度德，不量力，擔當過分的責任，不盡是驢子的罪過，只有一面儘管擔當着，一面希望有別的驢子，來分些擔當，庶幾不至於翻了車子。革命黨人，一面強迫自己，一面喚起同志，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兄弟想了幾回，終於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託了。

兄弟本是本校的講師，和各位同志見面的時候很多，有許多話，留着隨時可說，如今所要說的，是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同志間，應該互相討論，互相解析。兄弟今日以此為演說的題目，比較泛泛的說幾句就職的套話，似乎好些。

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很多，如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主軍與客軍的問題，親俄的問題，在平時本已甚囂塵上，自從八月二十日廖黨代表死事以後，這些問題，尤其成了焦點，即如兄弟和蔣校長，在特別委員會裏，對於時局的處置，也

不免惹起社會間的疑問。關於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兄弟八月三十一日在本校廖黨代表追悼會裏，九月六日在本校第二期學生畢業會裏，已經說過，如今不再說了，如今所要說的，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主軍和客軍，這一類名詞，在廣東是相傳已久，自從八月二十五日，解散了駐省和駐在江門等處的反革命軍隊，九月二十日又解散了駐在東莞增城寶安的反革命軍隊，那些被解散的反革命軍隊，恰恰都是粵軍，而執行解散的任務的，恰恰都是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於是一般造謠的人，紛紛的說道：『這是客軍排斥主軍了，』而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裏，居然也有些自己懷疑自己道，『我們客軍不應該犯此嫌疑。』兄弟如今要問的，什麼叫做客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在中華民國的領土裏，我們明明是主人，如何說是客？我們既不是客，又從那裏跑出主人來？所以客軍和主軍的名詞，實在不通。廣東所以有客軍的名詞，是因為民國二年以來，廣東受了龍濟光所統率的滇軍的蹂躪，跟着又受了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的蹂躪，使廣東人民，容易養成一種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而民國六年以後，革命黨人

裏頭：如陳炯明等，不知道本着革命的精神，來打倒反革命的勢力，確想利用一般人民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使自己的企圖，容易成功，所以九年自漳州回師的時候，便高揚着排斥客軍的口號。果然莫榮新等便在這口號之下被他打倒了，陳炯明等既以排斥客軍自命，當然便以主軍自命。他們以為莫榮新等在廣東並沒有別的罪惡，其罪惡只在一客字，我們既然是主，便一切罪惡，都無所謂罪惡了，所以驅除莫榮新等之後，他們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成功了驕兵悍將。十年進兵廣西，更充分發揮他們驕兵悍將的罪惡，於是十一年六月以後，所謂主軍，為暴於廣東，更什百倍於所謂客軍了。他們的思想，真是奇怪，外省軍隊蹂躪廣東，固然是罪惡，難道廣東軍隊蹂躪廣東便不是罪惡？他們自知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無如在事實上，他們已成了驕兵悍將，回不轉頭，除了蹂躪廣東，再沒有可以施逞他們的獸慾。恰恰在那時候，大軍閥把持中央，藉着統一名目，來擴充地盤，小軍閥割據地方，藉着聯省自治的名目，來保守地盤，他們聽了聯省自治四個字，自然聲入心通的，比着漢高帝要叔孫通制朝儀還要高興了。所以陳炯明等的事業，以排斥客軍始，以聯省自治

終，這都是由於他們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他們如不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便只有革命軍隊打倒反革命軍隊，管他什麼主軍客軍呢。陳炯明等既如此，魏邦平等更不用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的思想，只知道在家鄉發財，做大官，做大地主，此外更無思想，他們以爲本省的官祇許本省人做，不許別省人做，本省的地皮祇許本省人劃，不許別人劃，所以九年驅逐莫榮新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年援桂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炯明是何等罪惡，他們說道：『孫陳都是廣東人，我們守中立罷！』十二年春間，楊希閔劉震寰假藉驅逐陳炯明的名義，進兵廣東，他們於驅逐陳炯明的時候，袖手旁觀，而於陳炯明被驅逐之後，都掛起排斥客軍的招牌，以致被楊希閔劉震寰打倒。十四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他們仍然說道：『陳炯明是廣東人，我們不必幫手去打，』及至六月間，廣州近郊之戰，他們說道，『這是排斥客軍啊，我們要加入。』他們每於外省軍隊駐在廣東擁有勢力之時，便蹙着眉頭說道，『亡省』。哼，他們不怕滅種，卻怕亡省！他們的是非善惡都以省與非省爲斷，所以救國兩個字，是打不動他們的

良心，喚不起他們的勇氣的，深刻的說起來，他們所謂省是供給他們做大官做大地主之省，正所謂省其所省，非吾所謂省，所以他們其始不過是不革命，其終必至於反革命，與陳炯明等的假革命，罪惡維均，所不同的，陳炯明等還扭扭捏捏的道，『聯省自治』，他們却老老實實的道：『服從中央』便了。以上陳明炯魏邦平兩種人，都是在廣東倡主軍客軍的原動者，他們的來源去脈，不過如此，所謂主軍客軍的問題，何值得我們一顧呢？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只知道有所謂革命反革命，不知道有所謂主軍客軍。我們只知道革命團結起來，將反革命的打倒下去，不知道什麼是主什麼是客。二三月間，我們在東江所打倒的，是陳炯明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主軍，我們卻知道這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六月間我們在廣州近郊所打倒的，是楊希閔劉震寰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客軍，我們卻只知道這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要打倒他。然則我們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城和江門等處所解散的，九月二十日在東莞增城寶安所解散的，只知道他是反革命的軍隊便了，管他是客軍抑是主軍呢。兄弟記得十三年秋間，先總理在大本營裏，曾召集一次軍事會議，在座

的多是湘桂軍官；先總理就座以後，默然無言的約十分鐘，方纔說道，『你們於十二年春間，替我出力，趕走陳炯明，我是極感激你們，當時我因爲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所以並不想回來，你們卻派人到上海，請我回來，說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所以我便回廣東來了，誰知你們卻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踐踏我的家鄉，這不要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麼要緊？誰知你們卻不是爲國的，我覺得對家鄉不住，尤其對國家不住，我決意離開你們』，這是何等血誠，何等慘痛，兄弟和先總理患難相從，二十餘年，聽見先總理痛心疾首的這一番話，一生一世，再不能忘的。兄弟也是一個廣東人，站在家鄉裏，兄弟覺得現在各省同志集於廣東，要將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是不革命的，便喝一口水也對廣東人不住，如果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所馱著的車子，廣東人也要分些，不能讓我們獨做驢子。我們現在廣東是如此想，將來出師北伐，經過各省也是如此想，什麼主軍客軍的話，在我們革命軍裏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所謂親俄的問題，在香港上海天津一班帝國主義的報紙中，肆意詆譭，自不必說，國內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跟着狂吠，更不必采他。最可怪的，一班袖手旁觀的不革命派，也在那裏信口開河的道，「他們何苦去親俄呢？」便連革命黨裏頭，也有些懷疑不定的道，「我們何必要親俄呢？」我們對於這些話頭，只能給他一句斷語道。「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須知道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現在何以不得自由平等？因為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此束縛加於中國？是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之最大敵人，所謂軍閥。不過是一些帝國主義之走狗，決不能與帝國主義，相提並論。我們既認帝國主義爲我們最大敵人，我們便不可不考究帝國主義之來源，及其現在之勢力。我們試將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揭開一看，便知道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之敵人，真是世界之敵人。無論將漸滅的紅種，已奴隸的黑種，正在被蹂躪中的棕種，以至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一切黃種，如果覺悟到自己所處黑暗慘淡的地位，是帝國主義所賜，斷沒有不咬牙切齒，認帝國主義爲最大之敵人的。我們對於這些共同目標的世界上

被壓迫民族，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如今世界，固然是白種人橫行霸道的世界，但白種裏頭，以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其實只不過極少數人，如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等等，其最大多數的，都是窮苦無告的人民。他們在種族關係上，似乎和紅黑棕黃諸種人感覺不同，而在階級關係上他們所受的壓迫，正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異。帝國主義一面對於殖民地肆行經濟侵略，一面即以其侵略所得，為鈐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資料，所以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歐洲被壓迫階級，相互間已因共同利害，誘起共同行動。他們共同承認帝國主義為他們共同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共同目標，一致努力打破了種族的界限，成立了世界革命的最大基礎。我們對於他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種人所建立的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己拋棄了從來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死，他好容易從重重的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一切都得了自由，所以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政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

階級覺悟的政策，這真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他的志願，由他的領袖列甯，明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要求解放。我們對於這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進，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從前說瓜分，如今說共管，都是取一致的步驟的，動不動的便英法聯軍，便八國聯軍，動不動的便三國銀行團，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他們帝國主義者間，互相聯合，惟恐不力，看見我們和別人聯合，便大嚷起來，好像我們犯了大不韙似的。哼，說一句粗魯話，這不和無恥的富人，自己娶了十幾個小老婆，欲怕那些小老婆去偷漢子是一樣的用意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卻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供給軍械，卻一手的，將中國無數利權，攞了過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就是怎樣呢，他趨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

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沾過一些便宜。他沒有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爲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却偏會有虛驕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便是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也是尋常的事。爲什麼八國聯軍要舉瓦得西做統帥呢？其他七國，難道便算是放棄主權了麼？爲什麼協商國要舉福熙做聯軍總司令呢？別的國家，且不用說，英國有兵四百萬，美國有兵也不下三百萬，何以要受福熙的節制調遣呢？好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啊，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求人幫助，並且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以求最後的

成功，怪不得叔向說道，「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了」。我們如今得俄國同志道義上的幫助，我們便要扭扭怩怩的，怕人問及。喂，同胞啊，你上了帝國主義者老當了！須知道在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我們始終要和世界被壓迫民族在一起，和歐洲被壓迫階級在一起，和世界革命的先進在一起。我們這聯合戰線，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間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

以上兩種疑問，已經次第說明，各位同志，總可相信兄弟所說的話，句句是出於血誠。兄弟的話，本可於此暫歇，只是兄弟還要說幾句話，我們同志最要緊的，是以誠相處，以誠相處之道。第一要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兄弟的說話行事，如有錯的，各位同志必須質直相告，兄弟如不認錯，便不是人，錯而不改，也不是人。兄弟的說話行事，如其不錯，各位同志，便應該和兄弟一致努力，不然，縱使紀律不來責備，自己的良心也要責備自己的。再者我們同志間，要以感情相結，尤其要以理性相契，所以我們同志間，就感情來說，極其親熱，就理論來說，卻極其嚴正。

。比如最近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特別委員會，拿捕了一些反革命的黨員，和解散了一些反革命的軍隊，有些人便說道：『他們從前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何忍出此？』哼，這便是只知有感情不知有理性的話了，這是封建時代的思想，不是革命時代的思想。封建時代，對於建功立業的人，便要崇德報功，縱使有罪，猶將十世宥之，革命時代，對於有功的人，固然愛之敬之，只是他如有罪，便也不能放過。果因為他有功，便連有罪也不問，那就無異說道『他從前做過許多革命地事，如今應該由他做許多反革命的事來做報酬罷』。那又何須乎有革命呢？革命是向前進的，不是向後退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治一亂，互為循環，正由於這些觀念，弄不清楚。革命時代，豈容再有這種思想！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嚴酷，正是對於革命的人仁慈，反之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仁慈，便正是對於革命的人嚴酷。假使八月廿五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壓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必因着廖黨代表的死，繼長增高起來，將革命的勢力，推倒無餘，廣州便不能為革命的根據地了，還想出師東江南路，使廣東統一於革命勢力之下麼？又假使九月二十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

，那麼反革命的勢力依然存在，縱使我們出師東江南路回頭一看，廣州已成爲反革命的根據地，至少要像今年二三月間用兵東江一樣，於收復東江之後，仍不能不將東江拋棄，回師廣州了，這不時將同志的血肉，做無代價的犧牲麼？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反革命派讓一步，便是使反革命勢力進一步。革命勢力退一步，我就引反革命派出了生路，便是引革命派入了死路，我們有革命的意義極嚴肅的立在前頭，使我們不能不收斂感情歸於理性。有些人說道，『八月二十五日的結果，使胡漢民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九月二十日的結果，使許崇智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他兩個都不是反革命的人，何以如此待遇？』須知道他兩人誠然不是反革命，而許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圍他，擁戴他，又何能投鼠忌器呢？『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封建時代，尙且有此思想，何況革命時代。民國十四年來，所以亂個不已，不是由於敵人之跋扈，却是由於同志間之姑息，姑息二字，真是萬惡的歸宿地，同時又是萬惡的發源地。許多好好的革命同志，就姑息二字，生生的作成他做了反革命，說起來真是痛心不盡。兄弟

今日沒有別的要求，所要求的，兄弟若有反革命的行為，各位同志便立刻將兄弟打倒，因為我們同志，今日所需要的，是對於反革命派取不姑息的手段，必要如此，方纔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

兄弟的話，已說完了，當東征軍將出發的時候，各位同志，有往前方努力的，有在後方服務的，兄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國民革命軍勝利，國民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自由平等萬歲！

國民政府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這裏開國民政府特別黨部的成立大會，論起這個特別黨部，原來是由大本營來的。不過從本年七月一號起，國民政府才成立，一路又因為國家多故，直至今天才有這個黨部的正式成立，有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選出。單就這點來看，我們對於黨的前途，實在是很有希望，我們想到這個國民政府的來由，大家都知道是由大本營改組而來，當日的大本營，是由我們的總理孫先生親自統率的。現在孫先生雖然不在，但是我們現在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不論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衛士，大都是跟孫先生，為國民革命奮鬥多年的同志，其中還有些新的同志，也是因為想竟孫先生生平未竟之志，入國民政府服務的。故此兄弟今天對於座中各位同志，更加有特別感情，我們很是不幸，在半途上失了我們的總理，這在全國的民衆，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在中國國民黨的同志，也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但尤其比較別人加倍的痛惜的，可說是國民政府的同人！本府中的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

，大多數都是和孫總理日夕親近的，各位衛士都曾爲總理出過死力，自從在觀音山悍衛總統府，一直到總理去世，都不曾離開過總理的。故此今日凡在這裏服務的同志，於大家悲痛之中，便自然地生出一種互相親愛的感情。如果大家都一致團結，把國家的事情努力，弄個妥當，那末，我們才對得住總理。否則我們大家都不爭氣，把總理的遺囑置之腦後，那就總理雖死也不能瞑目了！這一點我們在黨部的各種聚會，常常生出這個感觸，但在今天却感觸更深，我們試想想大本營爲什麼要改組做國民政府呢？因爲總理已經死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實在是當然的，這一層原本不必等到七月一日，已經知道的了。也不必等到三月十二總理逝世之後，就已經知道的了。當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初間，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訂黨章時候，我們就老早已經知道，如果一旦總理死後，黨政府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會再有第二位總理的。這在黨章上寫得很爲清楚，大家是可以見得的，黨章上面並不說是『本黨設總理一人，』是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本黨除孫先生之外，是不會有第二個總理的了。如果孫

先生之外，還有總理，那末，黨章內應該說『本黨設總理一人』才是，爲什麼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呢？』在這一條黨章上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本黨所以有總理的緣故，是因爲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導師。自從興中會，而同盟會，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四十年來，都沒有過別一個人做首領的。所以他實是本黨一個天然的歷史的總理，如今孫先生不幸死了！那末在黨便不會再有總理。在黨政府，便不會再有元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事情，國民政府是受黨的委託的，黨的組織，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的組織，也自然同樣是採用委員制，是毫無疑義的，當着孫先生未死，我們可以一意跟着這個唯一的導師。孫先生既死，我們採用委員制，要使各人都盡其所能，以共同負荷總理所交付的責任，繼續國民革命未竟的工作，這就是國民政府所以成立的原因。

因此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是十分哀痛，一方面却是十分勇敢，所以哀痛的是孫先生既死，從今再沒有這樣偉大的總理做同志的導師，再沒有這樣英

明的元首做國民的領袖了！所以勇敢的，是總理既把他四十年未了的巨大工作，交付給同志，同志如果連一點勇氣也沒有，那末黨也可以從此消滅，國民革命也可以從此停止進行了，試問我們各位同志，是否願意看見國民革命的事業，就要跟着總理一同死去？如果不然，便應當振作起我們的勇氣，去擔負各項的工作。這是無可逃的責任啊！

自本年三月十二總理逝世，許多敵人以為中國國民黨也將要同歸於盡，不知總理生前對於這一着，是老早看見，老早曉得的了。總理在十三年時自己已知道不能夠久在世上，這也并不是因為總理的精神體魄已經支持不來，實在因為近年來所受軍事上的痛苦，在在足以危險到總理的生命。座中同志許多是前日大本營的文武官吏，大家總見得總理這兩年來，近則受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的掣肘，遠則受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如何的可痛？老實地說，如果當十二年時總理一旦死去，中國國民黨或會一蹶不起也未可料，為什麼呢？因為那時新的分子既一些不曾加入，舊的分子又日趨於腐化，就軍隊來看，真實忠心於主義，忠心於總理的，都受驕

兵悍將的壓迫，一點力量都沒有。那時的軍隊，那些是能夠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呢，當時正恰有人謠傳總理逝世。如果謠傳果變成實事，那黨的前途，縱然未必就死，恐怕也不是今日的樣子了。

總理自從聽過這回謠言之後，所以在百忙之中，也要抽點時間，把他一生創造的三民主義演講出來，又把二十五條建國大綱，親手寫成，好叫後死的同志有所遵依，直到今年春間，他病將不起，更清清楚楚的在遺囑上把他生前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列舉在遺囑上面。其中建國方略，是民十以前做成的，建國大綱，是民國十三年寫成的，三民主義是他一面講演，一面叫同志筆述，再經他自己親自校勘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他親自提出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這些實在通通是總理的遺囑，並不是從本年三月十一才寫起的來啊。既然有了這幾種重要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的精神却還存在，他到如今仍然可以做我們的指導。我們固然知道現在黨的生命，和黨軍的成立，國民黨之改組，都有極大的關係，但是比較這兩事還更重要的，實是在乎孫總理給

我們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幾件重要的著作既經完成，總理覺得他自己縱然不幸死去，也可以放心了，他的精神，他的主義，他的革命方略，都可以交給同志去繼承。那末，黨就可以不死了。有什麼憑據證明黨是不死，當本年三月總理尚在病中，黨軍肅清東江的戰績，已經傳到總理的耳中，這是一事。到本年六月譚組庵朱益之許崇智蔣介石諸同志，又把幾年來所痛心疾首的楊希閔劉震寰一起掃除，這又是一事。這就是剛才所說的一方哀痛，與一方勇敢，如果沒有總理的各種遺教，也沒有同志去接受總理的遺教，這樣孫總理才真是死了，黨也真是隨着總理一同死了！現在幸而還有這一幫忠誠的同志，願意拿他的勇氣去担負艱巨的工作，拿少數窮困的軍隊，居然肅清東江的陳軍，掃滅廣州的劉楊，使國民政府能夠成立。實都是一種勇敢的精神！

可是我們一面拚着命去做革命的工作，一面許多人却有點懷疑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拿不妥協的態度，解散了許多軍隊，得罪了許多黨人，因之許多人以為我們是太過鹵莽滅裂，但我們平心靜氣想想，我們究竟是否鹵莽滅裂，我們的不妥協是從

勇敢來的，勇敢是從哀痛來的。現在總理已死，我們總不想把總理的遺囑，成爲空文，我們總是想方法去實現遺囑上所交付的工作。那末，我們便不得不努力去奮鬥，求衝破這個惡劣的環境了。就拿十月三日我們把熊克武軍隊處分，這一件事來說，這是我們最近的不妥協的動作，因此便引起許多外面的同志，把我們詈罵，也許在廣州的同志，也一樣的詈罵，亦未可定。但是兄弟請各位同志試想想，前幾天的情形如何，就可以了然了，如果熊克武的軍隊還在北江，我們現在能夠調兵去肅清南路嗎？前幾天南路軍事最緊急的時候，陳銘樞師長僅以三千餘衆，抵過萬的敵人，幾乎給敵人圍困住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師既要衛戍廣州，不能調動，除掉第二三軍還有誰可以去援救他。但設使熊克武的部下，還在連縣，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夠調動呢？當然熊克武來到廣州時，我們已經查得他一方密電，他的所部由連縣開到含洸，一面由但懋辛駐港和陳炯明互相拉攏。幸而第二三軍能夠趕快把川軍解決，到前幾天，譚組庵同志所部才可以星夜趕到江門，朱益之同志所部可以星夜趕到鶴山，南路的軍事，至此才可以勝利。設使處置川軍略慢一點，恐怕現在的熊克武，

已經蟠踞着廣州，要說什麼武裝調停，招請陳炯明來省議和了！所以我們的不妥協是勇敢，不是鹵莽，而這種勇敢，却又是從很深的哀痛中生出來的，我們既自承是孫先生的信徒，那末無論什麼困難的事，我們都敢去做的，國民政府所以存在，也全在這一點勇敢的精神了。目下我們一方要和驕兵悍將打仗，一方又要和貪官污吏打仗，和驕兵悍將打仗，固然要拚命，但和貪官污吏打仗也一樣要拚命的，你拿他一個貪官污吏，他就有許多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重重包圍着你，不許你動彈，我們如果不是根據哀痛中的勇敢，更如何能夠衝破這種惡劣的環境？生出新的生命來！

我們幹天下事情，總不外是理性和情感，我們沒情感便不必言仁愛，但我們沒有理性以節制情感，也將變成情面的動物，國事就要敗在我們的手上，總理的遺囑，更無法可以實行了。

今天在這裏開黨部成立大會，離總理的死還不到一年，回想前事，自然是無限哀痛。可是我們大家也要在哀痛之中，生出勇敢，拿起十二分精神把總理遺囑去實

現。那末，我們才可以不負總理，現在有些人受了北京政府的餽養，和安福系的指使，竟造謠言說這遺囑是假的，當時孫先生家人和許多同志，都在場看見清清楚楚的簽字作證，假從何來？這本不必多辨，但這些人爲什麼要說總理的遺囑是假的呢？因爲有這遺囑，然後總理雖死而精神還在，就是總理的說話到現在還有效力。那些本黨的敵人，平日想殺害總理，想沒有中國國民黨去做革命的工作的，到現在他們所希望的已成妄想，就要造出這一條中傷中國國民黨的毒計來，但是敵人縱然用盡他們的詭謀，到底是沒有法子能夠把孫先生的精神弄死的。

座中各位同志，現在一塊辦事，大家都是跟從孫先生多年的。彼此實像兄弟一樣，這個國民政府原不是直接做事的，不像省政府和市政府都各有他的直接處理的本務，國民政府的工作，是在乎通盤的計劃，接受本黨最高的指導。如果大家團結，本着哀痛中的勇敢，恪守着總理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仍然可以常在我們的面前，領導着我們去革命。這就是本黨的元氣，但使這點元氣能夠繼續保持，我們便不枉與大元帥共事一場。

今天在此演說，兄弟實在感觸着無限的哀痛，因為我們的總理，已經不在！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有人問道：「革命派裏頭，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的，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卻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為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為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為革命派心地是光明的，頭腦是純潔的，他所窮思力索的，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我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慮到我們曾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困難，故早已清清楚楚的，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一切困

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接着說明社會主義之來源，并對於馬克思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三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思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力求進步，我們對於馬克思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才不枉為總理的信徒，為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思學說如仇讎，甚至連馬克思學說也禁止閱看呢？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但是為什麼不將第二講一直去看呢？總理說道。『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有的，我們要事實做材料，才能定出方法，如果單

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真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勢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事實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且也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裏，對於我們，已經諄諄告誡，說以為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牢牢記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因為我平日主張，對於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孟浪解釋，以致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為耳朵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沸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

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我們爲什麼要做總理信徒呢？因爲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此一腔熱血，無所有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爲切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爲有興味研究資料，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要實現他，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事以來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事實，也不會

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的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為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是怎樣的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引申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又因受帝國主義侵略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馴至於不能保國并不能保種，所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裏，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裏，也因為看清楚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擔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

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落後固不可，躡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略，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爲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使中國人民不至羅國亡滅種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上，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談天說地，要怎樣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將總理的學說，應用於國民革命的實際工作，因爲這樣纔是真的推崇總理的學說。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如此，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是如此。他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纔有工夫嘔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

民革命的戰線上，和敵人拚命，那有工夫嘔這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於因此惹起爭執。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可以批評：民生主義第一講裏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所以單就批評來講，不但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可以纏個不清，便是共產派裏頭也可以纏個不清，我們如果要做實際工作，則必定依總理所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那麼，我們研究對象，是中國目前的事實，對於這一種事實，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這裏頭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上頭說過，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是國民革命，便是因為中國目前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所以即使馬克思復生於今日，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列甯是馬克思的信徒，而列甯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略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猶如這種病症，便用這種醫藥。一

般庸醫，學理不明，認症不清，對於病人的症候，往往七嘴八舌亂說，高手的醫生，決不會如此，斷症用藥，只有小異，決無大差。中國今日所以成爲遠東病夫，便是因爲中了帝國主義的毒，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實無第二樣起死回生的良藥。所以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只要實實在在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也不愧爲馬克思的後覺，至於總理和馬克思學說之價值咧，思想見解之異同咧，留在高等研究科學的講堂裏，慢慢的研究，也并不爲遲。再拿些例來說，國民革命的工作，第一要喚起民衆。這是無可疑的。有人說道：『馬克思的學說，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總理的學說，是主張全民革命，截然不同』。這若專就研究和批評來講，自然會造出許多的文章，若在實際工作來講，我們主張全民革命，是否要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呢？中國平均一百人裏頭，有八十至八十五是農民，我們如果忘了農民。則一百人中，忘了八十至八十五人，試問全些什麼，連半也說不足，這還單就農民來說，若連工人算上，自然更不止此數。由此可知所謂全民革命，一定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了。有人說道

：『主張全民革命，雖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而同時沒有忘了其他階級之利益，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則勢必面及其他階級之利益爲犧牲』。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上頭說過，凡是解決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可見得無論何等學理，都要受時代與環境之支配。例如俄國革命，托爾斯基主張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行無間斷的革命，以造成共產。列甯則主張引導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攜手合作，以集中革命的勢力。俄國革命的成功，還是由於列甯主張之實行，這便因爲列甯之主張，能夠適應俄國的時代與環境。列甯之引導農民階級參加革命，固然爲集中革命的勢力打算，而農民因參加革命之故，於農民階級的利益得了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其參加革命，不爲徒勞。中國今日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不獨農工階級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即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亦同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如果知識階級實業階級覺悟到國民革命之必要而積極參加，其結果不但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其本身階級之利益亦必得到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何至爲農工階級之利益的犧牲呢？由此說來，總理的主張全民革命，一方面固然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

一方面沒有忘記其他階級之利益。不獨總理的信徒要熱心實行此主張，即馬克思的信徒，在中國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頭，也必以此主張爲至當。最近胡漢民先生自莫斯科來信，述第三國際東方部的談話，即是主張中國現在國民革命，要求知識階級實業階級的參加，這正是一個顯著的例證。須知道我們爲民衆而革命，同時要求民衆參加革命，使革命之利益，歸於民衆。這是必要的理論和方法。所以革命派也好，非革命派也好，如果做實際工作，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還有一義，馬克思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和總理主張軍政訓政，在名義上雖然不同，在實質上則爲一致，賅括言之，不外以黨治國而已。以黨治國，與開明專制，所以不同，其最大條件有三：（一）以黨治國，是引導民衆的，開明專制，是壓制民衆的，（二）以黨治國，是以民衆爲基礎的，開明專制，是以一人爲基礎的。（三）以黨治國，是代表民衆的利益，開明專制，是代表一人的支配慾。有此三者，所以開明專制，不免人有政舉，人亡政息，而以黨治國，則民衆經一度訓練之後，却能夠爲用政權，以舉全民政治之實。總理在革命運動時代，即制定建國大綱，將革命時

期，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段落，辛亥之役，此種主張，未能見之實行，遂致決然辭職，民國八年，著建國方略，曾經於此再三致意。當時總理懷着這種理想，因爲未得實地試驗，全國人民，對之還沒有生出信仰，却料不到俄國革命，實行以黨治國之主張，與總理的理想，如出一轍。所以總理當時非常愉快，屢屢對我們說：俄國革命，一定成功。而俄國革命黨人，讀建國方略，得知總理有此主張，亦不禁悠然生敬服之志。總理與俄國革命，精神契合，此亦其一端。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手書建國大綱，將革命進行計畫，全盤披露。軍政時期，掃除革命之障礙。訓政時期，施行政治訓練於民衆。憲政時期，將政權付之民衆。這樣的有條不紊，對於現在之時代與環境，施行對症發藥的救治，同時創造新時代與新環境，一般舊黨員，如果覺到辛亥以來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一定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一般新黨員，看見俄國革命實收以黨治國的效果，一定也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實際上工作，總是一樣的。

如此說來，我們如果自己承認是革命派。自己承認要做實際工作，那麼我們裏

頭，決不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

我也知道，共產派裏頭，也有些不肖份子，總理已經說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常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總理這番說話，何等公正。可知道因共產派裏頭有些不肖分子，而遷怒及之，必更爲總理所不許。

自從總理殞了三民主義的講義之後，凡是革命派，無論爲共產派，爲非共產派，都一致努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今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以至最近十月十一月間東江南路之戰，國民革命軍的將士，一堆之戰死的尸骸，沒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的分別，已枕藉在一處，所流出來的熱血，已凝結成一塊了，他們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死，我們何不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生。說到這裏，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我敢毅然決然的說道：我們如果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而妄生共產與非共

產的分別，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者，決非總理的信徒。

今年中秋節之夜，我在黃埔軍官學校裏，有一場演說，其中曾引一段驢子的故事，如今再引一段。有一驢子，肚子餓了，在青草地上，左望一張草，以為不如右邊的好吃，右望一張草，又以為不如左邊的好吃，如此反反覆覆的，左望了右望，右望了左望，一直的到死了，那青草還沒有到口，唉！總理的信徒，本已不多，有些做不度德不量力，以至於反車的驢子，有些做游移不定以至於自己餓死自己的驢子，還敢望能繼續總理完了的工作成就總理未完的志願麼？說到這裏，我也不忍再說下去了。

歡迎港僑之演說詞

民國十二年廣東爲最痛苦……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勾結害民……革命事業之新基……掃除驕兵悍將之功夫已做到……軍政財政統一之效果……第二步是肅清土匪製定預算……國民政府先保護產業再開發產業……實行共產是完全謠言……希望人民與政府合作……聯俄之理由與俄人助中國革命之實情……革命不分國界……廣東統一後宜注重建設……國民革命是保障全民的利益……農工商休戚相共……農工運動並不壓迫商界

今天諸君惠臨廣州，兄弟受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委託，敬致歡迎之詞。本來今天的敍會，單說歡迎兩字，還不足以表出我們的誠意的。怎樣解釋呢？因爲政府是人民的公僕，諸君是民國主人，在政府辦事的人，正如一間商店的夥計，諸君才是商店的股東。現在各位來到廣州，就如股東到他的商店去查數，看看商店裏一班夥計，究竟有沒有偷懶，有沒有侵吞，有沒有做過不可告人之事，有沒有把這一盤生意

弄壞。我們做夥計的，看見東家到了，祇開這個歡迎會，一方是思報告過去的情形，一方就要求股東諸君的指教，不客氣的指教，所以歡迎兩字，還不足以盡政府委員諸人的意思的。

說起中華民國，實是以人民為基礎的，無論在國境以內或國境以外的中國人民，他們對國家的資格，都是一樣，他們主人的地位都是一樣。我們更知得在辛亥革命以前，海外的同胞，對於民國的關係，比之國內的，實在更為深切。因為在海外

的同胞，他的認識，比較在國內的更為清楚。所以民國之成立，實以海外僑胞之力居多。而各位就是僑居國外的，對於中華民國，是曾經負過很大的責任的，實可說就是中華民國的大股東。諸君此次到省，最先見着的，大概就是廣東的人民，現在還有許多痛苦，還未得到安樂的境地，而且諸君自己，自從本年六月念四日以後，商務受很大的打擊，也嘗了不少的痛苦。但諸君最先到省慰問罷工工友，便是已經知道他們的痛苦絕不減於各位，甚至深於各位。他們在港時許多是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的，到現在却遇冷沒有適體的衣裳，遇餓沒有適口的飲食，在這種意念之下

我們可以知道，在港的僑商，和離港的僑工，都是受着同一的痛苦，都是爲同一的目的，而受同一的痛苦。這兩日間，各位和各工友互相慰問，互相勉勵，當知大家都是盡國民的天職，爲國家而受痛苦，所以彼此都感有無限的同情。兄弟敢說這不但是廣東前途的光明，也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光明。

我們做夥計一方見得東家這樣留心店務。當然更應該極力去做，但一方也見得現在的店務，還未妥當，現在的招牌，還未大行，深覺慚愧。地。實在說，這幾年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受摧殘也太甚了，這豈特股東應該嘖有煩言，就是做夥計的也有許多難言之痛呢。現在兄弟就趁着這個機會，把有些各位還不能知道的事，向各位作個詳細的報告。

我們今天應最先想起的便是民國十二年廣東的情形，實在可以說是入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是自前清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我們革命黨的志願，原想拿廣東做革命的根據地以改造中國的，眼見着這種情形，其痛苦更加可知。今止引孫中山先生當年的一番話，各位就可以明白。孫先生自十二年春間返粵，到是年冬間，曾召集

各將領開過一次軍事會議。那時楊希閔劉震寰都有份列席的，孫先生出席後，足足有十分鐘之久，默坐不能出聲，大家也面面相覷，覺得難過。後來孫先生卒於起立發言了。他說，「滇桂軍各位軍官，你們爲趕走了陳炯明，是我所很感激的，我當時因爲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原不想回廣東的，我止想在上海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就是了。但是各位都派代表到上海來見我，要求我回到廣東，并聲言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這是我更加感激你們的。這裏知道我們到廣東，這一來，各人都是戴着我（中山先生自稱）的幌子，來糟蹋我家鄉。」各位想想，孫先生這一番說話，是如何的沉痛？在我們二十年患難相從的黨人，更是感覺如何的沉痛！後來孫先生更繼續着說，「這還不打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是願意犧牲的。如果把廣東糟蹋，而於中國有益了，我便約同家鄉的父老子弟，一齊犧牲，也在所不惜。但是我的家鄉這樣的糟蹋，而於國家還是毫無裨益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同在一塊辦事，」當時楊希閔等聽了這般話，臉上都是有些變色了，他們回答的話，是「大元帥今天何必這樣生氣呢，我們都是服從大元帥的，生殺都惟

大元帥所命。要我們怎麼樣，我們服從就是了。」隨後孫先生就提出軍權統一財政統一的辦法，他們是席下都一律贊成通過了。可是會議一散之後，他們止是說兩句，「老頭子又發脾氣」，就算了。

自此以後，他們連軍事會議也不肯出席，民國十二年以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卒於無法挽救，痛心不痛心呢？在這種現狀之下，難怪人民攻擊我們革命黨的。我們革命黨也自己知道是該攻擊的。他們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互相聯結，日日來做害民的勾當，弄到滿地烟賭，滿地盜賊，廣東人民如何不怒？而且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在一般人民看來，都是革命黨引他來的，更如何不怒！去年廣州的商團反對我們，我們也是明白他們爲什麼要反對的，可是他們當時偏找廖行超（滇軍將領）等來做居間調停，却真是顛倒之極。我記得孫先生當時曾有一次找商團各位到大本營談話：廖行超也都在座。孫先生當時是痛心極了，就很誠懇的對他們說：「廣東的壞，就是這班人不聽我話弄壞的，你們應該和我聯合去抵制他們，爲什麼反要聯絡他們來抵制我呢？」孫先生說這一番話，是明知或者會惹起廖行超等人的

反抗的，可是也不顧一切，無畏地說出來了。雖則如此，商團竟漠然無動於心，以致鬧出一場大禍。

但是孫先生在那時候，早已知道這些軍閥是靠不住的，他已經另外的把革命的事業，建好了一個基礎，把中國國民黨改組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造就些真實革命的人材以備將來掃清那些反革命假革命的驕兵悍將，因此才有今年三月的肅清東江，才有今年六月的掃除楊劉，才有八月二十五日的捕拿驕兵悍將，才有九月二十的解散東莞增城的反動軍隊，才有十月三日的消滅做陳炯明內應的熊克武軍隊，才有十月至十一月的再平東江，才有十一月至十二月的肅清南路。目前急應做的事，賴國民革命軍諸軍之忠勇，已算八九做成了，止有雷州瓊州，現尚未下，大約不須一月，也可以完全收復了。可是這樣的連月用兵，實足以加增廣東人民的負擔。各位此次來省，見着許多應做的事還未有做，就是因為許多錢都已經用之于軍費啊。但是為掃除這些驕兵悍將而用兵，也是無法可免之事，試問不先把這等害民的軍隊掃清，各樣應與應革之事，又何從辦到呢？

這等驕兵悍將爲害之烈，也不必說別樣，單拿多數下級兵士的生活來說，就想可知了。記得他們這些兵士會串一首歌兒，「你說我是兵，我却沒有餉，你說我是賊，我却有官長，你說我是乞兒嗎，我却有枝槍。」由此可知，一般兵士的孤寒病苦。廣東人現在所負的重担，如果真爲一般兵士的餉項，也還值得，若大批的被這些不法軍官吞蝕，却就令人難忍了。所以我們才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實行財政統一，先把廣東的錢，收歸政府來公平支配。但因此便受驕兵悍將種種的牽掣，不知冒盡了多少危險造成今日的局面。現在國民革命軍的口號，却是「不拉夫，不籌餉。」這兩句話，各位但看這回東征，廣州有沒有拉過夫，各軍有沒有自由的籌過餉，就可以相信這個口號，並非徒託空言了。這就是軍政統一財政統一後的效果。我們雖不敢說，現在國民革命軍，已經做過完全能夠保護人民，但各位至少也應見着廣州市內現在已沒有軍隊霸佔民房的事情。計自從七月以後，由政府命令各軍遷出民房的，已有千餘家之多，從前以爲這件事是萬難辦到的，現在却已辦到了。雖然離廣州市遠些的地方，或尙未免有此等事，但各軍經過政治訓練以後，這個

基礎已經打好，將來是一定更有進步的。

第一步驕兵悍將既經肅清，第二便步是肅清土匪。這等土匪，拿着槍就是盜賊放下槍就是人民，實在是最難消滅的。這個土匪問題，很大很重，自然是非開闢實業不能根本救治。但說到開發實業，便非要人民和政府合作不可。孫先生曾有過兩句格言遺給我們，第一句是軍隊與人民合作，第二句是人民與政府合作。但必先行第一步，乃可及第二步，現在可算是已經行到第二步了。照現在的軍額餉項來算，廣東的收入，雖尙未敷支出，但所幸的前時沒有預算，現在都已有了，自從預算委員會組織以後，到現在已經把預算做妥，雖則每月還欠四十七萬，仍然未有着落，但比之從前無數可計的，却勝得多了。此後或將拿五分之四的軍隊，向廣東省外發展，留回五分之一在廣東守衛。廣東人到了此時，擔子便減輕得多，保管有安樂的日子了。

目下國民政府固然尙在草創時代，許多事都還未能夠做到的。但同時便有許多失職的軍人，無聊的政客，製造出種種的謠言，兄弟也不敢說座中各位東家，沒有

這種疑惑的。甚願就在今天，向各位說明一下，謠言最厲害的，就是說我們共產，實則吾國今日產業且無，共於何有？如果說句憤懣話，則造謠的軍人政客，才正是實行共剝，他們的共剝，是剝地皮之剝，聯合許多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同心合力去害國害民，這才是共剝呢，現在國民政府，却正要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第一步去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第二步去土匪，所爲的無非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將來河道肅清，使土匪不能再有騷擾人民，把各處人民的力量，充實起來，這時便可以做到開發產業，政府現在的計劃，就是先做保護產業，然後才做開發產業的。因爲我們現在想請各位實業家來開發產業，也是說不過意，如許多人半路在舟上給土匪擄去，甚至有時連船也一併被匪搶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實業家回去且不敢，更何況從講到開發實業呢？所以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終日都爲此大事担心，爲此大事努力，就用自己的血，能博得人民的產業安甯，也都願意做的，各位由此便可信共產是必無之事了。

謠言的第二種便是說我們聯俄。須知道聯俄是事實。我們只要問孫先生爲什麼

聯俄呢？是因爲俄國已經取銷了不平等條約。蘇俄自革命以來，便已決定對中國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直到民國十三年，便派加拉罕到中國，締結中俄協定，把所有以前俄皇時代與中國所訂不平等條約一概廢除。他既以平等待我，我爲什麼不和他攜手呢。去年十二月初間，孫先生到天津，已經臥病，張作霖一日約兄弟和他談話，他說「從前我以爲孫先生是一個怎樣難商量的人，如今見過他，不知他這樣忠厚，我很同情他幾十年的奮鬥，還沒有成功，故很想替他幫忙，可是各國公使，却沒有一個說孫先生好話的，因爲他親俄呀。」他并且誠懇的向我說道，「如果你能夠勸先生和俄國斷了關係，我是一定能夠担保各國都和孫先生做好朋友的。」我當時答他，「事很是容易，我們所以和俄國好，因爲他取銷了不平等條約，如果各國都取銷了不平等條約，也就是我們的好友了。」他聽了，已覺得不合口味，我知道當時外交團，是正在拿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因此更對他說明，歷年來我們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怎樣力爭不肯退讓的，就是爲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放鬆的。可是他至此便已見得說話不接頭，不久且

表示絕交的態度了，所謂臨時執政，竟然在十二月十四日就以「外崇國信」四字，答應外交團的要求，把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置之腦後了，這就是今日五卅以後各地慘案的來由，軍閥之不足與言救國，也就於此完全證實了。

我們須知道國際之間，必先要平等，可以說到親愛。主人之於奴隸，止言恩惠，不言親愛，就是因為彼此本不平等，兄弟朋友夫婦所以能說親愛，就是因為彼此平等。他們列強既不以平等待我，更何有親善之可言。俄國既以平等待我，我又為什麼不可以和他親善，這都是很淺白的道理。

如今更說明為什麼有許多俄國同志來到廣東，來幫助我們革命呢？如鮑羅庭先生，我們請他做高等顧問，出席於政治委員會。他在政治委員會裏，真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苦痛也和我們大家同受，有患難也和我們大家同當，實是很難得的革命同志。反對黨的人，如果見我們措施不妥，儘可直接攻擊我們，為什麼不攻擊有表決權的政治委員，却去攻擊祇有發言權的同志呢？還有一說。俄國的同志究竟為什麼要來幫助我們？現在且引各國以前的革命事實說一說，各位便可以明白

。意大利的中興三傑，大家都知道就是馬支尼，嘉富爾和加里波。加里波的是意大利的一個革命黨，他曾經亡命到南美洲，他幫助南美洲的人民革命，并且任過南美洲革命軍的總指揮。爲什麼呢？因爲說到真正的革命，原是不分國界的。我們中國古語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革命黨的精神。（中略）俄國的同志，既在俄國革命成功，所以如今也就來幫助中國革命，正是一樣的道理。不過一個是自己未曾成功而去幫助人，一個却是自己已經成功。而去幫助人，但同樣都是革命黨的本色。俄國同志因爲自己已經成功，更來幫助中國，以求將來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有何不可呢？（中略）再拿日本來說，日本的法律改良，都是得力於法人波梳拉度。波梳拉度是法國的一個大學教授，也是一個法律名家，他到日本法律學堂來授課，有一天正在上課，聽得外邊日本官吏審案時候答刑的怪聲，立即聲言日本倘不廢除肉刑，他就不再上學堂的課，後來卒使日本廢除了一切的肉刑。其他海軍則用英人做訓練，陸軍則用德人做訓練，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今俄國同志到來幫助我們沒有享過一些報酬，我們有時多謝他們一句，他們還說他們是爲世界革命，正像

我們爲國家革命一樣，不必說甚麼多謝，這是純以革命的目的共同努力，有甚麼可疑之處呢？近來上海的報紙，又來造謠說馮玉祥和鮑羅庭先生訂了什麼密約，但經北京方面一個反證，他們的伎倆便立即無所施其巧了。我們光明磊落的革命運動，雖然暫時會受人家的毀謗，但終於不做事實的反證的。總而言之我們與俄國攜手，是因爲要促成中國的革命，同時要促成世界的革命，這是兄弟敢在今日對各位中華民國的東家說句負責的話，并且請各位東家可以自己細查，知道并不是假話。

以上所講，第一是對於共產謠言的解釋，第二是對於聯俄問題的解釋。兄弟也不敢說各位就一定能夠原諒，因爲我們自己黨人中還尙有種種說話，不能原諒我們的呢。但無論怎樣，各位究竟要看看我們的事實。現在的廣東，的確是還未太平，這是無法可以向各位告無罪的，不過也要各位知道我們尙是人，我們尙是革命黨，尙是一個肯犧牲自己去爲人民，犧牲自己去爲中國的革命黨，如果各位見得我們有錯，就要加以指教，見得我們有艱難行不通的地方，也就要加以幫助，這就是我們至誠懇的希望了。我們現在的計畫，最大的就是要先把廣東做好，然後再及於全國

，講到全國政局，軍閥之打倒是必然的了，昨天兄弟已接到天津的來電，李景林確已失敗，馮玉祥的軍隊，確已入了天津，北洋軍閥，現在實已入了瓦解的形勢了。今後最重要的，就是建設。如果廣東的南問題，一經解決，我們便要實行軍民合作，先要做到保護人民財產，然後做到開發實業，但求能夠使此一二年內，廣東的民生，漸趨舒展，那就算我們不至白做一場了。

兄弟還有要向各位說明的，就是中國國民黨的農工運動。有些人說我們對農工就說保護農工利益，不理商人，對商人却又說保護商人，不理農工，設使兩方的人都一齊在座，就要無話可講了。但這是不是事實呢？請問現在的罷工工人，我們有沒有對他們說不理商人呢？我們現在對各位講話，又有沒有說不理農工呢？都是沒有的。因為我們現在要幹的，是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求保障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將來國民革命成功，就人人都得了利益，所沒有利益的，祇是甘願犧牲的革命黨人罷了。就實際來說，中國的農工商，實是共同休戚的，即如現在急要實現的是取銷不平等條約，這裏頭最重大的是收回海關，試問收回海關於商人究竟有沒有利

益呢？當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上海商會有一個代表姓榮的到巴黎去，他直說別的事他們商人都未必談，他們單要說的便是海關，因為海關權給外人拿了，外人的貨物，納稅倒少，自家的貨物，納稅倒多，這如何能夠和人家爭衡呢？而且我們的對外貿易，是隨人家愛抽多少稅就多少，人家運貨到我國，却要受各國協定稅率的限制，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商人簡直是永無發達之望。所以他們也就出盡力量到和會去爭回中國的海關權。如今我們并且找農人工人一齊去爭這個海關權，去謀求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明明是大家都有利的，還有什麼可疑之處呢？（中略）工人罷工數月，捱餓抵冷，實在還是有錢的『闊老』來受苦，這豈不是中國人無論何界都休戚相同嗎？在孫先生所著的建國方略，清清楚楚的寫明發展實業的計劃分別各種實業的性質，有些應該由國家經營的就屬之國家，有些應該由私人經營的就屬之私人，國家並且要用穩固的法律來保障私人經營的實業，所以我們主張農工運動，實並沒有意思去壓迫商家，不過目下農工的地位和生活，却一定要給他們增高，是凡屬人類都應該有的生存權，實是天經地義，斷不能說農工就是生來要做奴

隸之理。現在中國的人民，農民足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怎能夠不幫助他們呢？

總而言之，我們全國人民，不論農工商學兵，能夠一齊合力去取銷不平等條約，便大家都有好處，政府固有錢辦事，人民也家給人足，農工固然有益，商家更是有益。這條國民革命的大道，爲何不大家一齊走上呢？我們常常說「前人種樹，後人納涼。」孫先生已經用他四十年的學問和經驗，替中國開了一條光明大道，創造了三民主義，定下了建國方針，又建立了與人民合作的軍隊，做國民革命的前驅。我們跟齊了這條光明大道來走，自然就可以得着全中國人民的幸福，這是我們後死的革命黨人，一息尚存，也要拚命去幹的。我們做夥計的有誤會的已經對各位東家，盡力說這盤生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各位從前有誤會的，或者總也明白許多，現在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各位的教誨了。今天所講，都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問題，我們願大家都各本真誠，在這青天白日之下，作一番推心置腹的商榷。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之演說詞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君，去年五月十六日，本黨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廣州，議決在八月十日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並議定組織法選舉法，通告海內外各黨部。各地黨部自從接到了這個通告以後，也早經按照組織法選舉法把代表選舉出來。本來在去年八月十五就可以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了，後來因爲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各地交通不便，各處黨部許多有函電來請求展期，一展再展，直到今年的元旦，才在這裏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由今天回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天，到現在已經兩年。照黨章規定，原本是每年開大會一次的，爲什麼弄到兩年才開大會一次呢。這並不是黨務的弛緩，實在因爲時局和環境的關係。當本黨初次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也曾經過宣言，這是大家都見過的。我們想起今天在這裏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家心上都一定感觸非常的悲痛。因爲第一次大會時，我們還有總理站在我們面前，他嘗

訴我們一切，我們事事都有他的指導，我們只知跟着總理向前奮鬥，就斷斷沒有錯了。可是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不見我們的總理了，總理離却我們去了。我們現在能見着的，祇有總理的遺像，能聽着的，祇有總理的遺囑。這張遺囑，就是總理最後告訴我們的話，要我們繼續他的精神去做的了。回憶民國十三年這一年，我們也是在很痛苦很困難的環境中奮鬥的，但是雖然痛苦困難，尙有總理同在，我們仍是很覺愉快的。自從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去世後，我們遵依着他的遺囑去努力，雖然未嘗沒有一點效果，但因為總理已經不在，我們在奮鬥中，總抱着許多悲痛，所以今天我們曉得座中各位同志，從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定也會想起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總理的說話。各位還記得第一次代表大會中間，恰是接到了俄國革命領袖列甯先生逝世的凶耗。總理爲着這件事，覺得非常的哀痛，當時曾停會兩天誌哀，總理並且親自出席演說，說明他哀痛列甯先生的感想。這個時候總理有幾句話，很像預兆一般的，他說「列甯先生雖死，列甯的黨不死，俄國的革命事業也是不死。我今天在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將本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將來

我縱然死了，本黨却還是不死的」。那天總理的說話，今天座中同志，料想許多都是在座親耳聽見的，當時各同志聽了這番說話以後，心靈上都起了非常的震動。却想不到到了今年。總理的話果然——真的，一點都沒有錯的他真是死了，他真是離却我們去了。此後本黨的死不死，就祇有着現在沒有死的同志是怎樣了。如果各位同志都是聽從總理的話的，就應當想到，究有什麼方法能夠使本黨不死，能夠使中華民國也不死。我相信總理雖死，總理的主義不死的，不特是不死而已，而且還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擴充到國民衆。總理的主義，就是總理的生命，總理的主義是不死的。我們繼續實行總理的主義，便是繼續總理的生命。故此我們敢說總理實在不死的。總理在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如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樣的。兄弟因此更想到去年本黨的回志，因為遵照總理遺下我們的種種教訓，種種政策，固然是已經得了一點進步，但其中有一位同志是幫助總理改組本黨最出力的，又是和蔣介石同志一同接受總理的命令，同心合力去創辦黨軍的廖仲愷先生，不幸也死了。今天他也是和總理一起站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同志繼續去奮鬥。廖先生之死，大家明白

是因爲努力輔助總理改組本黨而死的，是因爲努力創造黃埔軍官學校而死的，我們現並要想怎麼樣繼續廖先生的工作，便要知到改組本黨這一件大事。不因爲廖先生之死而停頓，便要知到廖先生苦心創造留下我們的黨軍，就是先和人民合作，後來再成爲人民的軍隊，也不因廖先生之死而沒有繼續發展。這些說話，兄弟固然覺得哀痛，但我相信這不是兄弟一個人的哀痛，乃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人心中共有的哀痛，不過由兄弟代表大衆說出來就是了。原來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時，應該把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各種經過情形報告的，關於政治軍事黨務各項，幾日以後，當有更詳細的報告，今天開會，兄弟祇有很簡單的說話，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總理仍然在我們面前指導』。我們還是要繼續總理的生命，要繼續民國十四年我們努力奮鬥的勇氣。我們遠是要把民國十五年的樂觀提起來，因爲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總理已經找出了一條光明大路交給我們，這條大路，是用他四十年的心血和經驗從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來的。他原本要帶領我們同志一齊去走的，但不幸

半途死了。我們曾經跟從他走上這條光明大路的，就祇有繼續總理的生命仍然向着這唯一的光明大路猛向前進。我相信坐中各位同志，都是不願意落後的，都是要猛向前進的，我們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從此以後，團結同志做一體，繼續向這條光明大路前進的。第一步，是先求中國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更求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要牢記總理的遺囑，一方面喚起民衆，一方面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兄弟現在敢高呼總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歡迎詞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位同志，今天是大會開會的第一天，國民政府委員會同人薄備盃酒和各位敝會，恭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兄弟現在受國民政府委員會同人的囑託，敬致歡迎詞於各代表們，我想起民國的成立，到今天已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元旦之最可紀念者，祇有民國元年的元旦，民國元年的元旦，是先總理就臨時大總統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說是革命政府成立很好的一個紀念，自過了民國元年的元旦以後，由民國二年至民國五年，中間歷受袁世凱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的慘害，沒有什麼可以紀念，由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四年的元旦，又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來壓榨人民，人民受禍，日深一日，也是沒有什麼可以紀念，惟有到民國十五年的元旦，我們在這裏開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兄弟敢說這個是同志們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可是中國國民黨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也就是中華民國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我相信民國十五年的元

且，與民國元年的元旦，有同樣可紀念的價值，民國元年元旦，是總理成立革命政府的一個紀念日，民國十五年的元旦，是本黨同志繼承總理遺志去統一全中國的一個紀念日。我們因此想起，民國元年至十四年，中華民國沒有做好，究竟原因在什麼地方，也很明白的可以看見，我們不能說民國元年的革命是沒曾成就，最少已經革去滿清政府的命，已經革去數千年專制政府的命，已經把中華民國的招牌，高高掛起了，可是中華民國的基礎却實在沒有做好，因為當時對內則民衆運動沒有普遍，對外則打倒帝國主義的目標，還沒有完全決定，所以十四年來，國家不能做好，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然因為對外沒有鮮明的目標，使一般民衆對於反抗帝國主義的觀念，不能發生，更無從致中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這實是中國革命未能成功的一個大原因，所以到民國十三年，總理雖然在十分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也要着手改組本黨，並且決定了兩個策略，第一個策略是喚起民衆，因為農工就是中國大多數的民衆，所以更特別注意於農工運動，自從十三年至今，民衆運動的思潮，一天高過一天，到現在差不多全國已經知道民衆運動之必要，廣東民衆因為受總理的直

接指導，便有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這個民治的基礎是總理已經親手打好了，在十三年一年中，總理的實力，雖然未出廣州，但這個策略，却已影響到全國，自從北上奮鬥以後，全國的民衆，更差不多都舉起頭來了。第二個策略，是對帝國主義，取無畏的精神去抵抗，因為這一層，致民國十三年帝國主義者加於我們的壓迫，較從前愈加顯露，但因此却製造成民國十四年中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高潮，使帝國主義者，都手忙腳亂起來了，這個對外的民族解放的基礎，也是總理已經親手做好了，由這兩層觀察，我們敢決十五年以後，中華民國的進步，與十年以前一定是不同，因為從此以從，中國對內外的策略，各同志能夠都遵照總理的遺囑去做，是斷沒有不成功之理，我們就回想到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這兩年，因為同志仍然照總理的方針去努力，已經得有一點成績，可見聽從總理的說話，是斷沒有錯的，反之不聽從總理的說話，也一定不免陷於錯誤，可是從前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還有總理親身的指導，我們不會有錯誤，現在總理既逝，一班同志，就要求第二次大會切實的指導了，這次大會最重要的就是要決定民國十五年本黨努力的方案。我們十

五年努力的成績，可說就全在這次所定方案之如何，所以國民政府同人，對於這回大會實有無限的希望，無限的頌禱，當今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已經明白規定是受黨的指揮監督，實行總理以黨治國的政策，故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之前，指導國民政府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現在既開大會，就全靠此次大會的指導了，國民政府同人，愿拿至誠懇至純潔的心事，敬求大會各同志，把本黨工作和國民的關係如何，那一點對，那一點不對，都切實的考量其得失，估定其價值，然後決定種種的方針，國民政府同人是一定不顧一切，實行大會議決的方案，大會議決的方案，無論如何艱難，如何困苦，一定切實執行，期不負各位的希望，今天開幕時候，我們恪誦總理的遺囑，大家的趨向，是已經決定的，今天參觀閱兵式，大家更可以看見廣東民衆對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熱烈希望，但同時也可以見得他們還是在一個痛苦的環境，是要我們努力奮鬥去替他們解除的，我們能夠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也就是解除我們同志良心的痛苦了，故此兄弟可以說這民國十五年全國人民的幸福，實全靠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同志的努力，把一條光明大路

指示給他們，兄弟現在謹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同人再頌各位的健康，請求各位的指教，並請求大家就此各舉一觴。

什麼是反革命

有人問我道：「近來『反革命』三字，與滿洲末造『保皇黨』三字成爲一樣惡劣的名詞。『究竟什麼是反革命』？」

我答他道：『凡是不肯反對帝國主義的，和不肯提倡農工運動的，都是反革命』。我這句話，理論的根據，全在總理遺囑。總理遺囑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將革命之目的及其方法，說得周密無遺。

什麼是民衆？固然是全民。然而民衆之大多數的，是不是農民，是不是工人？除却農民工人，便是除却大多數民衆，「全」字從何說起？由此可見，所謂「喚起民衆」，有十之七八是提倡農工運動的意義。

有人說道：『我並不是忘却提倡農工運動，我只是勸資本家對於工人要仁愛，勸地主對於農民要仁愛』。哼！恕我說一句刻薄話。這和封建時代盼望「真命天子

「天王聖明」的思想有什麼分別？何不把大學的「爲人君止於仁」，改作爲資本家止於仁，爲地主止於仁呢？

然則所謂提倡農工運動，是不是只知道農工，忘却了其他民衆呢？我可以明白的答覆道：我並沒有忘却。只是我對於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不提倡他求人仁愛，待人仁愛，却提倡他能使人不敢以不仁愛待他。換一句說，便是他有權力來維持道德。

說到這裏，我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受人壓迫的形景而不起來助他解除壓迫的，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有人說道：『農工運動，我本來是贊成的，只是現在的農工運動，太過幼稚，有許多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所以我不能贊成』，這些話，只可算是廢話。農工運動裏頭，如何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只要日加努力，組織工夫做得好，宣傳工夫做得好，那些不良分子，自然漸漸淘汰，這有什麼值得搖頭歎氣的呢？而且人類一切運動中，有誰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何獨農工爲然。以此藉口，來反對

農工運動，我沒有別的說話，只說他是反革命！

以上把民衆二字，解釋清楚了。至於帝國主義四字，可以不用詳細解釋，簡括一句話，凡是以不平等對待我的國家，便是帝國主義。所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切帝國主義者，如政客軍人商家等等，不用說；至於傳教士教育家，向着我們往往開口便說「博愛」，我們可以問他道，「既不平等，何云博愛」？向來祇是兄弟朋友間，有所謂博愛，因為他是平等，至於主人之於奴隸，便祇有所謂恩惠，無所謂博愛了。

說到這裏，我又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以不平等對待我的國家，而猶以為不必抵抗者，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反對帝國主義，與提倡農工運動，雖是兩件事，實是一件事。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必然與農工運動結合一致。謀農工的解放，即以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即以謀農工的解放。反之，凡獻媚於帝國主義的人，必然厭惡農工運動，甚至藉帝國主義的勢力，以殘踏農工。他的目的，無非欲將農工有限的

脂膏血汗恣意揮霍，以縱他無限的侈奢欲壑。所以中國國民，今日祇有兩條路，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

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總理的病，去年一月二十六日，始告絕望，二月二十四日，定了遺囑的稿，三月十一日簽字。十二日便去世了。在二十四日，我們請求總理給我們幾句遺囑的時候，總理說道：「我死之後，敵人便要來軟化你們了，你們如此強硬，是有危險的」。這幾句話，也由兄弟筆記下來，在場諸人，都有簽字，因為不是遺囑的正文，所以沒有請總理簽字在上頭。

各位同志想想，總理為什麼說這些話呢？

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是於乙酉中法戰敗之年，決必要「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至乙丑年而去世，整整是四十年。顛覆清廷，是民族主義，創建民國，是民權主義，乙未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亡命海外，看見歐美經了民族民權的革命，一般人民依然得不到真正幸福，逼着還要做一回民生的革命，由此便研究民生主義。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

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顛覆清廷一樣，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是民權主義。至於「平均地權」，却是民生主義。總理的三民主義，至此才明明白白宣布出來，而中國革命，亦至此方纔有明明白白根據着三民主義而成立的革命黨。

辛亥之役，總理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當時便有些同志對總理說：『如今民族民權主義都達到了，民生主義，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還是慢些說的好』。總理聽了，怫然說道：『我如果不講民生主義，我便不必革命了』。然而這些同志，終於不聽總理的話。民國元年，公然在北京牽扯了無數野雞政客，硬將中國同盟會改做國民黨。哼，這是何等勾當呢！表面說來，一是如今革命已成功了，我們不用做革命黨了去做政黨罷；二是我們從前的夥計裏頭達官不多，大紳不多，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如今趁着機會，將達官大紳，一把拉來，以張聲勢，因為這樣，纔不恤把一個有二十餘年歷史的黨，硬拆了台，去同吳大頭一班人合夥，另掛招牌，開張生意。哼，這已足夠肉麻的了！然而這還是表面的話，骨子裏頭，依

然語不離宗，是取消民生主義，只看國民黨的政綱裏，輕描淡寫的，將平均地權抹去，便是一個絕大的表徵。

他們在北京做這勾當，總理却也沒奈他們何，然而總理實行民生主義的意思，不但不因此挫折，反而益加堅強。在這時候，總理的民生主義，除了以平均地權爲骨幹之外，還加上以節制資本爲骨幹，這是總理的民生主義之形成，看當時總理所發言論，便可明白。

民國二年以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了，總理却於此時，成立中華革命黨，須知道中華革命黨不是國民黨之後繼，却是中國同盟會之復活。他的最大表現，一是回復革命黨的性質，二是確確實實將實行三民主義著於誓約。

中華革命黨到了民國九年，改爲中國國民黨，名稱雖改，實質還是一樣，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提出宣言，對於三民主義，與以極詳明極嚴正的解釋，同時還根據三民主義定出最小限度的政綱，又於建國大綱中，詳細規定革命進行的順序。從此之後三民主義自然大放光明了。然而道高魔高，第一

次代表大會裏，已發見了不少反動份子的形跡，閉會之後，反動的形跡，更一日一日的擴大起來。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主主義，誨之諄諄，他們終於聽之藐藐，十三年冬間，總理在天津，臥病在牀，他們已憑着安福系做媒妁，賣身給段祺瑞，做了走狗，去組織什麼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了。總理臨去世的時候，慘淡的顏色，動不了他們的惻隱，微弱的聲音，喚不起他們的良心。總理死了不過幾日，他們已一心一德的，去做段祺瑞的偵探，來破壞中國國民黨，及至十四年冬間，公然有所謂西山會議，他們這般營營擾擾。爲的什麼呢？原來他們和民國元年那班人一樣。是要取消民生主義。

綜觀前前後後所舉出來的事實，便可明白總理那一句話：「敵人要來軟化你們」的用意了。總理所不放心的，不是敵人來打擊我們，却是敵人來軟化我們，誠然誠然，軟化比打擊何止十倍。敵人的打擊不但不能使我們離散，反而令我們團結，我們有時或者會被敵人打敗，然而這般的失敗，在我們不過偶然蹉跌。再接再厲，我們仍然可得着勝利，我再強硬說一句，敵人的打擊，是不能離散我們的，敵人如果

聰明，也決不用打擊的方法，而用軟化的方法。古人說過，攻心爲上，我們如被軟化，我們方纔可以稱得起無疾而終，我們方纔可以配享籌安會六君子呢，敵人也不望軟化我們全部，只要能軟化我們一部，敵人便可袖着手，冷着眼，看我們自相殘殺了。這軟化的方法，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也都容易，總理所不放心的，便是如此。

只是我們何以爲被敵人軟化呢？我們如今所要追求的便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在那裏，上頭說過，民國元年已經有些同志，顧慮着民生主義，會招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哼，可見得民生主義已會招惹出事來，不必待什麼「赤化」了！這些顧慮，似乎可以說是軟化的病根，然而這還是公的意見不是私的意見，我們可以慢慢的解釋明白。解釋的方法，可以分做兩面，其一，我們只是民族民權主義，已經足夠招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民族主義之目的，在造成自由獨立的國家，那不和帝國主義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是正對頭麼？民權主義之目的，是要保障全國人民之生命自由平等，那不和軍閥官僚買辦土豪要魚肉人民以自肥，

是正對頭麼？我們要他們不嫉視，不疑忌，除非馴馴伏伏的永遠做他們的奴隸。不然，他們總是放不過我們的，又何在乎民生主義呢？其二。我們如果不要民生主義，那麼，民族民權主義；都成爲無意義。人類因爲要生存，纔要有經濟權來養活，因爲要有經濟權，纔要有政權來做保障；所以民權主義，是要來做民生主義之保障的，而民生主義，是要來達民權主義之目的。不要民生主義，要以治權做什麼，民權主義可是白講了，不要民生主義，人類何以生存，民族主義也是白講了，所以三民主義，看起來，是三個的，其實只是整個的，如何可以拆開呢？以上兩面的解釋，如果出於公的意見，有人必然可以明白的，所以這一層，還是不曾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近日西山會議的人，比較民國元年那班人，似聰明些，他們說：他們並不反對民生主義，他們要孫文的民生主義，他們不要馬克思的民生主義，他們如此說法，自以爲聰明，而不知他們的糊塗，比較起來，還要利害，人人知道民權主義至盧梭孟德斯鳩而大成，民生主義至馬克思而大成，總理生於盧梭孟德斯鳩馬克思之後，

對於他們的學說，自然有所斟酌取舍，在民生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如臨大敵，和在民權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盧梭孟德斯鳩主義，如臨大敵，同一無二，最奇怪的。他們口口聲聲的說道：孫文的民生主義，是全氏革命，馬克思的民生主義，是階級鬥爭。他們又在民生主義裏尋出一個證據說道：「總理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哼，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達爾文出，然後生物始會生存競爭；馬克思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馬克思出，然後人類始會階級鬥爭，這是何等的顛倒！總理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斯因爲馬克思看得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理，如今照他們所說社會階級鬥爭，是馬克斯製造出來的，那麼，馬克斯不是病理學家，竟是病的寄生蟲了，這是何等可氣可笑的見解呢！總理憑著馬克斯的學說，看出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之現象，必日趨於劇烈，苦心孤詣，想出種種防微杜漸的方法，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綜其要旨，無非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以平和的方法，處理經濟，以除去階級鬥爭之病根，而謀社會經濟狀況之安全發展。這正是對於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

狀況，而下對症的藥，並不是說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好好的，原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不須去理會他，然則總理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斯民生主義，有何衝突呢？照他們所說，豈不是衛生學家和醫學家要勢不兩立麼？以上所說：雖然看得他們無理取鬧，然而仍是出於公的意見，可以解釋明白。所以這一層也不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然則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為不是出於公的意思方面，而出於私心方面。簡單一句話，便是他們的特殊地位思想，這種思想說來話長，絕非一朝一夕之故，遠從人類未有歷史以前沿襲下來的，本來人類有兩種欲望，一是生存欲，是支配欲。所謂生存欲，是要滿足自己生存之欲望，如衣食住行之安樂自由等皆是，所謂支配欲，是超於生存欲之上的；如以強凌弱以貴凌賤以富凌貧等皆是，生存欲是人人所當滿足的，一切的民生主義，無非想出種種方法，來解決怎樣滿足人人的生存欲。所以總理的民生主義講義裏，於人生之衣食住行，極為注意。至於支配欲呢？却是人類相斫之原因，古語說以天下奉一人，試想一個人的生存；何

至要以天下來奉呢？如今所謂大資本家者，將他所擁的金錢，鎔化爲水，讓他和他的妻子一口一口的飲下去，一生也飲不盡，可見得這都不是他們生存上的必需品了，然而他們却偏要千方百計的弄來，死死的不肯放鬆，這全是由於他們要施逞其支配欲的緣故。因爲這樣大多數人生存上的必需品，都做了他們奢侈品的犧牲。甚至於連奢侈品也說不上，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起來真是傷心！一切的民生主義，便是要對於這般人的支配欲，加以抑制。不但民生主義如此，不過自有民生主義，方纔更爲澈底普通便了。人類的支配欲，從前發揮在貴字上頭，所謂貴然後富；自從十七八世紀，歐洲幾番革命，將君子貴族剷除了不少，却是同時將私人資本制度，培植起來，革命的結果，民權落於大資本家的手裏，大多數人，還是落空，於是大資本家做了君子貴族的承繼者，人類的支配欲，發揮在富字上頭，和從前恰恰相反，所爲富然後貴，中國革命的時候，有些守舊派，還抱着貴然後富的思想，所謂聽見人將「老爺」稱呼改做「先生」就把鬚子豎得直，甯可留辮子做遺老，躲在家裏，仍然要人叫他做老爺。至於那些維新派呢，却時髦得很，看破了

而今已是富然後貴的世界，任憑將老爺改做先生，全沒要緊，橫豎是一樣的值錢東西，這種道理，惟有留學生看得最清楚，而今中國以內，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其次是軍閥，其次是官僚買辦土豪，這些都是富而後貴的出色人物，一般時髦，一方面要討些特殊地位者的歡喜，一方面要鑽入特殊地位者的裏頭去，一聽見民生主義，是要將私人資本制度根本打破，要將民權普及於一般民衆，不容少數資本家獨享其利，要抑制人人的支配欲，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那可是絕了他們的希望了。不必帝國主義發怒，不必軍閥等等痛恨，他們自己就要磨拳擦掌，和民生主義者，拚個你死我活；何況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頭慫恿着；有軍閥等等在前頭領導着呢，不幸我們號稱同志裏頭，也有這些人在內。民族主義呢？排去滿洲人，正好讓我們漢人來享福，當然沒有反對。民權主義呢？只有最看不破的籌安會六君子，還一面做着老爺夢，民生主義呢？老早已說「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如今索性高高興興的加入什麼「反赤」，「討赤」裏去了。這一點點私心存在各人隱蔽的地方永遠不說出來，孟子說得好「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民國十五年之所以亂至不可收拾，革命黨人之所以變節，所以會被敵人軟化，簡單一句話，是原因於各人藏在隱微的特殊地位思想。

中國國民黨，是聯合民衆來做國民革命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致力於的，也是國民黨的政綱裏，固然注重保障大多數農工民衆的利益。同時也注重保障其他民衆的利益，我並沒有說，我們同志個個都要變成無產階級，我所要說的，我們同志最少要有以下的幾個觀念：

第一，爲什麼我們要革命？

我們爲求民衆的生存而革命。

第二，民衆如何纔能生存？

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時抑制人人的支配

欲。

第三，如何纔能做到呢？

要人人有政治上經濟上之自由平等。

第四，辦法和次序是怎樣的？

總理所留給我們的著作已說得明白。

我們必須知道，中國今日誠然還不是能夠實行民生主義的時候，然而我們對於

民主主義之根本思想，必須澈底明白，不然，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着帝國主義，如何還能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着軍閥，如何還能打倒軍閥？一旦眼中見着的帝國主義和軍閥，與心中藏著的帝國主義和軍閥，邂逅着了，便融合起來，那時候，便軟化了。

我們同志，於澈底的了解之後，要以不斷的勇氣，猛向前進，則不但不會被敵人軟化，還能打倒一切的敵人！

東征之意義

今年二三月間我軍進兵東江，掃除陳炯明林虎一班殘賊，對於江東地方人民，盡力保護，本可一勞永逸，使東江從此安甯，東江人民從此得着幸福。

卻因為楊希閔劉震寰一班驕兵悍將，受了帝國主義的指使，在惠州省城煽亂謀叛，我軍因要整頓根本重地，毅然由東江回師，於七月初旬，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惡勢力，將根本重地打掃乾淨。

自六月以至九月，幾個月內，我軍次等將惠州內外一切反革命的分分子，不論置身在黨部或政府或軍隊的一概驅除淨盡。革命政府的威信是幾年來所未有，革命根據地的固鞏，也是幾年以來所未有。

東江一班苟延殘喘的剩餘敵人，末日到了，他們趁我軍回師惠州的間隙，做晝伏夜動的鼠子行爲，他們竊食香港帝國主義者的餒餘，他們重新在汕頭等處，欺壓工人，在海豐等處，摧殘農民，以取媚於帝國主義者，他們重新任意虐待東江人民

，蹂躪東江地方。如今我軍出發東征了，他們末日到了。

東征的健兒，一齊起來，掃除東江餘孽，保護東江地方及人民。
東江的人民，一齊起來，應響東征軍，掃除餘賊，永獲安甯。

說明組織代表團赴京原因

今日兄弟在大會當諸君面前報告的事，就是政治委員會對外宣傳委員會，對於這幾次慘殺案，曾決議組織外交代表團，向全國宣傳慘殺事實，並由廣東發起，出發先赴上海，再赴漢口，由漢口乘京漢車赴北京。沿途喚起民衆，發起同樣之組織，然後在北京組織一個全國外交代表團。一方爲國民有力的外交，一方促成國民會議預備會；並要求段祺瑞參加修改不平等條約運動。今兄弟先將這個外交代表團的用意，向諸君詳細說明，在沙基慘殺案週月紀念會這個時候，我們曾說過帝國主義者屠殺我們，決不是偶然的，是一貫而有步驟的。試看五月杪以還，前後不過一月，即連續發生慘殺案凡數處。可知帝國主義者已預先準備進攻我們，但國民黨是代表國家民衆利益的，對於這幾處的屠殺，不能不有相當的對付，所以認爲有組織外交代表團的必要。但因爲交通不便，郵電被香港封鎖，所以這件事遲到八月十八日纔在政治委員會決議，但在這時候遲兩天，大家都知道國家及國民黨不幸遇着重大

的損失，就是廖仲愷陳秋霖兩先生被反革命派所暗殺，因為發生這件悲慘的事，所以又遲了十多天了，今日纔提出向大會諸君佈告。從前我和一個俄國政治家談話，他是做革命工作已經成功而又有經驗的。他向我提出一個疑問，就說「廣東是否可以用拿來做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嗎？」我以為國民黨一向都是以廣東為革命根據地，今這位革命同志何以尙會有此疑問。據他謂，從一方面來看，廣東物力之豐富，人口之繁盛，地理之適合，與乎航運交通等，都遠過別的地方，本來大可做革命根據地。但從別一方面看，則廣東雖然物力豐盛，而最足為國民革命阻力的也是廣東，因為廣東接近帝國主義的虎口——香港。凡國民革命進行一次，香港的帝國主義者必圖破壞，這件事拿三四年來的事實可以證明。當着民十之際，國民黨把桂系驅逐，這廣東尙未有財政不統一，軍需不統一的現象，烟賭也大致禁絕了。殆自民十一年海員罷工，這次雖不敢謂是國民黨造成，但帝國主義者已知道我們民衆已漸漸覺悟，且以廣東為革命根據地，於是香港政府便急激的進行破壞廣東國民革命的根據地。第一次當廣東肅清桂系之後，正向外發展之際，孫先生親自監師北伐，香港以

府乃暗助其走狗陳炯明，使擾亂廣東，纔有是年六月十五日之變。其後商團造反，沙面英領又有一種類似哀的美敦書的向我們恫嚇，謂如果你們打商團，英國戰艦當開砲向廣州轟擊，這顯然是幫助商團作反，謀推倒革命政府的鐵證。其後東江之役，又再助陳軍擾亂我境，使國民革命無從發展，乃幸得我黨軍爲本黨奮鬥精神，把東江陳逆掃平，此爲香港政府破壞我們革命第三次的失敗。東江肅清以後，革命政府正謀建設，乃又造其共產與共產謠言，愚惑一般無意識之民衆，其實我們產尙未有。何得而共？共產二字，我們老實不敢受領，但帝國主義者明知我們不會行共產，他偏偏利用民衆的弱點，拿這共產口號來嚇一般無意識者，希冀造成反共產勢力，以傾覆革命政府；又復利用他們的工具楊希閔劉震寰等借反共產之名，在近郊叛亂，而又被我們民衆勢力，和黨軍掃除，故此大楊劉失敗，即是香港政府破壞革命根據地的失敗，而楊劉失敗，香港罷工隨起，帝國主義者以我們民衆運動是不可抗的，乃改變陰謀而爲實力的壓迫。遂有六月念三沙基大屠殺發現，並利用革命派潛伏內地，製造謠言。並捐助款二百萬，煽動不肖軍隊，圖謀傾覆國民政府。

乃因此次廖先生被擊，而被我們將其全部陰謀窺破。凡此種種，都是香港政府破壞我們的陰謀；俄國革命家謂廣東在帝國主義的虎口，真是顯著的。我現在歸納來說一句，凡國民革命進行一次，帝國主義者必打擊我們一次；但這種打擊，我們是不畏的，總要看我們能夠抵抗他否；如果能抵抗，就是成功。國民革命就多一次進步！如不能抵抗就低落罷了！帝國主義者在沙基屠殺後所採的政策可分三個：第一，就是將各處慘殺案分開局部解決，以減少全國民衆的力量；第二，不向廣東交涉，而專向北京政府交涉，因為北京政府的外交可以和他妥協，廣東就沒有妥協的地方；第三，先謀解決上海，繼而漢，青，滯，等慘案。故一方面嗾使張作霖蕭耀南等軍閥，壓迫民衆運動，以便於和北方政府妥協。這時剩了廣東獨立，然後用實力對付我們，政治委員會因為局部解決是會失敗的，因此不能不籌鋒針相對的計畫，所以組織外交代表團就是這個意思。這外交代表團計劃，就是一方聯合全國各地民衆，促成國民會議預備會。一方合全國民衆力量，將各地慘殺案在北京總解決。並督促段祺瑞修改不平等條約運動，現政府已預定三人，其餘各界代表由政府指定，總

期於最短時間出發，今日兄弟代表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於諸君之前，佈告一下。

特別委員會宴會商界之演說

商界諸先生，今日特別委員會有許多意思欲向各位宣布，而兄弟所欲說的，係我個人意思所及之事。兄弟乃一書生，恐不免偏於理論方面，但許蔣諸位先生隨後還有事實上的討論相報告。

兄弟所想說的理論乃根據先總理之遺囑及全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而來，若討論起來，理論甚長，但今日欲和各位先生說的，乃國民政府之政策是否與商民有利害關係這一點。易言之，即國民政府之政策是否與商民之利益衝突，或者有些人懷疑國民政府不明白商民的情形，不知到商民的痛苦，但照兄弟看來，却不如是。遠者不必說，就近者言之，今年六月一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之議決案，實在和商民之利益毫無衝突，不特無衝突，而且是保護商民利益，發展商民利益的。

六月一日的議決案：（一）是軍政統一，因為軍政不統一，則軍隊為害沒人約束

管理，所以要使軍隊爲保護人民保護國家的軍隊，必先要統一軍政。(二)是民政統一，民政不統一，則貪官污吏爲禍無窮。(三)是財政統一，軍需獨立，若財政不統一，則軍政民政無整理之可言。(四)是軍隊受政治的訓練，十餘年來戰事頻仍，所以軍隊沒有訓練，故國民黨的主義亦無從實現，以上便是六月一日議決案的內容。

但是六月一日的議決案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最先許先生和蔣先生已有此意，後來譚組安先生朱益之先生亦有同一的主張，後來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二日劉楊之役，劉楊剿滅後國民政府之成立，都完全於此四個議決案。試問這四個議決案與商民有無利益？當然是極有利益的。假若軍政不統一，驕兵悍將不服政府命令，恐我們亦不能在此開會了。軍政統一後，完全編爲國民軍，軍令由一個機關發出，軍隊不法，再不至無人負責，這個是不是與大家有利益呢？民政統一，更是和大家有利益的。民政不統一，則各地各自爲政，人民受害不少，卽就貨物運輸一事言。一種貨物經過各地，要受重重的苛稅，若民政統一後，必無此種情形，所以軍政統一後，便無驕兵悍將，民政統一後，便無貪官污吏。兄弟嘗設一喻，驕兵悍將如爛棉襖，貪

官污吏如寄居於棉襖裏的蚤虱，兩樣都是最討厭的東西。但除去爛棉襖，虱蚤亦當同時清除。財政統一，乃是和商民有莫大利益的。歷來的戰事，商民出力最多，但是毫無結果。即因為軍政不能統一，和財政不能統一。所消耗的金錢不能得當，大多數為驕兵悍將霸佔去了，不能用在國家和社會上頭。今早特別委員會請國民政府發表命令，此後不能有收受黑禮，及其他賄賂中飽等等行爲。此事和財政統一極有關係，商民諸君亦極有利益，再及軍隊的政治訓練，自然亦和商民有利，因為受過政治訓練的軍隊自然不是不服命令無紀律的軍隊，自然是能夠保護商人利益的軍隊。國民政府之所以改組，完全為實現此四種議決案之故。這四個議決案做得到，則國民政府固然成爲好政府，商民所受之利益亦很大。所以政府與商民之利益是相同的，是不可分的，但是財政統一。則貪官污吏與割據一方者必不歡喜。軍政統一，則矯兵悍將必不歡喜。其他民政統一，和軍隊受政治訓練，亦有許多自圖私利的以爲不便，所以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不忠心於革命的人必起來反對，他們反對不可無籍口，所以在劉楊時代，他們已造出共產的謠言來，試問努力這四個議決案的政府

是否共產政府，想諸君亦甚明白，其實驕兵悍將才是真正的共產。因為他們來到廣東盡力剝削廣東的財源，可以說他們共同來剝廣東地皮，剝到十八層地獄下的冤鬼也可以跳了出來。他們才是真正的共產，此種謠言，不必用甚麼言論反駁，我們用事實便可證明了。我們廣東給驕兵悍將的蹂躪，如今已經無產可共了，所以我們現在所努力的便是上述的幾種議決案。

廖先生生時人家說他是共產黨，如今廖先生死了，而廖先生毫無遺產，並無大屋和田地。所遺者惟一個寡兒一個孤婦。雖有一屋，並不廣大，而且不是他自己購置的，乃廖夫人之物。究竟廖先生共過誰人的產，各位須知廖先生本人非共產，亦非反共產，廖先生所努力的，便是財政統一，民政統一，軍政統一，軍隊須受政治訓練這幾件事。但是這幾件事不是廖先生獨力所能做到的，廖先生所獨力承担的是財政統一，廖先生之被人暗算，也因為努力這四個議決的原故。

又有人說我們為甚要反對香港政府，諸君須知，這並不是廣東首先闖禍，廣東的慘殺已經是第五次了。上海首先發生慘案，以次到漢口，九江，青島，一直順手

殺來到廣東已經第五次了！可見帝國主義者慘殺我們同胞不是偶然的，是立定心來做的。帝國主義者的英國，殺完了人民不算，還要封鎖廣東，堵塞廣東的門戶，這時我們可以覺得香港實是握掌我們的咽喉，若果廣東不求交好的獨立，和經濟的獨立，還有甚麼自存的政策。諸君莫謂香港繁盛，廣東可以受益，其實香港繁盛，廣東不特不受益，而且常受香港的操縱壓迫，所以我們要積極開關港口，整頓交通，才可以有自立自存的希望，不倒帝國主義的香港，則廣東必亡！

因為英人利用香港的勢力封鎖我們廣東，使商人受莫大之痛苦，隨時可以制廣東三千萬人之死命，隨時可以制我國南方經濟之死命，所以我們不能不反對香港政府，我們反對他，是求我們的自存獨立。

又有人說政府為甚麼扶助農工運動，諸君須知，我國人口，農民佔百分之八十，工人佔百分之七八，農工既佔人口多數，則政府是不能不注意他們利害，現時農工做反帝國主義運動，商人又正受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所以商人應該與農工聯合起來，共同奮鬥。不錯，農工運動在初期的時候，不免有幼稚的毛病，不但我國如

此，世界各國亦莫不如此。但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只有盡力去扶助他們，使歸正軌，農工團體是各國都有的，不能說扶植農工團體，便是共產，最近有一種「三三一」四四二一的謠言。有人問兄弟這是怎樣解，連兄弟都不知到，後來在國民新聞查出，是他們製造出來麻雀牌的數目字，這些平空造出來的謠言，真是不知所謂。更就海豐的農民情形說，耕穫所得，田主農民各得其半，更取多少以辦公益事業，在戰事發生的時候，農民多來幫助革命軍，革命軍也幫助他們，但這非革命軍助農民打田主，這是軍隊與人民結而為一。豫廣甯的事情才是可慘，田主與土豪以為農人成立農會，必定於他們不利，所以勾結軍隊壓迫農人，解散農會。照此看來，農工運動不應該扶助呢？實在不能不扶助的。農工運動不獨應該扶助，而且農工商亦應該聯合。聯合不至於衝突，政府是可以負責的，所以扶助農工為本黨政策，并無害於商人，而且有益於商人，商人如果想亡國，則不必說了。不然，商人應該和農工聯合。政府一言一動不是隨便做出來的，所以政府的言動不會輕易做錯，兄弟不是說政府和黨的行事通沒有錯，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但有過是可以改的，凡政府

所施行的種種問題，如果覺得有不安處，無一不可以商量改正的。總之要大家有同一的目的，同一的願望，便可合作。我們現在至少要大家有免除外國的壓迫，回復自由平等這個願望，大家有了這個同一的願望，便無事不可商量，無事不可合作了。

反對財政統一及軍政民政統一的人，何以會出暗殺的手段呢？他們以為數年來各種大暗殺案，如程案朱案鄧案等總不能破案的。所以他們敢蓄這種大陰謀，以為暗殺是不會破案的，不知這次暗殺却不同了，偏偏兇手受傷不死，從他身上得許多證據，知到這是反對財政軍政民政統一的人所做的勾當。因為財政軍政民政之統一和他們的私圖不便，所以他們要出這種的手段，他們不獨是政府之敵，也是商民之敵，他們反對政府進行四種議決案，即反對商民利益，豈不是商民之敵。案中的詳情將來一定宣布出來，使大家都得個明白，總之廖先生之死，死於財政統一。財政統一，是商人之利，財政統一然後可以言自治，可以言保護實業，振興工藝，振興教育等等政策，今廖先生不幸死了，我們仍當繼續努力，實現這四個議決案。頻年

變亂，商人受害最深，希望建設亦最切，不幸正在建設的時候，突然發生這件重大的事情，我們此次惟有更加努力，我們始終想實現這四個議決案，決不敢昧着良心做害人的事情！

在廖仲愷百日紀念之演說詞

——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廣州中央執委會——

自廖仲愷同志被害至今日，關於偵兇各事，在政府方面雖極力進行，然尙未有真正判斷，吾人實覺工作延慢。此次廖同志之見害，非特殺廖同志個人，實係殺中國國民革命之前途，故後死諸同志，當繼續廖先生之工作而努力，而奮鬥。廖同志之敵人，即帝國主義者及反動分子。自廖案發生後，兩次將反動軍閥肅清，東江南路亦已次第削平。東江之役，能將有史以來所未破之惠州打破，並將敵人勢力完全消滅。至於南路，本於平東江之後，即着手進行，祇以反動分子尙未肅清，故延至今日始進行。吾人在此百日紀念，深愧百日當中所做工作之少。此工作雖無幾，但仍繼續進行，斷不使其間斷。使廖先生之精神永久不死。這正是靠全體同志之努力。廖先生所做之事甚多，其最大者爲（一）反帝國主義運動，（二）提倡農工，（三）擴大革命份子及肅清反動派。這三種精神，實則一種。如反帝國主義，即須從

倡農工，有人說，全民政治是不用農工的，我真是不解，在中國百人之中，農工實占八十五人，農工既然占人羣之大多數，若不提倡使其覺悟起來，擴大起來，何能打倒帝國主義。觀於這回省港工人大罷工，他的成績是怎樣，痛苦是怎樣，這就是工人努力奮鬥的結果。至容納革命分子一層，廖先生生時即以此受種種責備與攻擊，以為廖先生偏重共產黨，如浙江省黨部至今仍以廖先生為引起政治糾紛。其實國民革命運動，一定要提倡農工，及歡迎革命同志加入的。廖先生有如此偉大事業，他的精神不死，長寄在羣衆裏。孫總理死，國人便以為本黨即於此中斷，其實則不然，並且更加努力，平東江，平南路，這都是孫先生死後之偉大工作。廖先生死，一切反革命派亦以為本黨以後既沒有廖先生主持，當陷於妥協不革命之態度，實則所死者廖先生之軀體，所不死者廖先生之精神。且其精神非寄於一二同志，而寄托於羣衆。此種精神能普及於革命民衆，中國國民革命前途終能發展，終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廖先生雖不能再見，然真實之革命黨員，斷不以此為憾。反對奉張，見諸本黨宣言，此種革命精神，由廣東向長江進發，蓋有覺悟之民衆力量，是無敵

不摧，無堅不破的。廖先生是努力於實際工作，所以能有偉大之成就，希望各位同志也如廖先生一樣努力。有一般自稱爲純潔份子的，往往將玄想作言論行爲之標準，滿口空談，不切於實，這是大錯特錯的。廖先生一生都是努力實際工作，總理要他辦黨，他就辦黨，要他創辦黨軍，他就辦黨軍。他這種偉大的工作，真真可作後死同志之模範。現在我們爲紀念并發展廖先生的精神起見，組織了仲愷先生紀念籌備委員會，建築紀念公園及農工學校，使廖先生之精神，深入農工羣衆，由全國而全世界。

蒞軍政學農工商大會之演說

今日廣東人民在此開會，有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等，爲政府機關；有各界對外協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全港工團委員會，廣州洋務工團聯合會，廣東總工會，工人代表等會，爲工人團體；有商會聯合會，市商會，商民協會，總商會等，爲商人團體；有農民協會，爲農人團體；有學生聯合會，爲學界團體；各人均在此齊集。黨政軍工商學農等各界均有，這算是全省人民到齊，全省人民共同之目的，遠則爲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近則爲保護廣東人民生命財產，使人民安居樂業，此爲共同目的。故須使人民安樂方能國民革命。廣東如統一，則打倒帝國主義力量，更爲強固。我們人民前爲奸人離間，不能實現達此目的，一爲帝國主義走狗，帝國主義者利用其走狗及買辦等，圖謀我廣東；製造種種謠言，離間我人民與政府之結合，此爲第一種魔鬼。二爲驕兵悍將，此種驕兵悍將，連年抽剝聚斂，荼毒人民，使人民不能各安生業，

此爲第二種魔鬼。三爲貪官污吏，此種貪官污吏，苛政虐民，使人民怨叢政府，對政府不能信任，致使各項政令不能實施，此爲第三種魔鬼。四爲無聊政客，失意官僚，此項人等，專挑撥人民政府惡感，擾亂地方安甯，此爲第四種魔鬼。故從前離間人民與政府結合者，厥爲此四種人，此四種人非我國民，我真正之國民，就是農工商學各界人民，現在各種魔鬼障礙，均已掃除。我們人民同心合力，努力爲國民革命，謀人民幸福，求廣東之和平，帝國主義現已失敗，省港罷工將告勝利，驕兵悍將，經已掃除，只餘革命軍隊，鞏固國家，保護人民，貪官污吏，現政府正設法收拾他；官吏有吸食人民膏血者，政府必吸食其膏血，無聊政客，失意官僚，已無依附，不足畏懼，各種障礙已除，人民同心一致，今日各界人民大聚會，先謀市內平安，次爲工商農民求利益，三政府軍隊已準備出發東江南路，統一廣東，四將軍隊出發北伐。今日各位在此開會，係從前未有之大聚，此實爲第一次，將同心結合的力量。給帝國主義及軍閥看，民衆力量，永不分散。人民監督政府，政府爲人民謀幸福，國民黨指導人民造成一個好廣東好政府，進而造成一個好中國好世界！

蒞罷工委員會報告關於軍事計劃

各位工友，兄弟以前曾來二次報告外交情形，及廖仲凱之死情形。今天來報告關於軍事方面情形，大家都知道工友這次罷工，是政治的罷工，不是切身經濟罷工。這個政治的罷工，即是打倒帝國主義，然而我們知道，打倒帝國主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得到的；是要經過許多困難，而要有許多計劃，要有許多政策才行。這些計劃中，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政治的，二，是外交的，三，是軍事的。關於政治外交的計劃，已經報告了，所以今天只將軍事方面的情形，報告一下，我們關於軍事的計劃分三步：第一步，是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第二步是統一廣東；第三步，是出兵北伐；我們可說，自六月十二日一直到現在，所做的工作，都是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因為如此，然後才能出兵東江和南路，肅清反革命軍隊，統一廣東，為甚麼六月十二日掃除劉楊，是鞏固革命根據地，因為劉楊是聯絡北方軍隊與雲南唐繼堯，外通香港，想來推翻革命政府，當時黨軍還在潮梅，為集中兵力起見，

不得不放棄潮梅。交回陳黨，率師回省，幸得不上一句，便把劉楊打倒、劉楊倒後，接連就是六月念三日沙基英人屠殺市民，因為劉楊倒後，香港政府，見有革命根據地廣州日益鞏固，自然恐慌起來，所以施行這屠殺政策，及到省港工人罷工。他更一方面接濟陳炯明部下林虎反攻廣州，同時以二百萬元的利誘一班無聊政客，如魏邦平及反革命的軍隊作內應，乘我們出兵東江，廣州空虛的時候來傾覆政府。他們有三種計畫：第一，先暗殺領袖，第二，運動反革命軍隊作亂；第三，全盤打倒國民政府。果然廖仲愷先生於八月念二日被他們買兇刺死了，我們在兇手身上，以及各方面得到種種確實的證據，知到主要兇手是朱卓文等。大家想想這條計畫，狠毒不狠毒？我們政府方面，得到這個消息之後，馬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於八月念五夜，把反革命派的軍隊肅清了。現在廣州安全，我們完全負責，工友可以放心，因為廣州市安全，即革命政府安全，革命政府安全，亦即各位安全。我們很抱歉，未能十分幫助工友，如經濟方面的接濟等，都未十分做到，然而我們政府從未用軍隊的勢力來壓迫各位，如北方張作霖李景林之壓迫天津工友一樣，這是我們可

告無罪的。現在我們要肅清南路及東江，然後北伐與國民軍聯絡一起，掃清國內軍閥，我們要認清我們的敵人：一，劉楊等軍閥，他們已被革命軍趕走了；二，無聊政客魏邦平等。有人說捉邦平很得人心，爲甚麼要促他，這是他們不知原委，魏邦平一班人，口口聲聲說，要驅逐客軍，這是他們故意中傷，其實我們是集合全國革命的份子，以主義爲結合，不必分什麼主客，我們只要革命的軍隊，打倒反革命的軍隊，不分省界。難道剝地皮的廣東軍隊，外省軍隊能保護我們都不要嗎？四年前陳炯明的軍隊是主軍了，他們只想在廣東做大王，不肯出兵北伐，他們的眼光只限於廣東，不肯救全中國的同胞，及到他們造反起來，我們受盡搔擾掠劫，可知主軍蹂躪人民，比客軍還要利害。我們還愛戴蹂躪我們的主軍嗎？當然不是的。我們用革命的軍隊，打倒反革命的軍隊，不應用主軍趕走客軍，我們集合革命的軍隊，掃除反革命的軍隊，我們只問他們是不是革命的軍隊，不必問是不是那一省的軍隊，他們想用客軍外江名稱，來離間革命勢力，我們不要上他們的當，我們把反革命的軍隊掃除了。我們並且要進一步打倒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我們現在編革命軍爲五

大隊，肅清東江南路反革命軍隊，並掃除土匪，恢復交通，使人民得安居樂業。然後將五分四的革命軍隊，北出長江，留一部真正革命的，知道保護農工利益的主軍，保護廣東。五分四之軍隊出長江，與國民軍聯合起來，打倒國內一切軍閥，這是我們的軍事計劃。我們要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然後才能肅清廣東軍閥，然後才能肅清全國軍閥，完全國民革命。我們現在正做到第一步與第二步中間，還不能說到第三步工夫。我們要把人民與政府聯成一氣，實行肅清南路，出師北伐，完成國民革命。我的結論，是政府革命黨革命的軍隊，以及人民，尤其是工農，聯合起來，站在同一戰線上，來統一廣東，出兵長江，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然後才不負工人罷工的目的！

蒞罷工委員會報告政治

代表諸君，兄弟於九月十九日，曾作一次政治報告，前月十九到今日，不過是十天的工夫，在這十日內，有幾件緊要的事，要報告給諸位聽。前一次兄弟到黃埔去演講，十二時趕回來此地報告的意思。是爲第三步。第一步是統一廣州，第二步是統一廣東，第三步是出師北伐。現在呢，以經做到第一步與第二步之中間了，那日報告的，現在可以證明兄弟的話是很忠實的。那時反革命的軍隊佔據石龍東莞寶安一帶，各界雖然很熱烈的請願肅清東江，但是有所不能，蓋欲出兵東江如不解散反革命軍隊，則必有後顧之憂，現在不妨將過去的事再說一說，何以必先肅清東莞一帶的不肖軍隊，而後出兵東江呢？那天海陸豐告急的電，通通被他們截了，他們意欲等革命軍出發之後，便乘勢佔據廣州。所以政府下絕大的決心，二三日之內，把一切反革命的軍隊盡行解散，最近一二日，已經出兵東江，我們看看各位工友如此齊心，而且又有很好訓練的黨軍我們相信，勝利是在掌握中。大家如果明白此次

的罷工，是為政治的罷工，故必須鞏固革命政府的根據地，根據地已鞏，那就必須出兵統一廣東了。其次的事件，就是北上的外交代表團，前幾天謠傳外交代表團到汕頭被洪兆麟扣留事，當時聽到此種消息之後，兄弟甚為注意，知道不是確實的，及廿五日接到林森先生從上海來電，我們已知得代表團已安妥穩穩到了上海了。外交代表團所負的責任，到了上海後，發起上海外交代表團，及九江，漢口，開封，等處亦是一樣，到北京則發起一全國外交代表團外交交團的任務，第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案，第二是漢口，九江，青島，沙基，等處慘殺賠償案，第三是罷工的賠償案。特別是第一第二兩項為最重，一二兩項的責任，我們已交付代表團。剩下第三項的，是待我們自己解決。現在解決的機會到了，我們就好提出罷工解決的條件，省港罷工的情形從前不甚堅固，因為香港帝國主義利用廣州一般反革命派以破壞罷工，我們已把反革命派肅清了。現在已經到了第二個時期，就是要出兵東江，統一廣東。為什麼陳炯明餘孽能復起於東江呢？他們一力勾結反革命派，一方依賴香港帝國主義的幫助，現在陳炯明仍在香港，做帝國主義走狗的勾當，我們肅清東江，

就是要打斷港海的交通，使我們的罷工完全勝利。現在勝利的機會已到，故我們要提出解決的條件，如果他們不承認，我們則更努力的奮鬥，如果承認，不能說是我們的勝利，這個政策，不是我們示弱。乃是我們的進步。因為我們的勢力，已經發展到全國了，我們的廣州已經統一，現在又要肅清東江，所以他們斷不敢謂我們示弱，謂我們屈服，因為我們的勞力，一天一天的發展，已經在勝利的時候，則非示弱可知。前日政府接到港商電報之後，即將此電轉交罷工委員會，因為政府尊重罷工委員會意思之外，不理其他，這就是政府與罷工工友合作的表示，昨晚政府招待港商代表，他們徵詢政府有什麼意思，政府答以罷工委員會的意思，即是政府的意思。罷工委員會所提出各條件，政府是極力維護的，這就是政府與罷工工友一致的行動，現在政府又想邀集各界大會，共同維護罷工解決的條件。因為這些條件，不是工友單獨的利盡，而是全國各界的利益，所以各界應共同的努力，我們已經肅清各方，看來已很勝利。外人此後交通盡行斷絕，但我們的代表團已行北上，我們知道勢力從此更大發展。其次革命根據地鞏固，即是罷工的勝利。北京政府近日封閉

上海總工會，又可知擁護革命政府，即是保障罷工，現在出兵東江，可知革命的勢力鞏固，從前商家不贊助罷工，現在特與罷工工友協助；可見各階級人民亦一致贊助罷工工友了。我們知道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工友的勝利，亦即是政府的勝利。所以政府及各界對於罷工解決的條件，是極力維護的，我們提出條件的策略，如一支革命軍打仗，從前去打東江，後來又回師廣州，現在又要打東江，又要出師北伐，罷工的策略亦是如此。我們觀察西文報紙，大家知驚愕罷工勢力的利害，我們今日提出條件，不由他不承認，英國，德國，在最短期內將起革命了。益可使他們屈服於我們的條件，我們的根據地，一日鞏固一日，政府的勢力，一日發展一日，罷工團體亦一日發展一日，我們更聯合全國各界，堅持反帝國主義的目的，將來一定可以獲得最大的酬報。我希望大家提起精神，同心合力，一步一步的進去，我們可以一定得勝利，一定得成功！

東征勝利卽罷工勝利

——在第三十一次罷工代表大會之講演辭——

代表諸君，前一星期，兄弟來作一政治報告；今天又有二件緊要的事，要對諸君報告。這一次的報告，是繼續上次的，上次說的，肅清了反革命派，就可出兵東江，現在革命軍已出發到前方去了，因為離着敵人還遠，所以沒有接仗，我們的軍隊要追上去了。日間有種種謠言，謂前方已接仗，敵軍如何勝利，這些都是敵人偵探所散佈的謠言，不可相信。我們爲什麼要出兵東征呢？這是因爲陳炯明，前次勾通東莞石龍寶安的反革命軍，以圖危害政府，現在肅清了反革命的軍隊，剷除了敵人許多勢力，這一次香港帝國主義者幫助陳炯明以餉械金錢，是與罷工的關係非常重大；現在反革命的勢力。依然佈滿汕頭，他們肆意替帝國主義者破壞罷工，解散國民黨。隨時隨處都可發見他們摧殘工人摧殘農民的事實，最近之摧殘汕頭工人和慘殺海豐農民，尤其是可痛心的！現在的汕頭與北方上海的情形一樣了！但是張作

霖還不是替帝國主義暗中買力，而陳炯明便居然明目張膽了！帝國主義者以金錢軍械幫助國內軍閥，使其搗亂中國，破壞罷工團體，是其最慣用的手段。陳家軍在汕頭被他們雇用，正在非常得意，現在又想從東江反攻省城了，所以政府一定要出兵東征呢！出兵東征的重大意義，是有二種：第一是救出東江農民，第二是保護汕頭工人，前次黨軍到海豐時候，幫助農民的發展；非是幫助農民而壓迫地主，因為這些地主都是陳炯明一般刮地皮的爪牙，海豐農民受地主的壓迫不過，散在深山窮谷，很希望黨軍去解救他，當前次打陳炯明的時候，陳軍很希望農民能幫助他，殊不知適得其反，這是我們做農民運動的效果。此次革命軍出發東江，我以黨代表的資格，和蔣指揮再三誥誡革命軍，要比今年三月更加努力保護農工，我們保護農工，農工也一定幫助我們掃除反革命的軍閥。汕頭的工人非常覺悟，已經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已經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陳軍復據汕頭之後，他們受盡種種的壓迫，受盡種種的摧殘，所以革命軍要趕快去解救他們，保護他們，我們相信克復汕頭的時期，短則二星期，至多不出一個月，汕頭克復了，不獨是汕頭一隅民衆的益處，

實在是廣東全省之益處。因為克復了汕頭，則香港絕了接濟，英帝國主義者，除着屈服於我們的罷工委員會條件之外，別無他法。所以出兵東征去克復汕頭，與廣東全局的關係，非常重大。我們由此可知東征與罷工工友，有同一的目的，東征勝利，即是罷工的勝利，多等數日，捷音到了之後，我相信帝國主義者，一定更變今日之面孔。陳炯明一般的狗才，正肆意摧殘勞工，壓迫農民商人學生，盡是替帝國主義作走狗的勾當，我們打倒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即是打倒帝國主義一部份，我們相信東征的勝利和罷工的勝利，是在我們掌握之中。

其次仍有一件要報告的事，八月廿五日政府已經解散了江門梁鴻楷的反革命軍隊，後來又解散東莞石龍寶安的反革命軍隊，現在又有扣留熊克武一件事。我且把熊克武的歷史略講一講：熊克武當初亦是一個中國同盟會的會員，那時中山先生為總理，黃克強先生為總務，兄弟為評議長，熊克武亦是一個評議員。辛亥光復，無微勞，但是性情反復，至為可恥；及民國五年，他回到四川做了鎮守使，一變而為政學會的健將；民國七年，他四川督軍，只服從岑春煊的指使的，明白不受孫

大元帥命令，四川之大亂，完全是他所致的，借着北方勢力，殺戮了他們許多同志，伍博士忿辭職，他得補上，此後不通消息者好幾年。倒吳之役，他又借着革命軍的名譽去做招牌。那時孫大元帥寬其自新，畀以建國川軍總司令之職。及去年秋打敗後，走到貴州，又走到湖南，當到貴州時候，派了心腹的代表但懋辛來見孫先生，先生待以上賓之禮，他口口聲聲都說悔過，都說此後竭誠擁護。當今年三月東江時候，陳銘樞師長，在興甯林虎營中，獲得一函，中稱競存爲兄，對孫先生則直呼其名，而且諸多誣蔑之辭。此後熊克武率兵來粵，沿途皆有電致趙恆惕；廣西李督辦黃會辦均有電來報告，政府就曲予優容，指定四縣的地方爲其駐防，以資給養。詎知我以誠待彼，彼反以不誠待我。前天有一個逆黨，名叫張錫萬來見朱軍長培德，言詞閃爍，破露許多熊克武謀叛的話，并云香港政府有三十萬的接濟，朱軍長當即將他扣留研訊，直供出熊克武串通陳炯明謀叛情形，并云熊尙有代表在香港。政府乃下決心將熊扣留查辦。或者在外處的同志不知情，有謂政府治人過當，日間政府即將一切逆據印出，分發各處同志，使各方明白真相，知道不是政府之過。

當，乃是熊之不知感恩圖報，反以惡意相向。在從前革命，我已說過不無微勞，但是我們只問現在是革命與反革命，不問從前有功與沒有功，若是反革命，則應受黨律的處分，是以政府對於熊之謀叛，萬不能姑容，已令譚軍長朱軍長，將他的軍隊，悉行解散，不留一個以致遺害人民，現在北江方面，諸君可以不必勞心，一星期內，將收拾得乾淨。

我們東征的目的：一個是剷除反革命的軍閥，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要達到此目的，甯願犧牲一切，向前進去！兄弟今天所說的是報告東征的計劃及報告熊克武謀叛的情形，以及陳炯明爲什麼又來作祟，我們掃除帝國主義的走狗，就是掃除農工的敵人，鞏固罷工的團體，和鞏固國民革命的勢力。我們可以說：東征的勝利，即是罷工的勝利，兄弟有幾句口號，敬祝

東征勝利！

罷工勝利！

打倒帝國主義！

廣東統一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蒞各界人民大會開會之演說

各位諸君，自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政府所接受各方人民團體之郵電，請願出兵肅清東江者，幾無日無之。迨省港罷工後，英帝國主義者，以毒計封鎖港口，致消息隔絕，郵電不通，慣于造謠者，欲危害政府，遂散佈謠言，希圖擾亂廣州；而不法軍隊，無恥政客，失意軍人，亦復交相爲虐，以致市內不甯，然而政府斯時不卽出兵肅清東江者，實以市內未甯，故先以全副精神，整頓內部，自廖案發生後，政府益以猛烈手段，對於反革命軍隊，極力肅清，是以八月二十五日之役，盡將軍官捕拿殲滅殆盡，當處置叛軍之際，而商界工人農人各界人等，均無驚擾，此諸君所共見者，乃肅清內亂之第一步，又如出兵東莞石龍寶安一帶，瞬息之間，已將各叛軍繳械，詎料川軍熊克武來粵，竟勾結陳炯明魏邦平，敢爲內應，而政府亦以嚴勵方法收復之。故數月以來，未能出兵東江，實以此故。現下反革命者，已掃淨無遺，兄弟敢說市內已安甯無事，而出兵東江，正在此時期，以東征軍精銳之

師，向前猛進，敢信一二月內，即可成功。而汕頭不難取於陳軍之手，汕頭既克，則陳軍益無能爲力，而英國列強，昔之利用陳軍以圖壓制者，至是亦失敗。對於此次解決罷工各條件，惟有俯首就範。絕無抵抗不承認之能力矣。兄弟深望東征軍勢力，罷工團體勢力，先鞏固市內，次及於東江，東征軍勝利，卽人民勝利，罷工團體勝利。東征軍萬歲！罷工團體萬歲！

國民政府慶祝雙十節之演說

今日爲雙十節國慶紀念日，中華民國成立迄今十四年，而革命尙未成功，有何慶祝之可言？今日國慶日之慶祝，並無慶祝之事，不過係紀念今後吾人用何方法整治國家及希望如何發達。以前國家政象，尙多黑暗時代，自去年總理北上宣言，對於國家政治，指示吾人以一光明之路，迨北上奮鬥致疾逝世，其遺囑亦爲指導吾人國民革命一條最光明之路。此爲吾人整治國家必由之道，但吾人試按今年國慶日與去年國慶日之比，去年國慶日反革命派密佈，商團受帝國主義者挑撥，鎗殺無數青年，今日廣州市內反革命派肅清，不良軍隊掃除，東江陳軍及魏邦平等，勾結帝國主義希圖蠢動，而我革命軍已出兵征討，無難尅日蕩平。是吾人第一步統一廣州，第二步統一廣東之計劃，次第達到目的，俟統一廣東後集合各省同志之力，以廣東爲革命策源地，出兵北伐統一中國，則國家前途，才有希望。吾人乘今日國慶開會，關於一般國民致疑於我政府之點，略爲演述，如所謂共產及聘用俄人指爲喪失統

治權等說，無非係受帝國主義者之聳動，及帝國主義走狗之挑撥。若信妄言，即爲上了帝國主義者的當。吾人致誠受總理遺囑，繼續國民革命，恭讀總理遺囑，所謂國民革命，係謀中國之自由平等，其方法：一方喚起民衆，一方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試觀俄國待遇中國，是否如英日法美等帝國主義者國家，以經濟政治種種手段壓迫中國可比。俄國係以平等待我之國，吾人當視之爲友；英日法美等國，以種種壓迫手段施諸我國，則吾人爲國家獨立計，應起而反對之。證諸事實，俄國革命後與我中國訂定中俄協約，純本平等待遇精神，絕無侵略壓抑我國之事情，若帝國主義則不僅一國侵略壓迫我國，並聯合多數帝國主義共同行惡，如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等事。其所以加諸吾國，不論軍事上，經濟上皆取聯合壓迫侵略手段。是則吾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努力奮鬥，於理無背，故俄國既爲反帝國主義國家，吾人與之親善，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絕無可非議，吾人明白此點，應堅決進行，不當朝夕改易。憶日前徐季龍同志，謁見馮玉祥，請聯俄以助其發展，馮氏恐俄對中國有所企圖，

未允接受。迨蘇俄加乃大使發表宣言，撤退內蒙古俄兵，馮氏見俄國確能以平等待遇我國，即認之爲友，表示聯歡，信任惟篤，事業乃易成功。故總理之遺囑，所以指示吾人國民革命之途，極爲光明。國民革命乃能完成。望各位對於各種謠言，力爲闢正，則帝國主義者無所施其謠惑，革命政府日形穩固。革命乃有成功之日！

蒞各界婦女聯歡大會開會之演說

諸君，今日廣東各界婦女聯歡大會，兄弟回想聯歡二字，是有重大意義的；敢先談談，最近東江南路，均有開聯歡大會，東征軍至石龍茶山等處，該地人民，備極恐慌，奔走呼號，怕軍隊來駐，迨後向各人慰問，是否怕軍隊騷擾，強行買賣，不守紀律種種行爲。該地人民，均謂怕我軍共產，革命軍見人民與軍隊如此隔閡，所以在該地開聯歡大會，本良心說話，向人民解釋一番，說明東征軍目的。嗣後軍民安樂，可見聯歡大會有效果。又如南路各地，自民國十年已被鄧逆本殷佔領，迨前旬我軍收復陽江陽春各地，亦在該地開聯歡會，甚得該地人民歡迎。今日各界婦女在此開會，請各位宜注意各界二字，把各界二字想想，各界之中，是包括富貴農工商兵各種家族，而各人均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可算是同病相憐的。今以數事而論，第一件：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案，英法兩國把我巡行民衆，亂鎗掃射，所被屠殺之人，各界均有，列強是打各界，我各界應認定敵人就是一個帝國主義，由最高機關

以至下級人民，均應同心抵抗，不抵抗，就是上他當了。第二件：無人不畏盜賊，邇來河道梗塞，盜賊猖獗，然盜賊何自而來，兄弟說至此，實覺傷心，因世界不好，經濟困難，貧者遂流為盜賊，經濟困難之故，在洋貨多，而本國金銀溢出，此又是帝國主義之患。第三件：回憶香港從前頒布新律，我國人出口祇限帶現款五元，多則沒收，行其共產手段，與陳炯明等狼狽為奸，無故而使東江南路，風鶴頻驚，欲動搖我革命政府，此又帝國主義者之過。吾人須認定給如此痛苦與各界感受者是誰人？就是帝國主義。但此種敵人，非良善的，欲打倒不易，蓋具有無數殖民地與資本，其害廣東，狼心辣手，如我人民不能抵抗，則不獨害及目前，抑且貽及後世。故我們非實行國民革命不可。有許多人說，女界是慈心，國民革命是殘忍毒心的，不能對女界說的，是大不然，蓋國民革命對帝國主義則殘忍，對同志則慈心，吾黨總理孫先生，平居常言博愛，博愛是慈心，當其彌留時，猶頻呼和平救中國。可見和平是吾黨之目的，奮鬥是吾黨之手段，各女界是最有慈心者，既具此慈心，則對於壓迫人民之敗類宜推倒，明白國民革命之主旨，希望各位嗣後對於宣傳品，

出版物，宜留心一些，則可以利用各女界之慈心，而漸除洗滌各貪官污吏驕兵悍將之暴戾，各位向大路行走，則廣東自太平，尤希望大家要一研究痛苦是帝國主義所賜的，故要國民革命，大家同心，實力去做，國民革命成功，女界好多幸福！

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

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自立黨以來，至於今日，始終一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始，孫中山先生率領黨員，共同發誓，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所謂平均地權，便是民生主義之最要條件。後來發行民報，宣傳主義，登有一篇中山先生關於民生主義之演說。那時中國人注意民生主義的很少，所以新民叢報譏誚我們，說是『希冀乞丐流氓大盜小偷之爲我用』，我們因他說了一大堆，却沒得一句道著民生主義，便和他筆戰了幾回，後來他也沒有再說什麼了。

從那時候，以至於去年冬間，——國民黨改組以前，國民黨自己的出版和言論，無論是雜誌，是日報，是單行本，是公開的演說，是同志間的商榷，對於民生主義，沒有走過第二條路上去，也沒有人說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已經走過第二條路上去。

却是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漸漸的有人說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已經赤化

了，已經主張共產了。」我們很不明白，「改組」兩字，明明說是，「改變組織」並沒有說『改變宗旨』，何以引出這些誤會來？這些誤會無論是恭維是譏笑，我們都不能承受，關於誤會的解釋，有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闢謠」，以及民國日報特刊所載漢民實庵兩位先生的文字，一般誤會的人，看了以後，總可以消釋了。

我如今所要說的，不是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和其他之民生主義，有什麼分別？我只要說國民黨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就是把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的步驟，顯著出來。我以為如此，則一般的人，對於國民黨民生主義之誤會，更可以消釋。

要知道國民黨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先要知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是怎樣的。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得清清楚楚，不用我來複說；凡是看了這宣言之後，總可以知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最近於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既然如此，那國家必須是人民的國家，替國家辦事的政府，必定要是人民的政府，纔可以付託他實行民生主義，方纔可以使人民得著民生主義的利益和幸福。如果那國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却是什麼軍閥的，國際帝國主義的，這都是人民的對

頭，如何可以託付他實行民生主義；還只怕被他假借了去，將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剝削乾淨了呢。所以國民黨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先組織成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而欲組織成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必須先將和人民作對頭把持着國家和政府的如軍閥，如國際帝國主義者驅除了去。

有人說道：「中國現在並沒有貧富不平等的現象，用不着你們瞎操心的，講什麼民生主義」。哼！可知道貧富不平等的現象，是從有人類以來，便存在的；只不過階級的懸絕，還沒有十分顯著。自從機器明以後，那階級的懸絕，纔漸漸的顯著起來，所以民生主義纔成爲當急之務呢。於是又有人說道：「中國現在，機器並沒有盛行，多數的人民，還滯留在手工業的境地，大資本家壟斷利益的事實，還沒有發生，這正是「天相中國」，使我們中國的人民，沒有發達機器工業的機會，所以我們用不着什麼民生主義」。哼！這些話頭，還是真聾真瞎，還是妝聾妝瞎？自然，因爲國內軍閥橫行，隨意將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來做魚肉，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沒得保障，自然沒得發展實業的能力；然而軍閥的力量，祇能制止國人實業的

發展，却不能制止國際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講起那國際帝國主義的來源，便是因他的國內，自從機器盛行之後，工業發達，生產過剩，所以要在國外找些殖民地，來發洩他的有餘的力量。「天相中國」，中國人民，自己不能發展實業，正好讓他來發展了。中國人民被軍閥壓在頭上，掙扎不得，他却壓在軍閥頭上，不但使軍閥掙扎不得，而且還讓他操縱自如；可憐的中國人民，頭上被軍閥壓住了，却想在壓在軍閥頭上的人來競爭，真真不知自量。所以第一步是中國的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世界上競爭，第二步是中國的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中國以內競爭，這樣一步一步消沈的下去，那些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對中國便成了資本國了，中國對他便成了勞動國了。那些由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出來的人民，對中國人，便成了資本家了，中國人民對他，便成了勞動者了。四萬萬人啊！你的將來，只有做「世界的苦力」的地位，這便是今日極顯著的現象，觸目皆是，却還要說「天相中國」，沒有發達機器工業的機會，哼！還是真聾真瞎？還是假聾假瞎？

我也知道，到那時候，一般「苦力」裏頭，少不得有些「苦力頭」，所以荷蘭

殖民地裏一般中國人裏頭，居然也有什麼「馬腰」「甲必丹」「雷珍蘭」之類；他們一方將頭伏在荷蘭人脚下，一方却將腳踏在中國人頭上，將中國人血汗得來的利益，雙手捧與荷蘭人，趁便從中賺些放在荷包子裏，幾萬萬的也有，幾千萬的也有，幾百萬幾十萬的也有；這些好差使，將來只好讓那些巡閱使督軍去當了。有人說道：「資本家將絕跡於中國」，自然是，中國的將來，大資本家只是外國人，小資本家只是軍閥，一般人民，那裏有這些指望呢。

只是「苦力頭」的命運，也是不能長久的。因為有了「苦力」纔有「苦力頭」，可憐的中國人，到了今日，連「世界的苦力」看看也做不成了，從前美洲澳洲等處，不是都有中國工人的足跡麼？那時候，礦山要中國工人去挖，森林要中國工人去種，道路要中國工人去闢，中國工人，因為能在無限制工作時間裏過活，能在極廉價工錢裏過活，所以便博得「勤」「儉」「耐勞」等等榮名。漸漸的白種工人越來越多了，中國工人便漸漸的受了排斥了，索性連入口的自由，也禁止了，登時的便換了「污穢」「奸詐」「墮落」等等罪名了。我們試把世界地圖，展來一看，除了小小的幾

點南洋羣島之外，那裏還有中國工人站腳的所在？以彼例此，中國工人在南洋羣島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然則連「世界的苦力」也做不成，決不是在極遠的將來，只不過那些「苦力頭」還是在那裏做夢罷了。

說到這裏，我不能再講幾句關謠的話。國民黨因為全國裏頭，農人工人占大多數，要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不能不盼望大多數的人，出來擔任，故此對於農人工人的運動與組織，十分注重，對於農人工人所主張應得之權利，也十分注重，這本是全民革命所必要做的事情，誰知一般造謠的人看見這樣，便嚶嚶的說道，「國民黨是否認商業的，是摧殘商家的」，我問他道：「凡是生息於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現象之下，而不知道反抗的，纔真是否認商業摧殘商家。因為他明明看見中國人要走到「世界的苦力」那條路上去，而漠然無所動心，請他承受這個罪名，也不為枉，至於國民黨，是要反抗軍閥的，是要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這裏頭的是非利害，惟有商界，更容易明白；因為那些商家，正在那裏，受著中國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世界上競爭的苦，受著中國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中國以內競爭的苦，所以對

於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容易感覺，同時對於反抗的運動政治革命，也容易同情；結合起來，將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一齊打破，實現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政府，來實行國民羣的民生主義，以謀全民的幸福，不用說商家當然是在裏頭的。在政治革命未完成以前，一般商家，要將「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等等標語，來振起商業，國民黨不但認為必要，而且極願意的加以助力。因為我們今日，在這樣壓迫的環境裏頭，一方面固然要做治本的工夫，以謀徹底的解放，一方面也要做治標的工夫，以謀銖積寸累的成就；那「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等等標語，對於團結自力抵抗外侮是極有效用的，當然認為治標的最要方法。至於治本的方法，還是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因為必須打倒軍閥，我們的生命自由財產，纔不致動輒被人魚肉，我們纔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我們纔能將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來發達我們所要做的實業。因為必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我們纔能拒絕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管理權，我們纔能脫離了半主權國半殖民地的地位，我們纔能在法律上與各國人民平等，我們纔能利用稅權，來實行保護政策。以上等等，意義皆是

非常重大，關係皆是非常密切，斷不容我們輕輕放過，也斷斷沒有第二個方法；所以政治革命的澈底成功，是一樁不可少的事情。我們值得爲此而犧牲的。不然，也只有眼睜睜的，看着舉國人民陷於「世界的苦力」的命運，還有什麼意味呢？

以上所說，我們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已經約略可以明白；賅括起來，第一步是聯合全民實行政治革命，以打破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第二步是聯合全民鎮壓反革命者以實現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以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爲根據以實行民生主義。

我們既明白這當然的步驟，便當以不斷的努力，從事進行，不可半途而廢，也不可躐等，我們的理想中，縱然有極高尚極完美的主義，但都是第四步以後的事；到那時候，水到渠成，用不着豫先去想像；若要將豫先的想像，來做良心的安慰，也未嘗不可；只是不要亂了步驟。尤其要注意的，不可想入非非，以致走人歧途裏去。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的宣言

中國國民黨的宣言，已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的公布了。宣言的內容，已明明白白的揭露出來，供黨內外人的研究和討論。我如今所要說的，却是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宣言？又何以將此宣言公布於天下？

我相信自己和我的同志，在今日的環境中，精神上有一種說不盡的苦痛：便是中國的現狀和我們的主義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我們根據主義來建設中國，理想上現狀是要如彼如彼的，而今日的現狀，却是如此如此，難道我們當日的革命，是要做成如此的現狀的麼？那必不然，然則革命以後，中國的現狀，何以竟至如此？

中國以內，無論何處，都是曾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的。自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以後，所發生出來的現狀，却是武人猖獗，官僚放恣，真真是民不聊生，和革命的主義，立於極端反對的地位。

這些現狀，自北京以至凡在武人官僚勢力下之各處，是隨時隨地；無不發見的。這還可以說，以上各處，都已在反革命勢力盤據之下，然則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又如何呢？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以廣東為例，略說如下：

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廣東有些市政的進行，有些教育計畫的設施，也有些縣知事民選的試辦，表面看去，似乎是有革新的傾向了；然而按之實際，平民政治的基礎，全未奠定，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等問題，全未解決，在這種的地盤之上，施行種種革新的事業，設個極不堪的譬喻，就和一個人，身體上有了隱疾，却將美麗的衣服，來遮住體膚，浮豔的脂粉，來掩住面容，是一樣的。這一個人精神上苦的痛，也可想而知了。

十一年六月以後，至於今日，索性連那些裝飾品也不要了，赤裸裸的將渾身的隱疾暴露出來，古人說得好，「瘰癧忌醫」，如今疾是不諱了，醫却還是忌的。

十年冬間，有一個外國朋友，來看廣東。他對我說：「喂！這不是國民黨得了廣東，却是廣東得了國民黨呢！你看國民黨進了廣東之後，只看見廣東，不看見國

民黨了！我聽了他這番話，只有置身無地。他又對我說：『我惟有希望你們撤了廣東，從新再做』。我答道：『我們撤了廣東不難，只是交給誰呢！難道交與吳佩孚麼？』他聽了也只有啞然，不知所答。

去年冬間，另有一個外國朋友，也是如此的說；他說：『你們不要苦心維持廣東的現狀了，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我答他：『我們不維持，交給誰維持？交給廣東一班羣衆麼？羣衆是不知道承受的；交給敵人麼！包管敵人比我們壞十倍；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敵人是安心的要弄得那樣壞』。他聽了，也是無言可答。

諸君！我不是將什麼「吉栗各六」之言曰，什麼「古里丹都」之言曰，來眩惑聽者；我不過因為他們「旁觀者清」罷了。我也不是對於「吉栗各六」和「古里丹都」；欺負他不知中國的事情，隨口抵賴，我且將理由，寫在下面。

爲什麼我說『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敵人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試看元年以來，至於今日，凡是坐在北京握着政權的，真真是隨時隨地有他們建設

的機會，他們不但不去建設，反去縱他個人的私慾，平空的製造出許多亂子來，將一些建設的萌芽，都摧殘乾淨了；到今日，國勢危殆，民生憔悴，他們却一個個的趾高氣揚，視人命如魚肉，取帑藏如拾芥，是不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

回頭看一年以來之廣東，吏治是無可言的，財政是無可言的，「賣公產」「拉夫」等等，成爲千夫所指的罪惡；然而一年以來之廣東，它的環境是怎麼樣的？北面呢，是敵兵數萬，由江西殺來；西面呢，是鄰寇數萬，由廣西殺來；東面和南面呢，是叛兵數萬仗著敵人的接濟，由東江和高雷殺來；眞真是四面受敵。革命黨的領袖孫先生，率馳驅萬里轉戰經年的兵士，周圍苦戰，不「賣公產」，拿什麼做餉？不「拉夫」，拿什麼做運輸？這兩件事一做，其他吏治財政也就不用了。敵人和叛兵方面，看準了不剷除這些革命黨，不能在民國以內，隨意橫行，故此拚命要將他剷除。這些革命黨也知道被他剷除，民國必然隨以斷送，故此拚命要和他抵禦。「我願意爲正義而犧牲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人亦必願意爲正義而犧牲」，試看孫先生的幾番演說，對於廣東現狀，真是迸出滿腔的熱血，和濺出滿眼的痛淚來

，在革命黨勢力下之廣東，弄成這樣壞，真真是不得已的不是安心的。

難道說一句「不得已」就算了麼？不然！不然！我還有話留在後面：

我如今先要問的，是我方纔所說的，『便將廣東交給廣東的羣衆，那廣東的羣衆，也不知道承受』這一句話，究竟確不確？我以為是十分確的，因為今日廣東羣衆的態度，對於革命黨和革命黨的敵人與叛徒，似乎還沒有判斷。他似乎說道『最好你們不搗亂，讓我過些太平日子』；至於為什麼搗亂，為什麼過不得太平日子，他似乎沒有過問。有時他受了軍隊的騷擾，也知忿怒，也知抵抗，但是他似乎祇知道討厭軍隊的騷擾，却從未研究軍隊騷擾的來源。我真佩服他在這樣亂糟糟的環境裏頭，能過這樣毫無容心的日子；因為這樣，他荷包裏的錢，只有被人用賭局騙了去，用強硬手段搶了去，從沒有他自動的有目的有計劃的拿出錢來，因為這樣，一樣的出錢，不但享不著福，反賺些罪來受。這樣的羣衆，便是將廣東交給他，他如何會承受，只有被敵人和叛徒從他手裏頭，一把搶了過去；不然，便是羣衆裏頭鑽出幾個劣紳土棍，一把搶了過來；將羣衆任意的侮辱，接二連三，還是不休。

我不是只知咒詛敵人和叛徒，我不是只知埋怨羣衆，我對於革命黨不得已的行爲，並沒有寬恕。是所要說的，只是要人人知道我們，釀成今日的現狀，革命黨，反革命的敵人和叛徒，漠視革命的羣衆，都應該擔負責任。敵人和叛徒，是不肯擔負責任的，至於革命黨和羣衆，却不能不擔負；那麼革命黨和羣衆便更商量一個共同擔負的方法。

說到這里，我且舉出廣州一個現狀來，做條引綫——廣州當軍事緊急不得已而拉夫的時候，大街上，一頂三人抬的轎子，中間坐着一位姨太太，滿身珠寶，安安逸逸的四下裏看熱鬧，拉夫的走向前來，將中間的一名轎夫，拉過去了。這時候，前後兩名轎夫，雖也能將轎子抬起，却是風頭已大減了。姨太太怒容滿面，很很的咒罵『革命黨應該天誅地滅，爲什麼減了我的風頭』；被拉去的轎夫，愁容滿面，心裏說道，『這可遭瘟了，眼見得要赴戰地工作了，幾時纔能夠回家呢？』這姨太太和轎夫兩個人一樣的心裏不快，一樣的唉聲嘆氣，却是一個祇爲減了伊的風頭，一個却爲身體和自由遭了意外。

姨太太的心裏頭，只要過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什麼革命黨，反革命黨，全不與伊相干；只要擾不着伊的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伊便什麼也不管；不然，便要咒罵的。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應該怎麼樣？第一要問的：在這戰事裏頭，我自己是否和姨太太一樣，只要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如果是啊，我自己已不是革命黨，已成了革命黨的叛徒；第二要問的，在這戰事裏頭，能否容許有一部分的人什麼都不管，只會過他那安逸而有風頭日子；第三要問的，在這短時期內，我們人類，縱然做不到人人都平等生活的日子，却是能否容許過分的懶惰和過分的疲勞，永永的相形著。

轎夫的心裏頭，覺得我是一輩子沒人理會的；平時呢，將這身體來做牛馬似的生活；戰時呢，拿這性命往戰地裏送；什麼革命黨，什麼反革命黨，都和我沒相干。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應該怎麼樣？第一要問的，革命黨會否想到有這一類的人，日日過這樣的生活，可會替他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第二，如果想到了，想出方法了，何以不能實行？第三，這一類的人，決然是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的，然不

願意，何以忍受呢？何不能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呢？何以有人替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他竟不知道呢？

我們如此的一一追問下去，便可以明白革命的主義和革命所惹出來的現狀，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黨和羣衆還沒有真真密切的結合。革命黨雖抱着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目的，却不能得羣衆自動的助力，所以不得已的乞靈於羣衆被動的助力了。然而被動的助力，是極單薄的，是極散漫的，不但不能供達到目的之用的，反而把目的蒙蔽住了；所以纔有種種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演了出來；如今要除去這些現狀，惟有使羣衆明白主義的真面目，惟有使羣衆知道爲革命而奮鬥，便是爲羣衆利益而奮鬥，也便爲自己利益而奮鬥；羣衆得不着利益的時候，自己決不會得着利益的，若然得着，便是羣衆的姦賊了。如此，羣衆裏頭，對於革命黨，知道革命不單是他的事，知道不能將革命事單望於他，他只是羣衆裏頭一個搖旗吶喊的先鋒，羣衆却是他的大隊；羣衆裏頭，雖然還有些人，只圖自己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然而因爲這是羣衆所不許的，他也不能不跟着羣衆的意思做了。在奮鬥的

時期之內，羣衆裏頭，雖然還是推着痛苦準備着犧牲，也許痛苦和犧牲的程度，比前更利害，然而痛苦是有代價的，犧牲是有目的的，由被動的地位，進而至於自動的地位，不但良心安慰得多，便是勇氣也增長得多了。這樣做去，眼前一切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自然便漸漸的消滅了。根據主義而發生的現狀，自然便漸漸的發生出來了。

革命黨如何能和羣衆做真正密切的結合呢？第一要訓練革命黨自己，第二要向羣衆宣傳。

根據這訓練和宣傳兩個理由，中國國民黨纔有此次的宣言。宣言的第一段，將中國的現狀，毫不隱諱的揭露出來，便和一個人將自己的疾病傾吐出來一樣；第二段將中國國民黨的主義，詳細的解釋一過，便和對着疾病擬出根本療治的藥方一樣；第三段將最少限度的政綱，鄭重的列舉出來，便和對着疾病施行救急與看護一樣；中國國民黨是否在羣衆利益着眼，是否願意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看了這宣言，也可以明白了。

羣衆啊，現時中國的病狀，是否如宣言所說的？對於這病狀療治方法，是否如宣言所說的？如其是啊，宣言的實行，便是羣衆的責任。（編者按這宣言便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

諸君，今日是實業部演講會第三日，亦即是最後之三日。演題是「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第一日邵元冲先生的演講，將歐美實業發達之歷史，及大戰前後歐美各國之實業狀況，詳細說明。第二日廖仲愷先生的演講，將中國實業狀況及產業落後之原因，詳細說明。聽了邵先生的演講，可知道歐美因為實業發達之故，在國內釀成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國外釀成掠奪殖民地的趨勢。這種趨勢，直使地球上五大洲，有三大洲半，改變了顏色。地球上五大人種，有三大人種，半陷於滅亡或奴隸的境遇。其意義可謂非常危險，非常重大。聽了廖先生的演講，可知道歐美的帝國主義，已侵入中國。使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地圖跟着變色，人種跟著滅亡或做奴隸。其意義可謂非常重大，非常急迫。邵先生的演講，好像說明一種流行病正在世界上猖獗，廖先生演講，好像此一種流行病已流到中國來了。然則今日的演講，便好像說明對於這一種流行病，應該如何醫治。只是兄弟才力薄弱，恐怕不能勝演

講之任。只不過略述一些愚見，來引起諸君的討論便了。

所謂救濟方法，說來本有種種，好像對於疾病，有種種藥劑。只要他能對症，能有效，便是好，不然，便是壞。如今試將中國過去及現在所用方法，略加敘述，並附以批評。

帝國主義之侵入中國，第一幕悲劇，便是鴉片戰爭。那時候，英國對於中國，和對於其他各處的殖民地一樣，照例的要達到他掠奪原料消售商品種種實業上的願望。爲達到這些願望，不惜以武力來壓迫中國。那時候中國雖然沒有十分明瞭他的用意，却還知道抵抗，只是抵抗的方法，太不高明。我們廣州人，總還記得，那時候有一段狠可笑的故事，是『楊侯爺擺屎桶陣』。以一個身經百戰的楊芳，看見英國軍隊的槍砲利害，却認爲是一種妖法，便去徵發滿城裏的屎桶，擺在城上，要將污穢之氣，來壓治他。試問這些方法，如何能有效驗呢。從那時候，一直鬧到庚子，中國依然想不出別樣抵抗的方法。只不過把擺屎桶陣，改做練拳頭舞大刀。其沒有效驗，可不是和屎桶陣一樣。如今批評起來，不能不說這些方法是至愚極蠢。然

而帝國主義爲達到他的願望，不惜以武力來壓迫。中國爲阻止他達到願望，不惜以武力來抵抗。却還是針鋒相對。

庚子以後，中國因爲抵抗的方法，沒有效驗，便索性不去抵抗了。大家抱着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來歡迎帝國主義。歡迎他到中國來掠奪原料，消售商品，歡迎他來制中國實業的死命。歡迎他來制中國社會經濟國家財政的死命。一般人民，漸漸的以洋貨爲時髦，以國貨爲背時的東西。這種見解，漸漸的成爲風氣。更有少數的敗類，附帝國主義的勢力，爲虎作倀。於是一種『買辦式』，始而流行於實業界，終至流行於政治界。及至買辦式有了左右中國政治的勢力，中國之離去亡國滅種，便不遠了。他們提起了從前擺屎桶陣，練拳頭，舞大刀的人，都大笑的說是野蠻。其實他們的愛國心和人格，比起從前那些人，真真是有雲泥之隔。如果照着他們這樣的做去。殷鑒不遠，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及南洋羣島的棕色種人，以及印度緬甸安南，便是榜樣。

如上所說，抵抗是不可少的。如今所要研究的，祇是抵抗的方法。舊的抵抗方

法，我等已知道不適用了，則不能不更求新的抵抗方法，好像我們對於一種流行病，舊的藥劑，不能治愈，則不能不更求新的藥劑。剛纔說過，這種流行病，是由世界傳到中國來的。因此我們研究新的藥劑，便不能不求之於世界。如今世界的現狀，就一方面說，歐美是帝國主義的發源地。其他三大洲有半，是帝國主義的對象，便是所謂殖民地。所以全世界裏頭，顯然分出兩個階級。然而就他一方面說，便是歐美的國家裏頭，也顯然分出兩個階級。剛纔說過，歐美各國實業雖然發達。可是土地資本都操於極少數人之手，以致釀成國內貧富不均的現象。同時因為掠奪殖民地的緣故，這一國也來掠奪，那一國也來掠奪。互相掠奪的結果，變成這一國和那一國的戰爭。因之便有所謂戰勝國和戰敗國。而所謂勝敗，不過暫時的現象，不是恆久的現象。所以戰爭便無終止，惟此之故，歐美的人民，大多數的人民，都痛心疾首的，要解決這些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便有了許多答案，這些答案，便是剛纔所說的藥劑，也便是剛纔所說的方法了。如今試將這些答案，略述一下。

一是社會政策。他的內容，對於社會經濟組織，如土地制度資本制度等，並沒

有設法改造。只不過想做些彌縫補苴的功夫。例如調劑資本家，改良勞動者待遇等等，一些溫情的政策。這些政策。雖然有時會出風頭。只不過揚湯止沸似的，並沒有根本解決的效用。有些人還痛恨這些政策，足以淆亂根本解決的目標，以為有如無。這些政策，都是偏於國內貧富不均一方面的。却是對於國際戰爭一方面，也有些類似的政策，如國際聯盟等等。這些已成爲空想，甚至已成爲笑話。

一是社會主義。他的內容，對於社會經濟組織，如土地制度資本制度等等，主張根本改造。要將私有制度改爲公有制度，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他並且知道這樣的根本改造，單行於一國以內，是不能有效的。必須普行於各國，然後可以成功。故他主張聯合各國被壓迫的階級，一致努力以求實現。這樣，各國戰爭的原因，便根本取消了，世界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兩階級，便也根本打破了。

從前倡導社會主義的，不過根據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道德心。祇是一種理想，沒有實行的條件。所以被稱爲理想的社會主義，又被稱爲烏託邦社會主義。自從馬克思發明了唯物史觀，然後社會主義有了實行的方法和步驟。所以被稱爲科學的社會

主義，以別於理想的社會主義。

科學的社會主義，從來又有許多派別。然而他的究竟目的，是沒有不同的。簡單說來，便是剛纔所說，將土地資本等等私有制度，變為公有制度。只不過達到目的之方法有許多不同便了。例如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者，謂之改良的社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等便是。主張以革命破壞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者，謂之革命的社會主義。其中更可別為兩大派，一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亦可名為集產主義，或國家共產主義。一是蒲魯東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亦可名為無政府共產主義。這兩大派的理想，最顯著的分別，一個是取得政權，一個是要否認政治，一個主張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主義的理想。一個主張由工團直接行動，以工團替代國家組織，來實現主義的理想。

以上所說，不過是一種舉例的方法。關於社會主義，流派繁衍，學說深富，斷不是這短時間的演講，可以說明的。如今所以用這一舉例的方法，無非借來說明世界上對於實業問題，已有了這些答案，可以作為解決的方法，至於那一種方法最為

適宜。不從剛纔所說的。只要能對症能有效，便是適宜。世界的流行病，雖祇是一種。而各家各民族感受的程度，却不必盡同。因而所療治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只不過對於大原則，却都是逃不了的。說到這裏，似乎應該將各國療治的方法，略述一下，以作參攷。然而因為時間的限制，只能把一個最舊的，和一個最新的，來做舉例，

那一個最舊的呢，便是維新五十餘年來之日本。當歐美帝國主義的風潮，捲到東亞，日本與中國，是陷於同一境遇的。而日本因國小民寡之故，較之中國，尤為岌岌可危，差不多要和安南緬甸一樣的失敗了去。然而日本何以能至今存在，且有獨立進步的現象呢。當美國兵艦初到日本停泊海口的時候，在美國是藉以示威，在日本果然舉國震驚。一般人民，看見小島似的兵艦，泊在海面，都覺得莫知其然。有些志士見了這樣，又怕又恨。便提議，約一班同志，各帶斧頭鑿子，泗至兵艦旁邊，將他鑿沉。誰知作了半刻，竟和螻蟻咬鯨魚似的，分毫沒損。那時候日本志士的知識，也和楊侯爺擺屎桶陣，義和團練拳頭舞大刀差不多。却是日本志士，自此以

後，對於歐美科學文明，得了深刻的印象，刺激起比較的觀念，和模仿的興味來了。維新的思想，便從此發軔。那時候，日本的天皇，是主張攘夷的。大將軍却是主張開港的，判斷起來，自然是大將軍的力，優於天皇。日本志士既然知道維新，自然是贊助大將軍以反對天皇的。誰知不然，日本志士，沒有不擁戴大皇的，因而發起『廢藩覆幕』的運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從來要維新必先要改造政治。要改造政治，必先要革命。這是一定不可易的。日本那時候，政治上的大權，在大將軍不在天皇。所謂天皇，不過是個虛器。而大將軍的基礎，却是建築於封建制度之上。幕府與諸藩，聯成一氣，把持政權。日本志士，看清題目，知道革命的目標，在打破封建制度。故以『廢藩覆幕』為革命運動的標語。所謂擁戴天皇，不過為一種手段罷了。日本志士，因為看清題目，所以政治改造，便告成功。可憐的中國，自曾國藩以至張之洞一班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一直的糊塗下去。康有為一班人，便更走入邪路了。日本政治改造成功以後，一班志士，現出本來面目，再也不說什麼攘夷了。一面開港。一面舉國一致的努力於維新事業。將歐美新發明的精神文明和

物質文明，盡量的輸入，盡量的模仿。幾十年間，造成今日強大的地位。不但是歐美帝國的主義，不能侵入。不平等條約，老早消滅。領事裁判權等等，老早消滅。政治外交，完全獨立。便是實業經濟，也有一日千里之進步。日本人民，至今舉行什麼開港祭，來紀念開港的好處。一樣的黃面皮人，安南緬甸等，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至於滅亡。日本却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刺激其發榮滋長，這祇由於知道抵抗與不知道抵抗之一念啊。日本從前用斧頭鑿子，希冀鑿沉美國兵艦。抵抗的方法，是何等笨拙。至於今日，已以艦隊與美國爭衡於太平洋上。抵抗的方法，是何等進步。我們中國擺了屎桶陣，練了拳頭，舞了大刀，至於今日，索性連抵抗的念頭也撤掉了。茫茫世界，只讓日本替黃面人爭氣，這是怎麼說呢。

日本的維新，光明的一方面，如上所述。至於黑暗的一方面又如何呢。剛纔說過，日本對於歐美盡量的模仿，自然連歐美的實業制度也模仿了去。如邵先生所說的，歐美實業狀況，一樁樁的都移殖到日本去了。國內貧富兩階級，登時便顯著出來。歐洲大戰時候，正是日本對外貿易最得意的時候。民國七年的約略統計，日本

實業界，每年獲利至十三萬萬元。一般實業家暴發戶的形象，無處安放。在旅館裏住一日，數元或十數元的結賬，却賞給了幾百元幾千元的茶錢。弄得暴發戶不敢去住旅館。這也可說是窮奢極侈了。却是米風潮便也暴發於那時候。據一個中學教員的自述，說全家妻子，已經有三個月不能拿魚來下飯了。中學教員的境遇，尙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極少數的人民，雖然因中日戰役，日俄戰役，日德戰役，得了不少的歡笑。然而大多數的人民，一片呻吟痛哭之聲，已從那些歡笑裏，直透了出來了。

日本國內貧富階級的軋轢，已經和歐美一樣。歐美所不能解除的痛苦，日本一樣不能解除。至於國際呢，日本從前恐怕受歐美的侵略，把自己變成殖民地。如今却已和歐美競爭，要將他人來做自己的殖民地了。滅了琉球。搶了臺灣及澎湖列島。滅了高麗，搶了滿蒙一帶種種特權。榨取他人的脂膏和血汗，以滿足自己掠奪原料消費商品的欲望。比之歐美，更覺無微不至。所差的，歐美是取之於異種人，日本却取之於同種人罷了。這種現象，所生出來的結果，不外被壓迫者之反抗，與掠

奪者之競爭。所以日本一面很高興的做壓迫同種人的事業。一面戰戰兢兢的做日美戰爭的準備。這兩者有一不如意，便該倒運。馬克思說得好，「資本家自己掘墳墓，來埋葬自己。」帝國主義者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我們看清了日本光明和黑暗兩方面。便知道日本光明的原因，在 早自覺悟，能抵抗得住歐美帝國主義之侵入。這一方面是我們所贊歎羨慕的。其黑暗的方面，在於惟知盡量的模仿歐美，亦步亦趨。步趨歐美的時候，猛跌一交。他以為這猛跌一交是必要的，也就撲冬的跌了下去。換句說話，便是不知採用社會主義。我們中國一班時髦學者，見了這樣，便以為步趨日本，是必要的。猛跌一交，自然也是必要。換句話說，便是將實業發達了再算。社會主義，且勿談起。這種謬誤，真不可恕。須知日本維新在五十餘年以前，那時候，歐美貧富階級，還沒有現時這般懸絕。社會主義研究，還沒有現時這般精密，日本的猛跌一交，在情理上還可原諒。到了現時，日本已和歐美一樣，積重難返。是欲求將社會經濟組織根本改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所以日本大多數人民，已經焦頭爛額的，不知所措。我們中國，

維新已較日本落後了五十餘年。眼睜睜的看着全世界爲社會問題，徬徨歧路。而社會主義又清清楚楚的已指引了我們一條大路。我們一定還要學他人從前猛跌一交的玩意兒，跌入深坑裏或火坑裏去。那可說是毫無人心了。

以上把最舊的說過。何以說他是最舊呢。因爲這是五十餘年前的事。如今該把最新的說一下了。何以說他是最新呢。因爲這是六七年來的事。人人知道，十八世紀驚天動地的事，是法國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世界政治革命的導師。二十世紀驚天動地的事，是俄國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世界經濟革命的導師。民國六年之冬，俄國多數黨推倒克倫斯基政府，實行他們的主義和理想。他們的領袖和黨徒，都是相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起初的時候，似乎要即刻實現國家共產制度。然而不久便行新經濟政策，將國家共產主義的目標，移到這些，此中原因，有些人說，這是豫定的計畫。當然的步驟。起初是以軍事便利爲目的，後來是以推行政策的次序爲目的，並非矛盾，有些人說，是因時制宜的手段。起初原欲即刻實現國家共產制度的。後來感覺環境的困難，纔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對付一切。這正是俄

國領袖之善於適應，這正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如今要詳細說明這些事實，一來材料不多。二來兄弟的知識有限，三來時間不夠。只得舉一個重要的例來說明了。我們聽了邵先生所說，已經知道十九世紀之後半期，俄國的經濟基礎，已由農業移於工業。工業的革新，次第舉行。政府之極端保護政策，更促進這般趨勢。產業之集中，幾幾乎和西歐諸國匹敵。於是勞動問題之發生，社會主義之運動，隨之而起。俄國多數黨得志之後，便要實行勞動者管理工場的設計，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發布命令，各工場受僱之工人，選舉代表，組織工場委員會，以管理工場諸般事業。不消說得，一般資本家便逃得無影無蹤了。工人得了管理工場的權利，固然高興。可是資本問題，怎樣解決呢。漸漸的資本缺乏，迫於眉睫了。一來沒有本錢來經營調度。二來沒有本錢收買原料和燃料等件。三來沒有本錢來支付工錢。這三樣一來，工場的經營，便有不得不停止之勢了。所以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五月，全俄經濟會議，便生出「工人管理工場制度」和「國有工場制度」兩派之爭議。因為鑒於情勢，「國有工場制度」便占了優勝，於六月二十八日，

發布命令，將工場收歸國有。這就較之工人管理工場制度，容易辦些了。只是那時候的國家和政府，也是缺乏資本的。弄來弄去，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五月，俄國國民經濟會議，便決定全國之中小工業，得由國家貸與私人辦理。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七月五日發布命令，規定貸與之程序及方法。其命令之內容，極為重要，今述其大概：

- 一，高等經濟會議，以一定之期間為限，對於個人或團體，以國有工業貸與之。
- 二，貸與人僱使勞動者，要依從所有關於勞動法規之標準。
- 三，貸與人就於其工場之製品，於法令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或販賣之。
- 四，除裁判判決之外，政府對於貸與人，不得為事業之收回，或特許條件之變更。

自此之後，中小工業，便漸漸的移於民業。有些人說道，「俄國放棄了共產主義了。」其實照第一二三項看來，便可恍然，如此設施，和現時資本制度之社會，大有不同了。至於大工業，因為需要大資本的緣故，竟將來貸與外國人。一九二〇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布命令，其內容大概如下。

一，政府以一定之年限，得貸與國有工業。

二，貸與人僱使勞動者，於關於勞動法規之範圍內，得為任意之處分。

三，貸與人於法令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其生產品，且輸出其幾部。

四，在特許年限中。不有沒收放下於事業之財產，以歸國有。

五，特許年限完滿之際，政府得以相當之代價收回之。

六，特許條件，無貸與人之同意，不得變更之。

七，貸與人關於生產之方法，行顯著之技術之改良進步，政府與以特別之保護。

此命令不止以工業為限，耕地，森林，礦山等，亦在其內。在發布此命令之時，俄國政府豫定計劃，要將森林三十八處，礦山十九處，貸與外國人，有些人說道，『這不止是放棄了共產主義，檢直是歡迎外國資本主義之侵入了。』殊不知他有了第二第三兩項，外資儘管輸入，也無妨害。這正是能駕馭外資，而不為外資所駕馭啊。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千頭萬緒。以上所述，不過舉工業一端，來做個例證。

其餘各端。也就可以類推了。俄國的新經濟政策，以後還有變更沒有，此時不能豫言。但專就新經濟政策而論，俄國的決心勇氣，要將社會主義，逐步實現，已非其餘的國家所可企及了。

以上所述，還只是就俄國國內社會經濟組織來講。至於國際，又何如呢。俄國君主專制時代。是以帝國主義加入的。及勞農政府時代，帝國主義，早已放棄，却不能不防備他國以帝國主義相加了。如今舉一兩個例來說。在工人管理工場的時候，俄國政府，還沒有決定改歸國有。却因為對德講和，派遣拉甯，到德國做代表。那時候，德國政府，有些意思，希望俄國，將德國資本家在俄投資及經營之事業，於政府保護之下，依然作為民業，繼續存在。德國政府這種希望，於俄國前途，關係極為重大。如果俄國答應這種要求，不但各國一定援例照樣。便是俄國的資本家，也自然會和德國資本家結合起來。躲在德國資本家的背後，指揮操縱。新建設的社會制度，便被他壞破無餘了。拉甯探得這些消息，急忙致電俄國政府，請其從速發布工場國有命令，以杜絕德國政府此項要求。並且使德國政府於和約上承認俄國

之國有工業制度。俄國政府接了拉甯來電，便毅然決定發布國有工業政策。這一場糾紛，纔得消弭於無形。及至俄國政府發布工業貸與外國人之辦法以後。法國政府認爲機會來到，教唆波爾資本家，利用這個機會，將俄國軍路上之主要點，設法貸得，以便擺布陰謀。幸而俄國政府偶然發覺，急忙將特許取消，纔算了事。看這一兩個例，便可知俄國防禦帝國主義之情形，至於組赤衛軍，以抵抗列強聯軍的干涉，事實顯著，更無容贅說了。

說到這裏，兄弟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照俄國現在情狀，如果有人恭維他道，「已經實現國家共產主義，」俄國政府的領袖，必然拱手的說，「不敢當，不敢當。」誰知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有人說是「已經主張共產」。并且說是「廣州政府已決定於本年四月一日實行共產」，究竟這些話是恭維呢，還是刻薄呢。中國國民黨也只好說「不敢當，不敢當」罷了。

俄國的經濟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聽了以上所講，可以明白。然而俄國這一場革命，不但於俄國有極大的影響。並且於世界也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是促進了

先進各國的經濟革命運動，和喚起了世界上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是無可疑的。

以上所說，一個最舊的例，和一個最新的例，我們可以明白。實業之救濟方法，既須明瞭目前的環境，又須明瞭將來的趨勢。明瞭目前的環境，方纔能定出步驟。明瞭將來的趨勢，方纔不至於一交跌入坑子裏。不然，縱有藥方，而既不對症，又沒效用，還是等於無藥方啊。

如此，我們便要研究中國實業的救濟，應該用何方法。廖先生已將中國實業之狀況，及產業落後之原因，詳細說明。對於產業落後之狀況，而來救濟，無疑無貳的，是發達產業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中國今日共產二字，實在說不到。因為中國今日實在是無產可共啊。然而有一問題於此，產業要怎樣纔能發達呢。換句話說，產業是靠誰去發達呢。如果照現時這樣的土地制度和資本制度。則發達產業的權柄，必操於極少數人之手。因之產業發達所得的利益，也必歸於極少數人之手。大多數人民，不但不能因產業發達，而得着利益。反因產業發達，而受着痛苦。

正和歐美日本覆轍，一般無二。則中國又何貴有產業發達呢。所以企圖發達產業的時候，不但當注意生產的方面。同時還要注意分配的方面。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是指生產缺乏，不均是指分配不均。春秋戰國時代，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不不要緊的。如今是世界交通時代，生產缺乏的結果，便會受帝國主義者所宰割。故此我們不能不患寡。但只患寡，是不夠的。歐美日本的覆轍具在，故同時不能不患不均。既然如此，便須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全國人民，在這公平的基礎之上，共同生產。他的生產力量，自然來得又普遍，又偉大。而且生產共同，享受也共同，寡的問題，從此解決，不均的問題，也從此解決了。孔子復生，定然也點點頭兒，說是不錯的。

如此說來，我們可以明白，要對於中國實業之狀況，而施以救濟，惟有發達產業。要發達產業，惟有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這是不生異議的。如今要問的，是如何而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基礎之上了。

要答這一問，至少要略知道本黨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內容，不外兩

樣。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這兩樣便是「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之最適當方法。而且對於中國現狀，是極對症而又極有效的藥劑。

如今要問的，是怎樣平均地權了。要明白平均地權的意義，先要明白地權的意義。經濟學家眼光中的土地，有三種要質。(一)是面積。我們所行着的，站着的，生着的，都離不了土地，那塊土地，橫有多少，縱有多少，便叫做面積。(二)是肥富。一粒種子，種在地下，靠着土地的滋養，長成穀米，或長成樹林，所以叫做肥富，(三)是位置。一樣的土地，在交通阻塞之處，和在交通便利之處，他的價值，便有大大的分別。在工業寥落之處，和在工業繁盛之處，他的價值，也有大大的分別，所以叫做位置。我們要知道，土地之於人類生活，有重大關係。差不多除了空氣，便算他了。人無空氣，不過五分鐘，便不能生存，空氣是人人可以呼吸的，真正算得是共產。然而這話也不免於樂觀，試想沒錢的人，住在又偏窄又污穢的屋子裏，和有錢的人住在又高闊又通爽的房子裏，他們所呼吸的空氣，其質的清濁，或量的豐歉，同不同呢。空氣尚且如此，何況土地。古人形容貧窮的人，說他貧無立

錐。就是說他連立錐的土地面積都沒有。所立着的，都是別人的土地，住着的更不用說了。講到肥富，地主安坐而食油粘白米。佃農終歲勞動，利用肥富，種出穀子，舂成白米，供給地主。自己却要靠落花生和白薯芋頭來充饑。爲什麼這樣，無非因爲土地屬於地主，故此肥富也屬於地主。單筆面積和肥富來講，已經知道土地影響於人類生活之重大，真個是一有百有，一無百無。至於位置，比起以上兩者，更是緊要。我們知道全國土地，都是以位置之不同，而定價值之不同的。通都大邑的土地，俗語叫做寸土寸金。比起荒村僻壤的土地，價值相差自幾十倍以至萬倍不等。拿一個例來說，廣州市長堤西濠口附近的土地，每一畝的價值，十八萬元。比起他處，相差何止百倍。比起廣州市以外各處，相差何止千萬倍。上海黃浦灘的土地，價值却比廣州市長堤西濠口的，又更貴了，同是一塊的土地，因爲旁邊開了馬路，或築了鐵路，價值登時就飛漲起來。因爲附近開了商場，立了工廠，價值登時也飛漲起來。所以有土地的，便不愁窮。沒土地的，無論有如何本事，不能不受有土地的種種的敲詐勒索。古人說有土斯有財，真真是不錯的。只是論起來，那些馬

路鐵路商場工廠和那地主本沒相干的。然則因爲開了馬路，築了鐵路，闢了商場，立了工廠，而使土地增加價值，這些價值也和那地主是沒相干的了。然而地主却安穩穩的享受那沒相干的利益，那地主是何等的僥倖，社會却是何等的冤枉呢。所以許多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不應歸私人所有，這實在是正當的道理。孫先生的平均地權，却是準於道理，而定出一種不偏不激的辦法。他的主張是，「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後，私人之土地所有權，不得超過法定限度」。這樣一來，一般地皮友，收賣土地，安坐而收社會生產之利益，並且藉以操縱社會生產之野心，便不得不消滅了。「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定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這樣一來，原有的地主將價報貴，政府便照價徵稅。將價報低，政府便照價收買。日後那塊土地，因爲交通工業的影響，增加價值，無論增加至幾十倍幾萬倍，他所能坐享的，還是固有的價值。至於其餘的價值，既然是社會使之增加的，也還是社會來享受他。種種公益的事業，便不至經營無着了。一方面不剝削地主固有的利益，一方面維

護社會生產的利益，這便是平均地權的概略。

如今要問的，是節制資本了。所謂節制資本，不是節制資本的數量，是節制資本的用途。孫先生建國方略中實業計畫，說得最爲詳細。他將實業分爲國家經營與私人企業兩種。『凡事業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之，兼以法律保護之』。這是規定私人企業的範圍。『凡事業之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這是規定國家經營的範圍。這樣一來，一方面不束縛私人之活動能力一方面不使私有資本制度得以操縱國民之生計。這正和俄國的新經濟政策，鬚髯相似。俄國將中小工業貸與私人，將大工業貸與外國人。其目的在使私人資本得以供活動社會經濟之用，而不能爲社會經濟之害。一在駕馭外資，以開發大工業，而不爲外資所駕馭。俄國是由失敗的經驗，得來的知識。孫先生却是在於俄國革命以前，運用自己的思想，豫先替中國革命以後，想定種種計畫，他的機器借款論，便是駕馭外資之絕好方法。爲中國之產業發達計，所不可不採用的。可是國人對於孫

先生的實業計畫還沒有十分認識。這真是一件缺憾的事啊。

明白了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概略，便可以知道這都是「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之最穩當最適宜的方法。若將這兩樣做到，一面可引中國到產業發達的路上去。一面可使中國不蹈歐美日本分配不均的覆轍，釀成社會革命的慘禍。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除了這樣，再沒別的方法了。

有些人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中國人人，得共同生產，共同享受，固然是好。只是一般實業家，聽了這話，未免失望。因為實業家辛辛苦苦，無非想享些豐亨豫大的幸福。如果地權平均，資本節制，那裏還有這些指望呢」。這些說話，未免過於誤會。如今一般社會主義者，因為看見社會貧富不齊，既覺得為富不仁者，帶着無量數罪過。又覺得一般人民，都在那裏受着苦痛。所以本身提倡儉樸，來表示自己的理解，安慰自己的良心。一般沒有見識的人，看見他們這樣，便以為社會主義者，惡富好貧，他的主義實行之後，定然人人都變成乞丐模樣。殊不知社會主義者的究竟目的，正是要人人皆富。吳稚暉先生說得好，「我們的無政府主義

者，是要將人人都任街道上鋪着地氈行走，坐在游廊下，看着街上風景，一面吃飯」。試閉目想想，這是何等豐享深大的氣象呢。比之自己坐在一間鐵網似的房子裏，黑暗而美麗，吃着飯，聽着街上窮民啼飢號寒的聲浪，心中的苦樂，總不同罷。

須知人類的欲望原有兩種：一是使用欲，一是支配欲。飢而思食，渴而思飲，寒而思衣等等，都是使用欲。日常生活，由簡樸以至於奢侈，程度雖有等等不同，都在使用欲的範圍內。不惟不應該令他缺乏，且應該令他適當而充滿。如果不能適當而充滿，便是社會的缺乏，應該想法子來補救的。至於支配欲呢，却是超出於使用欲之上的。專想以自己的權力支配他人，這種支配欲，却是人類衝突之根源，不可以不限制的。例如古人往往說「富有四海」，或「富有天下」。試想想，合四海天下之富，以為已有，自己那裏用得這許多。可見不由於使用之需要，而由於支配之野心了。邵先生說過，美國的汽車大王科特，每年應納政府所得稅五百萬元，他每年的收入，其數可以類推。他要這些錢作何用呢，他一個人，連他一家子，終身使用，也使用不了這些錢。然則他所以要這些錢，不是為他的需要，不過為博得一個大王

的頭銜罷了。這和古代帝王思想的人，殺了無數的人命，做成皇帝，然後說一句「我今然後知皇帝之貴」，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明白了支配欲與人生幸福無關，其與人生幸福有關的，惟有使用欲。社會主義的實行；正所以供給人類使用欲之需要，使其得以適當而充滿。至於支配欲，却是社會主義所限制的。大約稍有良心的人，也決不至於有這些野心罷。然則實業家又何所失望於社會主義呢。況且民生主義，與所謂社會主義系統條理，還有許多的不同。如剛纔所說過的，民生主義實行，我們中國人，一方面能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不容其侵入。一方面能使國內人民，共同生產，共同享受，使用欲各得適當而充滿。這真是太平世界，人人得所。無論誰人，必然都歡欣鼓舞以求其實現的。

以上所述，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除了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沒有第二樣，我們總可以相信。如今所要討論的，是怎樣的來實行這些救濟方法。

我們第一要知道的，這些救濟方法，必須是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方纔能當起實行的責任。如果國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如何能為全民的利益着想。全民的

利益，又如何能寄託於他的手裏呢。所以人民如果要握着經濟權，先要握着政治權。二十世紀之政治運動，無非藉以取得經濟權，從而保障已取得之經濟權便了，這可說是天經地義，不消多說了。

於是我們第二要知道的，人民如何纔能取得政治權呢。辛亥之役，推倒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和二百六十餘年之滿洲壓制，人民總可以取得政治權了。誰知却被一般北洋軍閥，一把奪了過去，於是人民不得不向北洋軍閥來收回。論起北洋軍閥，他的地位和力量，如何比得上有四千餘年歷史之專制君主，和有二百六十餘年歷史之滿洲呢。只是他的背後，却有外國帝國主義存在。人民要將他推倒，外國帝國主義却要將他扶住。人民一連將他推倒了幾次，外國帝國主義一連將他扶起了幾次。有癸丑的討袁，便有各國大借款來扶住袁世凱。有丁巳的護法，便有日本大借款來扶住北洋派。有癸亥的反直運動，便有各種巧立名目的借款來扶住曹吳。這些都是公然的事實，無論怎樣不能掩飾的。這般軍閥，恃着有外國帝國主義，在他背後，就把什麼公理和民意，都不放在眼裏，一味的殃民，無所不至。鬧了十三年

，人民還沒奈何他。究竟那些外國帝國主義，以何原因，和這班軍閥，如此的要好呢。是不是這班軍閥的外交方法好呢。是不是這班軍閥的內政方法好呢。哈哈，這些話，只怕軍閥自己也不好意思承受。然則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如果不把最近百數十年來世界歷史看得清楚，再也不得明白，如今邵先生廖先生，已經清清楚楚講了出來。外國帝國主義，既然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以便掠奪原料，銷售商品。假使一旦中國把政治現狀改造一番，跟着經濟現狀也改造一番，那麼，中國便有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侵入的力量，他們意中的殖民地，便平空的翻了過去，和他做對等的強國了。你想他們願意不願意，着急不着急呢。所以他們逼住想出了一條毒計，在中國抓些軍閥，來做傀儡，利用他去對付民黨，壓迫國民，使中國革命事業，中途停頓，政治問題，沒得解決，經濟問題，沒得解決，然後他們方纔可以把心放下。一面扭扭捏捏的說，「中國的內亂，使各國商務，受其影響，損失不少」，他們誠然不願中國內亂，因為內亂是反抗軍閥的運動。他們最希望的，是連這些運動都沒有，全國人民一味的昏昏沉沉，由他擺布，這纔最他們惟一情願呵。舉一件最近

的事來說，舊年曹錕想做總統，便將金錢收買議員，來做豬仔。一時烏煙瘴氣的，惹得人人笑罵，有人說道，「曹錕這樣胡鬧，恐怕各國不能承認罷。我們聽見，幾乎忍笑不住，說道，『越發胡鬧，各國越承認得快』。果然曹錕就職，各國便一致的承認了。有好些人，還莫名其妙，只有顧維鈞，最爲伶俐。人只道，『顧維鈞做了外交總長，替曹錕幫忙，所以各國承認得快』。却不知道『顧維鈞善窺風色，知道各國承認，所以趕快幫忙』。這樣顛倒的見解，不知阻遲了中國幾多進步，真是可歎。我們綜合了種種事實，敢決然說道，不抵抗外國帝國主義，是不能推倒軍閥的。一個軍閥推倒了去，又一個軍閥扶起了來，還如沒有推倒一樣。有人說道，「抵抗外國帝國主義，談何容易呢」。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這只看我們國民的決心和團結力，至怎樣的程度便了。

以上所說，頭緒雖繁，賅括起來，不過幾句。第一步是推倒軍閥，抵抗外國帝國主義。第二步是，建設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實行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便是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

在各級黨部代表大會之軍政報告

——十四年十二月七日第八次總理紀念週——

(一)軍事方面 全省軍事快要結束，頂大的問題是散兵和土匪的問題，解決此問題在政府與人民合作。

(二)財政方面 十二月份已有了預算，是向來所沒有的。

(三)北方情形 北京爆發發生革命運動。全國同志要加倍努力，使北京發生更好的變化。

前星期因兄弟有事不能到會，沒有做政治報告。今天的政治報告，是合兩星期來報告的。現在先說軍事。這兩星期的軍事報告，很為簡單。在南路方面，則高州，雷州，靈山，合浦等處均已克復，大約遲數天欽廉方面可以完全克復，再從事於進攻瓊岸的工作。東征方面，則敵人已逃入福建，劉志陸李易標洪兆麟等殘兵又竄入江西，現在我們正想方法和江西交涉。如果江西肯負責把這些殘敵驅去，我們則

不進兵江西。如果江西方面不肯負責驅去，則我們必進兵江西。就現在軍事上情形來看，現在不在注重於軍事，而在於軍事收束以後，我們要怎樣才能使廣東全省真正治安。現在最足爲廣東治安障礙者，爲散兵與土匪。那些散兵可分爲二種，有一種是洪兆麟林虎的散兵，這些散兵都屬湖南欽廉方面的人，他們打敗了，便想逃去福建江西的邊地。有一種是東江的人，他對於東江的情形言語都很熟悉，這一種的散兵，他們打敗後，不想逃去福建江西等地力，他們在兵力不及的地力便集合起來。這些散兵。雖然不能和軍隊對敵，但他很足爲地方之患。如沙魚涌和淡水之滋擾，便是這些散兵之惡果。這些散兵，不把他消滅，是很足爲後患的。所以政治委員會有一個決議，令東征總指揮於一個月之內將東莞博羅淡水凡東江一帶散兵所屬集的地方完全肅清，蔣總指揮已有報告，謂這件事一個月內可以完全做到，現在有一件比較散兵更重要的，便是土匪，前者南路朱總指揮曾有電謂，南路敵人的主力已打破，今後所願慮者在南路各地之土匪。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把土匪根本消滅，廣東的治安一日未可樂觀。我們還記得民國十一年粵軍攻打廣西的時候，廣西的兵變

成散兵，與土匪聯合起來，在粵軍少的地方，那些散兵便來，粵軍多的地方便避去，及到大兵到時，那裏散兵又逃去別處，粵軍便把廣西的人民搜查，因此廣西的人民和粵軍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勢。粵軍之平桂，遂沒有甚麼價值。即民國十二年桂軍來粵的時候，便用了這個搜查的方法來對待廣東人，我們現在可以說。以前粵軍在桂之失敗，係粵軍不能和廣西人民合作，我們前此已得着這種教訓。現在對於東江南路之人民，應與之合作，免墮前此粵軍之覆轍。因為軍人和人民合作，人民才不包庇土匪，土匪才易於肅清。專靠軍隊和警察的力量，是不能肅清土匪的。我們要與人民合作，為人民謀幸福，則人民才不包庇土匪，土匪才不能藉人民之包庇而漏網。同時我們想清除土匪，更要開發實業，使人民得生活上之安樂，才能絕土匪之根源。前星期中央黨部函請政治委員會省黨部開聯席會議，發起組織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大會，請省內學生會，農民協會，商會，工會等共同組織。第一步注重於宣傳，使全省人民共同注意，共同担起這個除盜安民的大責，一方面使政治委員會注意於全省人民經濟狀況之調查，討論怎樣才可以使人民的生活不受困的方法。更使

軍事委員會擬定方法，要怎樣才可以把土匪清除。這個委員會的章程，現在將起好。關於政治方面，現在要報告的便是財政問題。關於財政問題，現在我們可以稍爲告慰，因十二月份財政的支出。已有了預算。這件事是向來未曾做過的。最近財政之困，由于東南路軍費之負擔，和罷工後釐廠之收入減少。但現在已有了十二月的預算，財政上之籌劃已比以前容易得多。現在照十二月的預算來看，收入與支出相比較尚差四十七萬。以後我們更要設法去籌劃。譬如在軍事方面，第一是要軍費充足，現在因爲財政拮据之故，前敵的軍隊還未能做到真正完善的訓練。雖然如此，若比較從前就好多了。就廣東大學說來，因爲十二月份的支出已有預算，廣大的經費亦已比十一月以前不同。所以就財政方面來說，可算已稍能令我們告慰。第三說到關於全國的事情。最近郭松齡之反奉，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我們因此已足見軍閥不能立足。當前此奉張入關的時候，我們總理叫他軍隊要與人民合作，他置之不信。總理又叫他軍隊不能和帝國主義者合作，他又不信。他入關後，把奉軍的兵力伸張至上海，我們早已決定奉張之必敗，現在奉張可以決定其必倒。吳佩孚亦

可決其不能復起。我們現要注意的。便是郭松齡孫傳芳等之如何做去。至於國民軍現在已明明白白表明態度與奉張作對。已明明白白保護北京的市民去作革命的運動。現在段祺瑞不能壓迫北京的市民，市民已得恢復自由，大約兩星期內，北京方面或者會有更好的變化。但其中有一件事是很令我們痛心的，據北京執行部報告，在北京同志如丁惟汾于樹德等同志，對於北京市民之運動，很是努力，但鄒魯在北京則極力反對。主張與段妥協，使北京市民對於雙方意見之紛歧，很是懷疑，不能明白真相。鄒魯這種行動，和今年五六月間對於楊劉一樣。今年五六月間胡漢民廖仲愷兩同志已決定要把楊劉掃除，鄒魯則謂要把他保存，這樣行動是前後一樣的。這是我們很可痛心的一件事。但我們知道學生運動，不是幾個人所做出來的，他們已大多數感受革命的空氣，故起來向段祺瑞下熱烈的反對。北京學生在段祺瑞壓迫之下，能夠做出這樣革命的運動，我們反轉來看，廣東的學生現在究竟怎樣呢？現在廣東的學生，有許多還令我們不能明白的，前星期兄弟到廣去演講政府對於調查廣大之原因，廣大的學生經這一番解釋，已大多數了解，我覺得廣大學生很為

可愛。對於北京方面，我們還不能太過樂觀，我們望北京和各地的同志加倍努力，使北京發生更好的變化。現在段祺瑞在北京已失所憑依，張作霖的勢力也不能支配到北京。如果我們總理還存在，來指導我們去奮鬥，我相信本黨在北京方面，一定能夠發生更大的力量。但現在總理死了，我們要加倍去努力。

黨員被敵人誘惑問題

——在中央黨部總理逝世周年紀念演說——

各位同志：去年今天的九時三十分，就是我們總理在北京丟了我們去世的時候。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有遺囑告訴我們，叫我們怎樣去努力。兄弟今天要報告的應該就把遺囑的經過說一說，但是兄弟已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有很詳細的報告，想來大家都已看見過，不用我再說的了。所以兄弟現在所報告的是一段關於遺囑簽字以前的一段總理和我們談話的筆記，其時孫科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都在場，但因為總理沒有簽字，所以沒有算總理遺囑的一部份。

當二月二十日下午四點二十分的時候，我們到總理臥榻的前面，兄弟和孫哲生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同在。總理看見了我們就問：「你們有甚麼話呢？」汪精衛說：「我們從總理病起，一直到現在，幫助着總理的病好，不過許多醫生勸我們要在總理平安的時候說幾句話，但是這幾句話不一定在二三年以後以至幾十年後才用得到

，不過我們總想得到總理吩咐幾句話」。總理就停了一停說：「不用的，果如我的病好了，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汪精衛說：「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好了之後，也一定要有一年或再較長時間的休養，所以總理吩咐我們幾句話是必要的，使我們更加奮勇去做總理的工作」。總理於是點頭說：「好！你們要我說甚麼說話」？汪精衛說：「就是平常的話可以了」。總理點頭贊許。汪精衛說：「我把總理平常所說的記下來結總理看好不好」？總理又點頭贊成。於是就拿記下的給總理看。總理說：「好，不過這樣於你們很危險的；因為政治的敵人正在誘惑你們，如果你們這樣的堅決，這是不好的，與你們有危險的」。汪精衛說：「決不會的，我們同志一定不受誘惑的」。總理點首贊成。這一段談話的筆記是在汪精衛記下，證明者孫科，宋子文，孔庸之，後來胡漢民派代表鄒魯到了北京，也簽了一個字。

同志們：我們知道總理爲什麼說我們有危險呢？爲什麼說政治的敵人等他死了之後要誘惑我們呢？是不是他不信任同志？是不是對我們同志姑息？不是的！革命是不怕死的。革命黨要有堅決的態度！所以總理不是不信任我們，是總理已清清

楚楚看明白他死了之後，一定有同志受誘惑，一定有政治的敵人來施誘惑。不然，總理何必如此說法呢？果然！不到總理死後二三天，就是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以後，十五日段祺瑞下令封北京民國日報，把經理人拿了獄裏去。不但如此，段祺瑞又不許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同時派出安福黨員收買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分子；另一方面再四出收買我們同志。第一個被收買的就是馮自由，第二個就是馬君武，第三個就是鄧家彥。他們收買這些人來放在安福系之下，成立了所謂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這豈不是總理已看見了同志要受誘惑嗎？那時候，同志們因為黨務前途的關係，就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正在開會時，馮自由受段祺瑞的命來搗亂。他一推進門，硬要與聞。硬要在簽到簿上簽字，不允許他，他硬着不走，甚至叫警察來拖他出去，他反而對警察說：『你們聽那一個人的命令呢？』這豈不是總理已看見政治的敵人來誘惑我們同志嗎？一直到去年，他們還在那里繼續開西山會議的反動行爲。雖然參與西山會議的人，不一定是已誘惑了的，但行爲已和誘惑了的一樣，其外明明白白是受了敵人的誘惑。現在鄒魯已領了庚子賠款到上海運動民國日

報，目下又到香港來和胡毅生等商量搗亂的方法，他們一方面津貼工商日報，一方面又想收買大光報等許多報館，不被他們收買的，就用種種方法來運動主筆，他們把在北京分贓得來的錢來謀反總理所遺下的事業。這兩天市面上已發見假冒第四軍名義來指摘蔣介石同志，現在已被李軍長查出，是挑撥離間的手段。同時我們又發見胡毅生的告海內外同志書不啻是收買機關的表現，其中指摘兄弟的地方還不要緊，但他還說去年八月二十日的事是糾察隊保護他出去的話，真是荒謬絕倫。鄒魯是代表胡漢民同志來北京參加葬事的，但是現在拚命的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怪不得總理要說這幾句話。總理實在已看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自然總理死後，本黨就分了二部份的人：一部份的人就是被政治的敵人所誘惑而投降，一部份的人就堅持革命，擁護總理的主義，繼續與政治的敵人奮鬥。

所謂政治的敵人，究竟是誰呢？其時總理說了那句話之後，有許多同志解釋。吳稚暉先生說是段祺瑞，但我們不承認，因為自從袁世凱以至段祺瑞，都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段祺瑞一個人實在配不上說他的。戴季陶同志說指英國，但也沒有這

樣簡單，如果總理的話單純地指一方面的，則總理何必這樣的擔心。但是我們當時不敢多問他所指的敵人是誰，因為他很辛苦，說一句話很難。不過我們不必去曲解他，因為遺囑上明明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是帝國主義。所以凡是有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的都是我們國民黨的敵人。這個解釋是很正當的。所以我們只要一讀遺囑，就知道總理的所謂敵人，是不單指段祺瑞和英國，凡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附庸之軍閥走狗，都是政治的敵人。固然我們不怕敵人，因為革命黨本來要去和敵人打仗；但是我們也不怕不覺悟的人民，因為人民不覺悟固不知國民革命的重要，如其人民覺悟了，就知道國民革命的重要，所以我們不怕不覺悟的人民，我們可以努力去喚起不覺悟的人民。所可怕的既不在政治上的敵人和不覺悟的民衆，乃是在於受敵人誘惑軟化的同志。不然，去年平定東江肅清劉楊後，本可以出兵解決南路，但為什麼七月國民政府成立後會鬧出亂子來呢？為甚麼八月二十日會死了廖仲愷同志呢？為什麼會再征東江，廢了好多的時，才把鄧本殷趕走了呢？可知一切受敵人誘惑的不剷除，我們就

沒有方法出去。所以我們不怕敵人，也不怕不覺悟的民衆，只擔心同志們受敵人的誘惑軟化。他們——鄒魯等聽了總理的演說不動心，聽了總理臨終時那種婉轉的呼聲不能動他們「惻隱之心」，反而曲解求全，受敵人的誘惑，這才是可慮的，這才是可恥的。然而這些落伍者雖然以總理之偉大而不能動他的心，但決不能阻止國民革命，決不能阻止總理的精神。看當總理靈柩進中央公園時，有三十萬民衆來參加追悼，這豈不是不但不能阻止革命的精神，而總理的精神已確是喚起了民衆嗎？一直到五卅，六月念三等上海沙面青島漢口各慘案發生，民衆已一齊起來想實現總理的精神。再看去年歲暮北京的民衆何等熱烈。這豈不是總理的精神喚起了民衆嗎？所以遺囑上說：『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蘇俄是。他們以全力幫助我們革命，共同在革命的路上走。一年來同志們繼續總理的工作，掃除了一部分被誘惑的走狗。同志們有的在戰場爲主義而犧牲了生命，現在生存的應如何努力。更進一步聯合政治上社會上各種工農商各界來共同進行，以誘惑爲可恥，以危險爲精神上最後之安樂，使各界一齊革命化，

團體化，聚集在一起，才能實現總理的精神，才能對總理的靈前說：「我們沒有被誘惑」。我們掃除一切誘惑的人們，我們把總理四十年的革命工作繼續起來！

兩廣統一運動的經過

——十五年二月一日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

關於一週間的政治，因為兄弟到了廣西梧州去，一直到星期六才回來，所以只能在下次報告。現在能報告的，就是兄弟到梧州去的經過。

我們爲什麼要到梧州去呢？在去年年底，政治委員會已決定要派人去廣西；其原因有二：第一是因為去年用兵南路的時候，廣西的李宗仁，黃紹雄兩同志曾參加作戰；在單水口一役甚爲出力，因為兩省的軍隊很能共同動作，所以才得着勝利的結果。但我們不願只有軍事上的共同點，而沒有政治上的共同點，爲謀兩廣政治統一起見，所以要去切實商量一番。第二是因為黨務的問題，爲謀兩省黨務關係的密切，亦決心想把本黨對內對外的各種政策，去詳細的說明一下；使民衆更瞭明瞭本黨的精神。去年年底因爲要預備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不能即離省前往。但因爲此事是早已決定了的，也早已通知了他們，所以李宗仁黃紹雄兩同志，已預備從

南甯到梧州來。我們原來預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月十五日可以完畢的，他們也就於十七日從南甯起程，二十日到了梧州，但第二次代表大會竟於二十日才完了，後來，又接着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開會，又耽擱了數日，直到二十四日才由兄弟和譚延闓甘乃光兩同志到梧州去。我們在路上就擱了二天，在梧州住了三天。在這三天內，盡量的說明：（一）接受遺囑的經過，（二）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定的政治軍事種種方針，（三）兩廣要怎樣結合起來，共同努力國民革命的工作。我們雖是只有二三天功夫，不能詳細觀察一切，但大體上看來，廣西梧州的情形是進步了的。這種進步有二方面可以說：第一是關於民衆的。我們看見梧州的民衆已與從前不同。在民國十一年六月粵軍占着梧州的時候，兄弟去過一次；在那年十月總理北伐經過梧州的時候，兄弟又曾去過一次。但那時候並沒有看見民衆的組織和民衆的動作。這一次我們確看見了不少的民衆，而且這些民衆都拿了革命的旗幟呼着革命的口號。在我們到了梧州的第一天，梧州各界在東岳堂地方，開一個大會，到的民衆有三五萬人。軍隊也到，農人，工人，學生也到。雖然學生比較的少些，但那

時候梧州學校已經放假了。梧州的人口本不甚多，現在竟到了三五萬人，可見梧州民衆已經經過一番宣傳和組織知道起來參加革命的運動了。開過大會之後，又有農工的會，到的人數比較的少。梧州的工人本不甚多，且多係手工業者。至於農人，梧州本地也不多，附近一帶較多。梧州已有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人也已開始組織工會。農工羣衆已得着聯合和團結的機會了。

至於黨務：梧州的同志很能努力，街道上的標語也有，宣傳的印刷品也常見。黨員的行動也很好，我們到了梧州的第二天，上午到宣傳養成所去演說，下午到黨員大會去演說。在上午的一個會裏頭，也有許多民衆參加；我們也當然歡迎他們。下午的一個會裏，比較說的詳細一些，因為對於本黨自己的人不能不詳細講解一切，到了第三天就是我們末後要走的一天，還舉行中山紀念堂內奠基禮。紀念堂是建築在山上的，因為那邊都是山地。但他們已仿意大利的方式，築成了許多公路，把許多平民搬到那裏去住。在山頂上有一片很廣大的平地，這裏就作為建築中山紀念堂之用。那一天舉行奠基禮的時候，李黃二同志親自來舉行儀式，到的人很多，差

不多比較前月各界大會的人更多。山的四圍一望都是民衆，可見梧州的民衆已認識了黨的精神了。自然梧州的黨與民衆運動還有許多缺點，不過這些缺點在廣州也是有的，不能獨責梧州。我大體上說來，梧州的情形已與從前不同，且已有了覺悟，這是可以樂觀的。

至於政治及軍事的情形，廣西的軍事，李黃二同志實際已可以統一合作。他們初時隊伍很少，直到驅除了土匪式的軍隊以後，才得到相當的發展。敵人的勢力如陸榮廷等是已沒有的了；沈鴻英也已逃到了廣西與貴州的邊界去了。殘兵只有五六百人，決不能再作惡的了。即其他反動的軍隊，也已一律掃除。這一層，已有可樂觀的地方。我們要知道爲什麼他們能夠這樣呢，這是因爲他們用了軍官學生的緣故。廣西自陸榮廷專用土匪盜賊帶領軍隊，人民吃虧不少。到現在纔由李黃二同志把軍官學生來做軍隊的中心，盡力整頓軍隊，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廣西的軍隊，將來一定能逐漸力求進步的。

政治方面差不多和廣東一樣的情形。因爲兩廣地方都是於去年才開始打掃平定

的。廣西去年先趕走了唐繼堯，後來又打滅了唐繼禹。現在喘息初定，所以政治上許多事還沒有着手進行。但公平考慮起來，現在實在已進步許多了。

廣西的當局，和民衆運動既有如此的進步，而且很有發展的可能，那便是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地方：

第一使兩省同在本黨指揮之下做革命的工作。

第二使兩省整個的聯合起來，團結在一起，一致的應付中國大局。

第三使兩省共同肅清土匪，以求兩省人民的安樂。

關於這三點，我們已有大體的計畫，等廣西派人來後再詳細的商量一切。這一次，從梧州回來之後，李宗仁黃紹雄要回南甯，白崇禧同志就要派來廣州，現在在大體上，兩廣統一已得有辦法，將來一定有更進一步的解決。

以上共三天內經過的大略情形。我們綜合報告了軍事，政治，黨務三方面的事。我們看了我們的環境，知道我們這時不可專唱高調，要切近事實去做。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好在李宗仁黃紹雄二同志已可以把廣西統一，只要廣西的同志在宣傳

民衆與組織民衆上更努力些，則黨務與軍事政治不難更發生密切的關係。黨務政治軍事三方面能夠一致進行，那就說不定廣西會弄得很好的了。

至於中山紀念堂的事，我們很覺得慚愧。因為廣州在去年已決定建築中山紀念堂，到現在還沒有成功。梧州却已動手起來了，大概梧州的紀念堂在半年內可以完工。這可以促廣州的同志，更努力進行。現在廣州缺乏廣大的場所來開會，這個工作實在是必要的。

以上是去梧州幾天的大概情形。本來我們還打算到各處去看看，但因為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在廣州要做，所以就在星期五動身，星期六回到了廣州。今天兄弟的報告就止於此。

國民政府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這裏開國民政府特別黨部的成立大會，論起這個特別黨部，原來是由大本營來的。不過從本年七月一號起，國民政府才成立，一路又因為國家多故，直至今天才有這個黨部的正式成立。有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選出。單就這點來看，我們對於黨的前途，實在是很有希望，我們想到這個國民政府的來由，大家都知道是由大本營改組而來，當日的大本營，是由我們的總理孫先生親自統率的。現在孫先生雖然不在，但是我們現在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不論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衛士，大都是跟孫先生，為國民革命奮鬥多年的同志，其中還有些新的同志，也是因為想竟孫先生生平未竟之志，入國民政府服務的。故此兄弟今天對於座中各位同志，更加有特別感情，我們很是不幸，在半途上失了我們的總理，這在全國的民衆，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在中國國民黨的同志，也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但尤其比較別人加倍的痛惜的，可說是國民政府的同人！本府中的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大

多數都是和孫總理日夕親近的，各位衛士都曾爲總理出過死力，自從在觀音山捍衛總統府，一直到總理去世，都不曾離開過總理的，故此今日凡在這裏服務的同志，於大家悲痛之中，便自然地生出一種互相親愛的感情，如果大家都一致團結，把國家的事情努力，弄個妥當，那末，我們才可以對得住總理。否則我們大家都不爭氣，把總理的遺囑置之腦後，那就總理雖死也不能瞑目了！這一點我們在黨部的各種聚會，常常生出這個感觸，但在今天却感觸更深，我們試想想大本營爲什麼要改組國民政府呢？因爲總理已經死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實在是當然的，這一層原本不必等到七月一日，已經知道的了。也不必等到三月十二總理逝世之後，就已經知道的了。當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初間，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訂黨章時候，我們就老早已經知道，如果一旦總理死後，黨政府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會再有第二位總理的。這在黨章上寫得很爲清楚，大家是可以見得的，黨章上面并不說是『本黨設總理一人』，是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本黨除孫先生之外，是不會有第二個總理的了。如果孫先生之

外，還有總理，那末，黨章內應該說「本黨設總理一人」才是，爲什麼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呢」？在這一條黨章上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本黨所以有總理的緣故，是因爲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導師。自從興中會，而同盟會，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四十年來，都沒有過別一個人做首領的。所以他實是本黨一個天然的歷史的總理，如今孫先生不幸死了！那末在黨便不會再有總理。在黨政府，便不會再有元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事情，國民政府是受黨的委託的，黨的組織，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的組織，也自然同樣是採用委員制，是毫無疑義的，當着孫先生未死，我們可以一意跟着這個唯一的道師。孫先生既死，我們採用委員制，要使各人都盡其所能，以共同負荷總理所交付的責任，繼續國民革命未竟的工作，這就是國民政府所以成立的原因。

因此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是十分哀痛，一方面却是十分勇敢，所以哀痛的是孫先生既死，從今再沒有這樣偉大的總理做同志的導師，再沒有這樣英明的元首做國民的領袖了！所以勇敢的，是總理既把他四十年未了的巨大工作，交

付給同志，同志如果連一點勇氣也沒有，那末黨也可以從此消滅，國民革命也可以從此停止進行了，試問我們各位同志，是否願意看見國民革命的事業，就要跟着總理一同死去？如果不然，便應當振作起我們的勇氣，去擔負各項的工作，這是無可逃的責任啊！

自本年三月十二總理逝世，許多敵人以為中國國民黨也將要同歸於盡，不知總理生前對於這一着，是老早看見老早曉得的了。總理在十三年時自己已知道不能夠久在世上，這也並不是因為總理的精神體魄已經支持不來，實在因為近年來所受軍事上的苦痛，在在足以危險到總理的生命。座中同志許多是前日大本營的文武官吏，大家總見得總理這兩年來，近則受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的掣肘，遠則受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如何的可痛？老實地說，如果當十二年時總理一旦死去，中國國民黨或會一蹶不起也未可料，為什麼呢？因為那時新的分子既一些不曾加入，舊的分子又日趨於腐化，就軍隊來看，真實忠心於主義，忠心於總理的，都受驕兵悍將的壓迫，一點力量都沒有。那時的軍隊，那些是能夠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呢

，當時正恰有人謠傳總理逝世。如果謠傳果變成實事，那黨的前途，縱然未必就死，恐怕也不是今日樣子了。

總理自從聽過這回謠言之後，所以在百忙之中，也要抽點時間，把他一生創造的三民主義講演出來，又把二十五條建國大綱，親手寫成，好叫後死的同志有所遵依。直到今年春間，他病將不起，更清清楚楚的在遺囑上把他生前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列舉在遺囑上面。其中建國方略，是民十以前做成的，建國大綱，是民國十三年寫成的，三民主義是他一面講演，一面叫同志筆述，再經他自己親自校勘過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則是他親自提出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這些實在通通是總理的遺囑，並不是從本年三月十一才寫起來的啊。既然有了這幾種重要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的精神却還存在，他到如今仍然可以做我們的指導，我們固然知道現在黨的生命，和黨軍的成立，國民黨之改組，都有極大的關係，但是比較這兩事還更重要的，實是在乎孫總理給我們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幾件

重要的著作既經完成，總理覺得他自己縱然不幸死去，也可以放心了，他的精神，他的主義，他的革命方略，都可以交給同志去繼承。那末，黨就可以不死了。有什麼憑據證明黨是不死，當本年三月總理尚在病中，黨軍肅清東江的戰績，已經傳到總理的耳中，這是一事。到本年六月譚組庵朱益之許崇智蔣介石諸同志，又把幾年所痛心疾首的揚希閩劉震寰一起掃除，這又是一事。這就是剛才所說的一方哀痛，與一方勇敢，如果沒有總理的各種遺教，也沒有同志去接受總理的遺教，這樣孫總理才真是死了，黨也真是隨着總理一同死了！現在幸而還有這一幫忠誠的同志，願意拿他的勇氣去擔負艱巨的工作，拿少數窮困的軍隊，居然肅清東江的陳軍，掃滅廣州的劉揚，使國民政府能夠成立。實都是一種勇敢的精神！

可是我們一面拚着命去做革命的工作，一面許多人却有點懷疑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拿不妥協的態度，解散了許多軍隊，得罪了許多黨人，因之許多人以為我們是太過鹵莽滅裂，但我們平心靜氣想想，我們究竟是否鹵莽滅裂，我們的不妥協是從勇敢來的，勇敢是從哀痛來的。現在總理已死，我們總不想把總理的遺囑，成為空

文，我們總是想方法去實現遺囑上所交付的工作。那末，我們便不能不努力去奮鬥，求衝破這個惡劣的環境了。就拿十月三日我們把熊克武軍隊處分，這一件事來說，這是我們最近的不妥協的動作，因此便引起許多外面的同志，把我們詈罵，也許在廣州的同志，也一樣的詈罵，亦未可定。但是兄弟請各位同志試想想，前幾天的情形如何，就可以了然了，如果熊克武的軍隊還在北江，我們現在能夠調兵去肅清南路嗎？前幾天南路軍事最緊急的時候，陳銘樞師長僅以三千餘衆，抵過萬的敵人，幾乎給敵人圍困住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師既要衛戍廣州，不能調動，除掉第二三軍還有誰可以去援救他。但設使熊克武的部下，還在連縣，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夠調動呢？當然熊克武來到廣州時，我們已經查得他一方密電，他的所部由連縣開到含洸，一面由但懋辛駐港和陳炯明相互拉攏。幸而第二三軍能夠趕快把川軍解決，到前幾天，譚組庵同志所部可以星夜趕到江門，朱益之同志所部可以星夜趕到鶴山，南路的軍事，至此才可以勝利。設使處置川軍略慢一點，恐怕現在的熊克武，已經蟠踞着廣州，要說什麼武裝調停，招請陳炯明來省議和了！所以我們的不妥協是

勇敢，不是鹵莽，而這種勇敢，却又是從很深的哀痛中生出來的，我們既自承是孫先生的信徒，那末無論什麼困難的事，我們都敢去做的；國民政府所以存在，也全在這一點勇敢的精神了。目下我們一方要和驕兵悍將打仗，一方又要和貪官污吏打仗，和驕兵悍將打仗，固然要拚命，但和貪官污吏打仗也一樣要拚命的，你拿他一個貪官污吏，他就有許多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重重包圍着你，不許他動彈；我們如果不是根據哀痛中的勇敢，更如何能夠衝破這種惡劣的環境？生出新的生命來

我們幹天下事情，總不外是理性和情感，我們沒情感便不必言仁愛；但我們沒有理性以節制情感，也將變成情面的動物，國事就要敗在我們的手上，總理的遺囑，更無法可以實行了。

今天在這裏開黨部成立大會，離總理的死還不到一年，回想前事，自然在無限哀痛、可是我們大家也要在哀痛之中，生出勇敢，拿起十二分精神把總理遺囑去實現。那末，我們才可以不負總理，現在有些人受了北京政府的蒙養，和安福系指的使，竟造謠言說這遺囑是假的，當時孫先生家人和許多同志，都在場看見清清楚楚

的簽字作證，假從何來？這本不必多辨；但這些人爲什麼要說總理遺囑是假的呢？因爲有這遺囑，然後總理雖死而精神還在，就是總理的說話到現在還有效力，那些本黨的敵人，平日想殺害總理，想沒有中國國民黨去做革命的工作的，到現在他們所希望的已成妄想，就要造出這一條中傷中國國民黨的毒計來，但是敵人縱然用盡他們的詭謀，到底是沒有法子能夠把孫先生的精神弄死的。

座中各位同志，現在一塊辦事，大家都是跟從孫先生多年的。彼此實像兄弟一樣，這個國民政府原不是直接做事的，不像省政府和市政府都各有他的直接處理的本務，國民政府的工作，是在乎通盤的計劃，接受本黨最高的指導。如果大家團結，本着哀痛中的勇敢，恪守着總理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仍然可以常在我們的面前，領導着我們去革命。這就是本黨的元氣，但使這點元氣能夠繼續保持，我們便不枉與大元帥共事一場。

今天在此演說，兄弟實在感觸着無限的哀痛，因爲我們的總理，已經不在！

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典禮訓話（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

各位同志：軍事委員會議決把陸軍軍官學校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今天是成立的日子，所以我把這個原因宣佈出來。

本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的時候，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那時候爲什麼要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爲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揚希閔劉震寰……等，他們各有各的目的，並沒有依照大元帥的計劃去做。大元帥是努力于國民革命工作，而統率中國國民黨黨員同帝國主義和軍閥奮鬥的，一見這種軍隊，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時候就決定創設這個學校，純粹本着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去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裏養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的下級幹部，然後再來組織黨軍。

十三年五月五號，那天學校成立，總理有一篇很沉痛的訓話，今天在座各位同志有聽過的，有沒有聽過的。我記得那句話說是：「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國民黨能

夠得到這一個新生命……我們要打破困難的環境，我們要歡迎一個「死」字……」

當時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現在的蔣校長和廖前黨代表，督同各教職員，天天拿總理的精神和國民黨的政策很努力的訓練學生。但是在那時候，同學訓練還沒有成功，東江的敵人已經到石龍來了。我們一方面而訓練學生；一方面又要趕快整備同敵人打仗，因此，就先成立了教導團。出發東江，不上兩月，把陳炯明洪兆麟林虎……等一般反動軍隊通通撲滅了，這是十四年三月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始終不肯聽本黨命令和總理教訓的楊劉……諸逆，他們看見陸軍軍官學校在最短期間有這樣好的成績，知道他們的末路到了，所以決心要勾結北洋軍閥做反革命的工作。

我們知道：當時繼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而創辦軍校的，有第二軍譚軍長和第三軍朱軍長。譚軍長前年跟大元帥帶兵北伐，進了江西，後來雖然是失敗了，但是他並不因失敗而灰心！回到廣州，馬上就成立湘軍整理處，更進一步又創辦湘軍講武堂——第二軍軍官學校。朱軍長跟大元帥的歷史很久，也受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替本黨做了一個很大的工作。他想改良他的軍隊，後來也有第三軍軍官學校的組織

。現在第四軍第五軍和第六軍——攻鄂軍，都先後創辦同樣的軍校。因為各軍軍長個個有決心，想本着國民黨的政策和總理的精神以及參照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已有的成績來整飭自己的軍隊，去對付我們的敵人，因此才有去年六月陸軍軍官學校聯合各軍掃平楊劉的成績，掃平楊劉之後，才成立國民政府，才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

以後無論什麼軍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據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才能存在。我們看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和軍事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便可知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是在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實上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是國民黨的軍事部，所以無論什麼軍隊或軍校，總是國民黨的，都要本着黨的政策去做，無所謂特別的黨校，也就無所謂特別的黨軍。

各軍長大家注意改良軍隊，創辦軍官學校，並不是理想上如此，是事實上如此的。如果我們拿全盛來計劃，本來只有一個軍官學校便夠了，並用不着一軍成立一個軍官學校；因為各軍都是受國民黨的指導監督的。如果一軍有一個軍校，就含有

地方主義的彩色了。從前政府決議把湘滇粵等軍的名目，編爲第二三四軍，就是要打破地方主義！我們不僅是在名義上要如此；在實際上也應該要如此，不然，還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政府爲打破地方主義，爲集中人才起見，不能不統一軍事學校，因此當時本校的名稱擬叫做統一軍事政治學校。後來因爲國民黨向來用中央二字的名義，才改爲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各位知道：何以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合併在黃埔軍官學校，這個理由是：第一，黨立的學校是由這個學校開始，才有其他的軍事學校。第二，對於蔣校長的人格和他努力奮鬥的精神，本黨各位同志，都是極端的欽敬，所以我們拿蔣校長的人格來改組這個學校，同時并請蔣校長依然担任本校校長。

本來軍事委員會對於統一軍事學校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久，去年十二月就決定了那時候因爲蔣校長在汕頭担任東征總指揮的事情，非常重要，不能回來，所以等他回來了才實行。我們要知道，集中各省人才來訓練，比較分開去訓練，收效一定要大得多的。

現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佈成立了，我們知道，從前軍官學校已盡了種種責任，有很光榮的成績。現在更大的責任，放在我們教職員的肩上了！我們想起從前的這樣光榮的歷史，現在要怎麼樣繼續，怎麼樣發揚光大這個歷史！從前本校成立的時候，環境是怎麼樣？外面有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內面有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但是在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來壓迫我們，直接的還少，間接的却很多，就是拿東江的叛逆和南路的叛逆來壓迫我們。現在的環境又怎麼樣呢？已經把從前壓迫我們的勢力打破許多了，現在各同志所碰的艱難，不是帝國主義者和北洋軍閥間接來打我們，是直接來打我們了！我們想同帝國主義接觸，是不是可怕呢？我們如果聽過從前蔣校長的訓話，一定知道不是可怕的，並且是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好機會。從前是北洋軍閥來打我們的，現在是我們要去打他們了，從前是有不好的環境來壓迫我們，現在已經衝破幾層了。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後的任務，是要繼續從前陸軍軍官學校還沒有做完的任務去努力奮鬥！在短期間要統一中國！

我們要負起這個重大使命，一定要有兩方面的整備：一方面是精神的；一方

面是技術上的。在精神方面的，要常常記着總理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六個字。這六字是何等沉痛！總理做了四十年革命還沒有成功，我們要怎麼樣把牠成功：在技術方面的，我們的責任，既然一天一天的重大；我們的本領和學問也一天一天的要充實起來，才能夠完成我們的任務。陸軍軍官學校從前的技術還沒有精熟，學生學術科，還沒有弄得十分完備，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以後，我們曉得責任重大，就要加倍的努力，我們的精神才能貫徹，不然，還是等於無用。

精神上技術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如果一知半解，鹵莽從事，比較軍事上沒有弄好同敵人去打仗一樣的危險，所以同時要注重的。其次我們同志在這學校裏頭，要「虛心受善，實力改過」。「虛心受善，實力改過」這八個大字，我們要時時刻刻拿牠來自勉，不要忘記！今天是各位教職員就職的時候，兄弟以黨代表的資格希望各同志互相勉勵，同時更希望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能夠繼續從前的歷史努力奮鬥，發揚光大。

對第三期同學畢業訓話

民國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各位來賓，校長，各位教職員，各位學生！

今天是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覺得：陸軍軍官學校到現在已經第三期學生畢業了，算起來，時間很短的。自從民國十三年五月間，我們學校成立，那時我們的總理時常到來同我們學生講話。現在呢，總理不在了，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得不到總理的訓話了！還有廖黨代表，開辦我們的學校以後，天天同學生在一塊兒；現在第三期畢業時候，我們也看不見我們的廖黨代表在這里對學生說話了！我們想起來，實在難過；但是我們也有一點，可使總理安慰的地方，就是去年三月總理在北京病重的時候，已曉得軍官學校的學生已經成立教導團，已由廣州出發一直打到汕頭，把東江的叛逆陳炯明……趕出去了。總理已經聽着這個消息才過去的。廖黨代表呢，一直指導學生到去年八月二十日，看見軍官學校學生怎

麼樣去東江作戰，怎麼樣又回師廣州剿滅楊劉，如此說來，總理和廖黨代表是已經曉得國民革命軍已有了基礎而且有了進展才過去的，當可以少慰。還有自學校成立以來，許多同學在東江作戰身死的，在楊劉之役陣亡的，他們死的時候也曉得還有許來同學在那裏繼續他的生命，爲國民革命奮鬥到底，這也是能安慰他們的地方。我們學生到今天畢業了，但畢業以前，因爲廣州要發生戰事，我們許許多多學生把學業拋下，去擔任實際的勤務。這，我們反問一下，固然使我們很抱歉的，使得各同學不能完全做學問上的工夫，後來也不能怎樣補習。但一方面我們稍爲有點安慰，就是在勤務時候，大家能繼續先烈的精神，努力奮鬥；雖然學業荒廢了一點，却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這是第三期同學自己很可安慰的！

我想起，爲什麼要辦這個軍官學校？這裏頭，大家都明白，爲實行總理的主義，才有這個學校。我們實行總理主義，要有種種方法，我們可拿什麼方法去實行，拿什麼方法負起這個使命？只看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以來，一直到如今的歷史，便可明白。民國十三年那年，所有我們同學都有一個概念，就是已經看清楚我們的環境

，曉得軍官學校在這裏，四面的敵人都來包圍着我們，壓迫着我們。比方，帝國主義者香港政府，牠一曉得總理囑蔣校長創辦軍官學校，就十分注意到我們；第二，還有北洋軍閥，也十分注意這個學校；第三，南路的鄧本殷，東江的陳洪諸逆，也知道這事對牠很不利的；第四還有廣州的楊希閔劉震寰這一班人，也在那裏曉得這個學校的利害。這四種人都十分注意在這個學校，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用盡方法來破壞。那時候我們的同學，都明自家所處的地位，明白自家所負的使命，明白大家想去做革命工作，想實行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一定是有許多敵人包圍我們壓迫我們破壞我們。所以那時候，我們陸軍軍官學校裏，充分的實行「親愛精誠」的校訓，曉得非把大家意志合在一起不可。這就是大家明白了自己的環境，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曉得現在的敵人要在這塊妨害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擔負起革命的使命，來實行總理的主義與政策——那一點，同學非常親愛，對外非常一致。因為這樣子，所以去年二三月間，我們學生能夠得到相當的成功，竟打倒東江幾年來打不下的敵人。這一個成功從那裏來的？就是因為學生認識了自家的環境，擔負起自家的使

命，大家本着「親愛精誠」，團結一致，所以才有這個效果。在這一點，我們敢說已實行「親愛精誠」四字。

自從我們打東江，去了一點基礎之後，至去年六月，那情形又稍為不同，帝國主義進攻得越利害，六月廿三日那天，本校同學竟有許多死屍堆在沙基路上，更加證明帝國主義不容許我們實行革命。為什麼帝國主義要做出這件慘無人道的事情來呢？六月十二日我們才掃滅楊劉克復廣州，到六月廿三日他便做出這事情來，我們不要說是誤會，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給我們的示威，以為你們可以掃滅楊劉嗎？給個利害你們看：所以拿機關槍打死我們許多學生，來證明學生能不能夠反對帝國主義，這是六月廿三日我們學生死的一個重個大意義，也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比從前更加利害的表現。第二，北洋軍閥更來得利害，竟派了北洋軍艦三隻虎門，逼近黃埔，這是證明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不使我們做成革命工作。其次東江和南路的敵人，也是加倍利害，如東江的陳炯明……南路的鄧本殷，從湖南新來的熊克武，都是預備着再來破壞我們。楊劉雖然自失敗之後消聲匿跡，但廣州內部像楊劉這類的人

如魏邦平一般反革命派仍充滿省城，對我們更加來得兇猛狠毒，要做一次很大的示威，給我們一大打擊，證明他們有方法來破壞我們，摧殘我們，所以八月二十那天，就打死廖黨代表，這也是一個表示。這個表示，是反革命派證明還有力量破壞我們，把和蔣校長手創陸軍軍官學校的廖黨代表打死，證明他的力量。那時候，我們的環境是這樣子。在此環境之中，我們同學已經明白自己要負起國民革命的使命——實行總理主義的使命；我們認識了我們的敵人，看清楚我們的環境，結合一起。結合一起是怎麼樣？就是『親愛精誠』，我們同學大家親愛，聯合一致，所以能夠抵禦得住帝國主義到現在。

打平東江，同時打平南路，肅清一切反革命的勢力，這是什麼原因，何以能造成這樣成績？就是我們學生能遵守『親愛精誠』四字。去年下半年進攻東江的時候，我們已經得了廣東民衆熱烈的慰勞，現在又蒙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位慰勉，這是我們最大的光榮！但是我們要知道，各種壓迫，比從前更利害。敵人已經認識我們，帝國主義更用力量來壓迫我們。雖然廣東統一，東江南路沒有敵人，廣州的

反革命掃除乾淨；若是稍為不留心，他們死灰復燃，也很容易的。所以我們的責任還沒有完成，一定要統一全國，才算做到我們的責任。剛才同學們發誓說：『統一廣東，統一中國』。我希望各同學，要照誓詞做去，將來一定可以實行我們的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現在廣東雖然統一了；但是北洋軍閥關外王張作霖，想借帝國主義餘威，恢復他們的勢力，及長江直系餘孽吳佩孚等軍閥都把持中國政權，時時刻刻要破壞我們革命的力量，他們破壞我們的手段，比從前便要毒辣。他們曉得我們的力量，是由『親愛精誠』團結起來的，所以他們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要使我們同學裏分派別，鬧意見。這比拿機關槍來壓迫我們，用手槍來殺死我們還利害得多！軍官學校學生，稍為在講堂裏吵吵架，香港帝國主義報紙就大登起來，說黨軍分裂。天津，上海等處都照起樣來了，拿幾千百種新聞電報去宣傳，挑撥離間，想使我們內部分裂。這一層，可曉得今天環境的危險惡劣，比從前還要厲害。在這時候，我們不要想別的方法，還是守我們的老主義，守我們的校訓，『親愛精誠。』怎麼才親愛？精誠才能親愛，由親愛生出互相幫助。同學們看見行動上有不

對的互相糾正，也是親愛。就是不受糾正，拿紀律去處罪他，還是親愛。我們的處罰和別人不同，處罰一份部可以保全大多數。大家團結一塊，自己不要渙散。把意志，感情，勇氣，統統集在一塊；不怕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一切反革命派怎樣來壓迫我們，怎樣來離間我們，只拿我們『親愛精誠』的精神可以完全得到勝利。這一點，就是各位同學誓詞所說：『不愛錢，不怕死，不鬧意見。』這就沒有東西可以破壞我們了。沒有離間挑撥的可能了，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才能繼續前進，於最短期間，實現總理遺囑。才不辜負廖黨代表生前所指導我們的，和現在蔣校長所教育我們的。我們今天看見各同學舉行畢業式，非常痛快，我希望各同學要拿『親愛精誠』團結到底。國民革命勝利萬歲！陸軍軍官學校萬歲！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詞

各位同志！去年今天的九時三十分，就是我們總理在北京丟了我們去世的時候，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有遺囑告訴我們，叫我們怎樣去努力。兄弟今天要報告的，應該就把遺囑的經過說一說；但是兄弟已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有很詳細的報告，想來大家都已看見過，不用我再說的了。所以兄弟現在所報告的是一段關於遺囑簽字以前的一段總理和我們談話的筆記。其時孫科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都在場；但因為總理沒有簽字，所以沒有算總理遺囑的一部分。當二月二十日下午四點二十分的時候，我們到總理臥榻的面前，兄弟和孫哲生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同在。總理看見了我們就問：「你們有甚麼話說？」汪精衛說：「我們從總理病起，一直到現在，幫助着總理的病好，不過許多醫生勸我們要在總理平安的時候說幾句話；但是這幾句話不一定在二三年後以至十年後才用得到，不過我們總想得到總理吩咐幾句話。」總理就停了一停說：「不用的。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們和你們詳細的說；如果

我死了，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汪精衛說：「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好了之後，也一定要有一年或再較長時間的休養，所以總理吩咐我們幾句話是必要的，使我們更加奮勇，去做前進的工作。」總理於是，點頭說：「好！你們要我說甚麼話？」汪精衛說：「就是平常的話可以了。」總理點頭贊成。汪精衛說：「我把總理平常所說的記下來給總理看好不好？」總理又點頭贊成。於是就拿記下的給總理看。總理說：「好！不過這樣於你們很危險的，因為政治的敵人正在誘惑你們，如果你們這種的堅決，這是不好的，與你們有危險的。」汪精衛說：「決不會的，我們同志一定不受誘惑的。」總理點首贊成。這一段話的筆記是汪精衛記下，證明者孫科，宋子文，孔庸之；後來胡漢民派代表鄒魯到了北京，也簽了一個字。同志們，我們知道總理為什麼說我們有危險呢？為什麼說政治的敵人等他死了之後要誘惑我們呢？是不是他不信任同志？是不是對我們同志姑息？不是的，革命是不怕死的，革命愈是要有堅決的態度，所以總理不是不信我們，是總理已清清楚楚看明白他死了之後，一定有同志受誘惑；一定有政治敵人來施誘惑；不然，總理何必如此說法呢！果

然，不到總理死後二三天，就是二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以後，十五日段祺瑞下令封北京民國日報，把經理人拿下獄裏去；不但如此，段祺瑞又不許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同時派出安福黨員收買國民會議促成會分子，另一方面再四出收買我們同志：第一個被收買的就是馮自由，第二個就是馬君武，第三個就是鄧家彥，他們收買這些人來放在安福系之下，成立了所謂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這豈不是總理已看見了同志要受誘惑嗎？那時候，同志們因為黨務前途的關係，就開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正在開會時，馮自由受段祺瑞的命來搗亂，他一推進們，硬要與聞，硬要在簽到簿上簽字，不允許他，他硬着不走，甚至叫警察來拖他出去，他反而對警察說：『你們聽那一個人命令呢？』這豈不是總理已看見政治的敵人來誘惑我們同志嗎？一直到去年，他們還在那裏繼續開西山會議的反動行爲，雖然參與西山會議的人，不一定是已誘惑了的；但行爲已和誘惑了的一樣，其實明明白白受了敵人的誘惑現在鄒魯已領了庚子賠款；到上海運動民國日報，目下又到香港來和胡毅生等商量搗亂的方法，他說一方面津貼工商日報，一方面又想收買大光報等許多報館，不被

他們收買的，就用種種方法來運動主筆。他們把在北京分贓得來的錢來謀反總理所遺下的事業，這一天市面上已發見假冒第四軍名義來指摘蔣介石同志。現在已被李軍長查出，是挑撥離間的手段。同時我們又發見胡毅生的告海內外同志書。他這告海內外同志書不啻是收買機關的表現，其中指摘兄弟地方還不要緊；但是還說去年八月二十日的事，是糾察隊保護他出去的話，真是荒謬絕倫。鄒魯是代表胡漢民同志來北京參加葬事的；但是現在拚命的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怪不得總理要說這幾句話，總理實在已看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自從總理死後，本黨就分了二部份的人，一部份的人就是被政治的敵人所誘惑而投降，一部份的人就堅心革命。擁護總理的主義，繼續與政治的敵人奮鬥。所謂政治的敵人，究竟是誰呢？其時總理說了那句話之後，有許多同志解釋，吳稚暉先生說是段祺瑞；但我們不承認，因為自從袁世凱以至段祺瑞，都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段祺瑞一個人實在配不上說他的。戴季陶同志說指英國；但也沒有這樣簡單。如果總理的話單純地指一方面，則總理何必這樣的擔心；還是我們當時不敢多問他所指的敵人是誰。因為他很辛苦，說一句話很難

；但是我們不必去曲解他，因為遺囑上明明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是帝國主義，所以凡是所有使中國不自由平等的，都是我們國民黨的敵人。這個解釋是很正當的。所以我們只要一讀遺囑，就知道總理的所謂敵人，是不單指段祺瑞和英國；凡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附庸之軍閥走狗，都是政治的敵人。固然我們不怕敵人，因為革命黨本來要去和敵人打仗，怕的爲不覺悟的人。因爲人民不覺悟，是不知國民革命之重要。如其人民覺悟了，就知道國民革命的重要。但是我們不怕不覺悟的人民，我們可以努力去喚起不覺悟的人民，所可怕的既不在政治上的敵人和不覺悟的民衆，乃是在於受敵人誘惑軟化的同志。不然去年肅清東江趕走劉楊後，本可以出兵解決南路，但爲什麼七月國民政府成立後會鬧出亂子來呢？爲甚麼八月二十日會死了廖仲愷同志呢？爲什麼會再征東江廢了好多的時，才把鄧本殷趕走了呢，可知一切受敵人誘惑，不剷除，我們就沒有方法出去。所以我們不怕敵人，也不怕不覺悟的民衆，只擔心同志們受敵人的誘惑軟化。他們——鄒魯等聽了總理的演說不動心，聽了總理臨終時

那種婉轉的呼聲不能動他們，「惻隱之心，」反而曲解求全，受敵人的誘惑，這才是可慮的。這才是可恥的。然而這些落伍者雖然以總理之偉大而不能動他的心；但決不能阻止國民革命，決不能阻止總理的精神，看當總理靈柩進中央公園時，有三萬民衆來參加追悼，這豈不是不但不能阻止革命的精神，而總理的精神已確是喚起了民衆嗎？一直到五卅，六月廿三等上海沙面青島漢口各慘案發生，民衆已一齊起來想實現總理的精神，再看去年歲暮北京的民衆何等熱烈，這豈不是以總理的精神喚起了民衆嗎？所以遺囑上說：「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不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共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蘇俄是，他們以全力幫助我們革命，共同在革命的路上走。一年來同志們努力繼續總理的工作，掃除了一部分被誘惑的走狗，同志們有的在戰場爲主義而犧牲了生命，現在生存的應如何努力，更進一步聯合政治上社會上各種工農商各界來共同進行，以誘惑爲可恥，以危險爲精神上最後之安樂，使各界一齊革命化，團體化，聚集在一起，才能實現總理的精神，才能對總理靈前說。「我們沒有被誘惑，」我們掃除一切被誘惑的人們，我們把總理四十年的

革命工作繼續起來！

總理逝世一週年紀念大會訓話

今天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紀念，總理逝世第一週年，兄弟有幾句話同各位說：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在北京逝世的時候，正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了陸軍教導團，在東江和敵人作戰的時候。自去年二月十六日總理進了協和醫院，經過醫生剖割後，曉得他這一次的病不能夠好了。在二月初，總理聽教導團已經出發東江，打了勝仗，曾口授兄弟打電報給蔣校長廖黨代表和各位同學；電報的大意是：「我的病剛好一點，聽見你們打勝仗，非常安慰，深望你們努力把敵人打退！」這個電報已經由蔣校長廖黨代表宣布給同學聽了。後來在二月中，繼續接到東江打勝仗的電報；三月初，知道汕頭克復了，潮州也克復了，在那個時候，總理的精神遂很好。我們接到電報之後，都由兄弟把電報讀給總理聽：某天克復汕頭，某天克復潮州。總理聽得黃埔學生，已經把東江的敵人掃除，所以雖在痛苦中，能夠得到一點安慰，尤其是總理知道我們這次用兵東江，不僅是把敵人打破，而

且很守紀律；不僅是不害百姓，一不拉夫，一不籌餉，並且很努力的宣傳主義。到了那個地方，那地方就開軍民聯歡大會，使民衆明瞭我們的主義和我們用兵的意義，總理聽見這消息，比打勝東江還高興幾倍；總理聽見打勝仗，不過面上稍爲好點，聽見這箇消息，總理在痛苦中發生欣笑說：『這樣子才好！』所以自二月——至三月十二日，總理天天在頂痛苦的時候，能夠使總理稍爲安慰的，就是東江克復，尤其是我們同學守紀律實行與民衆合作！

我們同學戰勝東江敵人之後，又回師廣州，肅靖揚劉……等一般反革命的勢力，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繼續又組織黨軍，到去年十一月再出師東征，因爲惠州克復很快，使南路敵人容易瓦解，能夠把革命根據地完全鞏固，這裏頭，陸軍軍官學校同學的努力是很大的，現在陸軍軍官學校很多的同學已經同死了的廖黨代表精神生命都犧牲去了，還有許多同學仍在蔣校長指導之下努力繼續工作，陸軍軍官學校到現在，已經得各軍和軍事委員會的信任，改組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各位教職員，各位學生同志，曉得本校從前的歷史，曉得本校與我們有這樣深的關係，我們

應該想想怎麼樣繼續總理的生命，怎麼樣繼續代表的生命，怎麼樣繼續已死同學的生命，這一層，我們今天紀念總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

現在在場的學生同志，有許多考進了學校的，也有許多還留在入伍生部的，考進了學校的，不要驕傲，不要為自己的本事好，實在也有些僥倖考進的，我們既是考進了，更要加倍的努力，怎麼樣去學本事，怎什麼樣才能做很大的事業，未考進來的，也不要頹喪，不要失望，不要灰心，本來學校裏打算把入伍生通通收容進校，只是現在苦於環境，事實上遂不能做到，但是入伍與學生並沒有什麼分別，因為我們的目的，總是革命，要學本事，不在乎入校遲早，從前第二三期的同學，因為種種關係，勤務多，求學的時間很少，他們畢了業是恨自己的本事不夠，所以我們入伍生不要存一個進了學堂，就可以達到畢業的目的，不進來就是入伍生，心裏惆悵，把工作放鬆，如有這種思想，就是從前討文憑，畢業早一點，就可以升官發財的惡習，這種惡習，我們革命者，不應該有的，并且不能夠有的，我們無論官長教職員，學生，入伍生，通通要精神聚在一點，去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人類本

來都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對於爲國爲民的遺囑，當然要遵守，但是同時我們還是要講理性，這遺囑說的話，是不是救一般窮苦人民，一般窮苦人民是不是望我們實行救我們，所以我們一方面是在感情和精神上做，一方面也是爲理性做，把感情和理性集合在一起，然後才能夠把種種困難打破，不怕辛苦，才能忍耐，所以關於遺囑的經過，兄弟打算今天同大家稍爲說說。

關於遺囑的經過，自從二月十六日，總理進了協和醫院，經過割割手續之後，醫生宣布這病不能夠治，一班同志希望總理有一個遺囑，作我們努力的標準，但是那時候，總理的病，雖然是很沉重，一班同志總不失望，還想用種種方法延長總理的生命，因此我們不敢去向總理問遺囑，到了二月廿四、醫生告訴我們說，「總理醫到現在，是最末了的時候，如果你們不快向他說話，以後就不容易了，」我們聽見醫生最後的警告，覺得總理的病，沒有方法治了，我們於是到總理臥榻的前面，兄弟和孫哲生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都在，總理看見我們就問「你們有什麼話呢？」兄弟說：「我們從總理病起一直到現在，總想幫助總理病好，不過醫生勸我們在總理

平安的時候說幾句話，但是這幾句話，到二三年以至幾十年還是用得着，不過我們現在總想得總理吩咐幾句話。」總理停了一會說：「不用的，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再詳細和你們說，如果我的病不好，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兄弟說，「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好了之後，也一定要有一年或較長時間的休養，所以，總理吩咐我們幾句話是必要的，使我們更加奮鬥去做總理的工作。」總理於是點頭說：「好！你們要我說什麼話呢？」兄弟說，「就是平常對我國所說的話可以了。」總理點頭贊成，兄弟又對總理說，「我把總理平常所說的記下來，請總理看，好不好。」總理點頭贊成，於是把我寫下的話給總理看。總理說：「好！不過這樣子於你們很有危險的，因為政治敵人，正在誘惑你們，軟化你們，如果你們有這樣的堅決，這是於你們有危險的。」兄弟說，「決不會的，我們同志，一定不怕危險，不受誘惑。」總理贊成，簽了字，又於孫科宋子文孔庸之……等在旁證明，這就是革命經過的情形。

同志們，我們知道，總理為什麼說我們有危險呢？為什麼說政治的敵人等他死

後來軟化誘惑我們呢？是不是總理不信任同志，是不是對我們同志姑息，不是的，革命黨是不怕死的，革命黨人是要有堅決的態度，所以，總理不是不信我們，是總理已清清楚楚看明白他死了之後，一定有同志受軟化，一定有敵人來軟化同志，不然，總理何必如此說哩？果然，不到總理死後三天，就是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以後，十五日段祺瑞就下令封北京民國日報，把經理人拿到獄裏去，不但如此，並且不許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同時派出許多安福黨員，收買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份子，另一方面再四出收買我們同志，第一個被收買的就是馮自由，第二個被收買的就是馬君武第三個被收買的就是鄧家彥，他們收買這些人放在安福系之下，成立了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這就證明總理很明白知道他死了之後，我們同志裏面容易被政治的敵人軟化，

總理說政治的敵人，許多人猜是軍閥或段祺瑞，也有許多人說是指帝國主義，但是我們不管是指那個，我們看遺囑就明白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就是總理的政治主張

，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就是總理政治上的敵人。誰定不平等條約，就是帝國主義，那個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保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就是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以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派，都是總理政治上的敵人，總理曉得他死了之後，政治上的敵人，不僅是硬打我們，敵人來硬打，方法還是很笨。敵人沒有這樣子笨的，敵人除了硬打之外，還要想法來軟化我們，所以我們同志，一方面要提防硬打，一方面更要提防軟化，我們的同志，我們武裝的同志，敵人來硬打，我們曉得的我們既是武裝起來了，總是預備不怕死的，既做了革命黨人，總是預備犧牲的，敵人來硬打，我相信同志們不怕，敵人硬打我們，我們還是硬打敵人，但是敵人來軟化我們的時候哩，軟化不是硬的，是用種種方法使我們不知不覺受他的誘惑，關於這一點，用什麼方法來提防。提防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張爲什麼要革命，爲什麼要做中國國民黨黨員，爲什麼要做中國國民黨的軍人。要把這幾點弄得清清楚楚，使敵人來軟化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現在考實同各位說幾句話。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努力四十

年，四十年革命如一日，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主義。總理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總理革命四十年，三民主義在中國，也有四十年，我們略略說明三民主義成立的歷史是怎麼樣的，我們大家看建國方略裏面孫文學說有幾句說：「我自從乙酉中法戰後，立心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乙酉是什麼時候，去年是乙丑，乙丑上十年是乙卯，乙卯上十年是乙巳，乙巳上十年是乙未，乙未上十年是乙酉，由乙酉至乙丑足四十年，所以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些話怎樣解呢，我們看乙未年。總理立主意要顛覆清廷創建民國，這年總理起首就定了一個主義做革命的標準，「顛覆清廷」是怎麼樣，就是民族主義「創建民國」是怎麼樣，就是民權主義，那時候還沒有民生主義，四十年前，總理初立心革命的時候，且有民族民權主義，由乙未到乙巳年，第一次革命在廣州失敗了。總理就跑到外國去考察，研究各國的革命事實。總理於是知道革命的目的僅是民族民權主義，還是不能成功，最後并因為與俄國革命黨員互相研究的結果，才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一起來解決，這是由乙未到乙巳這十年中總理把三民主義做成了完全革命的目標，我們看乙巳年，總理在同

盟會的誓約就明瞭了。同盟會的誓約上說：「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願衆處罰」「當天發地誓，同心協力，」就是革命黨的道德；「願衆處罰」就是革命黨的紀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顛覆滿清一樣，就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就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就是民生主義。總理認定要解決民生問題，先要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三民主義到這年，完全成立爲一個革命的主義，完全成了中國同盟會的主義，我們知道三民主義的成立，足足有四十年的歷史。

由乙巳年過了七年到辛亥年，把滿清推倒了，辛亥革命後，民族主義已解決大半，以後可以繼續實行民權民生主義，不料到民國元年，忽然有一般同志，主張將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那件事情的原動力全在北京。總理對於那一次的政策，完全不高興。總理爲什麼不高興呢，我們看黨綱，黨綱內面已經除掉平均地權一條，完全採用社會政策，各位要知道，革命政策完全和社會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是根本解決勞資問題，社會政策僅是資本家和勞動者調和，地主要和農人調和，就是想一

個方法使他們調和妥協，這樣子，爲什麼國民黨把平均地權來修改成一個社會政策呢？因爲北京完全是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官僚政客資產階級的集中地，同時，總理又不在北京，他們就聯合起來改組國民黨，舉豬仔頭吳景濂爲理事長，當時總理知道，非常傷心，我們再看民國元年，總理規定民生主義，除了平均地權一條外，還沒有節制資本的規定，總理本想解決土地問題之後，同時要解決資本問題，忽然民國元年，北京的黨員做出這些事情，使黨的政策完全失敗，民生問題無從解決。

當總理在南京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就有許多黨員說：『現在革命成功了，民族民權一定要實行，但是民生主義，社會上一般人很駭怕，我們爲避免攻擊，最好請先生把民生主義修改，』那時候，總理憤挺着棟說，『如果不要民生主義，我就不用革命了，』後來他們竟不聽總理的話，把民生主義除去了，民國二年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唯一的精神，第一就是把政黨改爲革命黨，第二就是把國會丟開，還是拿人民來做根據，第三就是修改誓約，在當時誓約裏面說，『我們犧牲生命財產，服從孫總理來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在同盟會實行了

八年，忽然元年變爲二民主義，但是不久又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依然採行三民主義，後來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始確定，民族主義對內是打倒軍閥，謀民族平等，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謀民族獨立，民權主義，除五權憲法之外，還規定直接民權之實行，並且找勞苦工人農民共同奮鬥，使工人農民明白本身的痛苦與利益，要工人農民起來做革命運動，民生主義更顯明的指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原則，爲解決民生問題的不二法門，同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之後，總理曉得目前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在宣傳，所以，總理曾經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繼續講演，在民生主義上面更說得格外明瞭，因爲這樣子，一般落伍的黨員，總想方法來反對民生主義，甚至想推翻民生主義，在民國十三年時候，有許多黨員要除掉民生主義，因爲總理意志堅決，在黨裏不敢公然反對，他們沒有法子，只得陽奉陰違。總理死了，兄弟在北京，已經成了他們攻擊的目標，我們知道總理生前，主義的實行，還有這樣的困難，總理死後，更不用說，差不多跟民國元年一樣了，如同反動派在北京開西山會議，西山會議的目的是什麼呢，簡單說，就是取

消總理的民生主義，總要戴上假面具，說什麼「反共產」、「反赤化，」真是自欺欺人呀！

民國元年，袁世凱用種種方法利用黨員來取消民生主義，六年，段祺瑞也利用黨員取消民生主義，現在反動派除了想取消民生主義之外，更想把總理的革命政策聯俄政策和國民革命政策，完全取消，同民國元年一樣，我們知道，凡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人，一定有特殊階級的觀念，爲什麼呢？因爲特殊階級要保守本身的特殊利益，一定是反對民生主義，所以凡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人，就是特殊階級，他們決不願把已得的特殊地位放棄，那些沒有特殊階級的人也想做特殊階級，若是民生主義實行，人人都能得到安樂自由平等，但是一般有貴族和軍閥思想的人，一定想保守他們的特殊階級，這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中心分子，特殊階級反對民生主義，難道是民生主義可以使大家窮苦嗎？不是的，我們知道現在社會上有兩個慾望，一個是生存慾，一個是支配慾，生存慾就是人類都想有很好的衣食住，人人都想方法去求滿足的生存，支配慾就是少數人想把他人的生存慾消滅，供給少數人的揮霍，譬如美

國的鋼鐵大王和煤油大王……等，他們由剝削多數勞苦工人得來的金錢，任意揮霍，用不完的金子來建築房子，他們完全用金錢去驅使人家做他的牛馬。又如民國五年袁世凱想做洪憲皇帝，弄出什麼勳一位，勳二位，勳三位……等以致許多很努力的革命黨員，後來也做了籌安會的六君子之流，所以凡是保守特殊階級的人，沒有一個不反對民生主義。

我們看，現在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英美帝國主義，一條路是俄國反帝國主義，再不會有第三條路，我們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上，可以不？比如日本先五十年改革還可以，但是我們遲了五十年，現在中國差不多做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已經一天一天的擴大了。不是我們叫他們走，他們就會走的，所以要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中國只一買辦階級的資格，因為英美帝國主義，既是想拿中國做殖民地，決不肯放鬆，使我們走到他們的路上去，最多不過使我們做成一個買辦階級而已，買辦階級就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別名，我們想做買辦階級，就反對民生主義。我想將來帝國主義走狗這個名字，一定比勳一位還要高尙，

我今天并不是說笑話，是確有事實的，從前滿清對於有功的人，就加上巴圖魯的頭銜，滿洲話說巴圖魯就是狗的稱呼，滿清的官僚，做了提督不高興，一加上了巴圖魯狗的稱號，就很高興了，我們如果取消民生主義，就只有這一條路。第二條路是怎麼樣呢，就是反帝國主義，是要解放一切殖民地使成爲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還要大多數窮苦的工人農民一齊喚起和所有被壓迫民族被壓迫的階級通通來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路上，大家想方法來滿足人類的生存慾，就是總理所說的衣食住行四大端，解決的方法，我們對於特殊階級，要壓迫他們的支配慾，節制他們的資本，平均他們的地權使，多數窮苦人都能享受衣食住行的滿足，得到自由平等的幸福，我們既然知道這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跟英美帝國主義的尾巴，一條路是跟世界上大多數的平民共同奮鬥，共謀幸福，我相信人類有四分之三是平民，除了那想保守特殊階級的少數人之外，決不會想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本黨的主義完全是爲大多數窮工人農民，絕對不許我們去作特殊階級，十四年的北京西山會議，就是想保存他們的特殊地位，所以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把這些亂子撤消，不

留餘地。

各位同志，我們要看清中國的現狀，認清中國國民黨的使命，認清總理革命的精神，我們的武裝黨員，更要認清楚，我們的槍是要向帝國主義放的，我們爲多數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窮苦的民衆而放槍，要這樣子，才能夠實行總理的遺囑，才算

是理總的信徒，我們不要有一種特殊階級觀念放在心裏，若是想做特殊階級，就不能做總理的信徒，也就不配說實行總理的遺囑，在過去這一年，我們知道遺囑的勢力很大，已經喚起了世界上許多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我們的戰線很長，我們的勢力，完全建築在最多數的民衆上面，我們要解放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我們這一條路是很光明的，一定要向光明的大路一直做到底，使民族平等，世界大同，這樣子，才不愧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做中國國黨的武裝黨員，更不愧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同志！今天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日子。這次開會，從元旦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時候了。這回第二次代表大會和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不同的是：這回沒有總理在場的指導，這二十天裏頭，總理的精神是時時刻刻在上頭指導我們的。然而這回的代表大會，是真真的全國代表大會，除了十八省的代表以外，東三省內蒙古三特別區域，通通都派出代表來出席，還有海外的代表，從國外回來。所以說這次大會，是真實真實的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年來的進步，就是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的慘淡經營的結果，也是同志們奮鬥努力得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十三年一月舉行，到現在兩年的工夫，已經有這種進步，因此可想將來第三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也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努力，一定能得更大的進步了。

在這二十天當中，我們由我們所討論的種種提案，實見着很好的精神表現出來

，就是各位代表，都是一心一德，忠實誠篤的，來實行總理的主義，即總理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手定最低限度的政綱，也是完全繼續實行。所以第二次大會，對於第一次大會宣言內主義之解釋及政綱沒有修正，第二次大會的精神，就是在討論實行第一次大會宣言內主義及政綱的方法。

第二次大會所討論可以分作兩大部分：第一是接受各地黨部的報告，就是把各地同志兩年來的工作，一起審查，並做成決議案，這種決議案，就是指示黨員工作的方針，告訴同志怎麼去實行主義的方法。

第二，是討論種種的提案，賅括說來，我們所討論的就是實行主義及黨綱的方法。

我們革命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傳與事實不能一致；尤其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感受最痛苦的，就是當時的事實，與我們的宣傳，確實不能一致。不把事實來改變，是不能宣傳的，但是想把事實改變，却又必先努力于宣傳。宣傳是宣傳，事實是事實，是我們覺得非常痛苦的事；但是我們覺得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從痛

苦中感覺得的愉快，就是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宣傳，許多都已變成事實。固然我們現在所希望所討論所宣傳，還未能和事實全然一致；但今後我們也惟有不斷的努力，使我們的宣傳成爲事實，這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責任。我們知道，自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稍有使宣傳成爲事實的，就是全國各處同志努力的結果，因此纔有這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既經閉會，以後我們便要拿原有的事實做基礎，把一切現在還未成事實的種種政策，一一實現起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我們所做的工作，是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統一全國。我們最少要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實行總理遺囑中所說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兩件事，現在因爲我們全體黨員動員的結果，已經發現了帝制主義者的裂痕，軍閥的崩潰現象。這種裂痕，這種崩潰現象是什麼人把他裂開令他崩潰的呢？就是我們全體黨員把他裂開令他崩潰的。我們又看見世界很多弱小民族的抬頭，中國許多民衆和軍人的覺悟，是什麼人使他抬頭，使他覺悟

呢？也就是我們全體黨員使他抬頭；使他覺悟的。我們要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至少要能夠把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都放在本黨主義領導之下。我們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至少要在武昌南京北京舉行。今天是閉會日子，大家就要分別了，我們希望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漢口北京相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80B

中華書局

發行